文革史简明教程

（上）政治运动篇



火星写作组

文革史简明教程（上）政治运动篇

火星写作组

文革史简明教程

政治运动篇



火星写作组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毛主席语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

转引自《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红旗》1967 年第一期 36 页



谨以此书，纪念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
130 周年诞辰

目 录

序言…… 1

导言：百万工农齐踊跃，六亿神州尽舜尧…… 3

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 4

文革的性质…… 15

文革成败的深层分析…… 17

文革前夜…… 23

第一回合 群众组织从建立到夺权：
唤起工农千百万，不周山下红旗乱…… 25

农村文革…… 32

一月风暴…… 33

小结…… 39

第二回合 从二月逆流到造反派进入革委会：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40

小结…… 49

第二回合失败的造反派：
遍地哀鸿遍地血，斑竹一枝千滴泪…… 50

失败的地方造反派…… 50

军内造反派…… 53

第三回合 通往天下大治：
赤县原藏万种邪，更无豪杰怕熊罴…… 55
清理阶级队伍…… 56
反复旧…… 60
小结…… 62
九大 文革第一阶段结束 …… 63
科层制镇压：高天滚滚寒流急，洒向人间都是怨…… 65
小结…… 69
林彪集团的覆灭：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70
小结…… 76
军队退出后的新格局：
乱云飞渡仍从容，孔学名高实秕糠…… 78
批林批孔…… 82
关于王洪文…… 87
小结…… 88
整顿：斥鴳每闻欺大鸟，万花纷谢一时稀…… 89
整顿期间的王张江姚…… 94
小结…… 95
反击右倾翻案风与批邓：
小丑下台应欢送，满街红绿走旌旗…… 97
关于周恩来…… 100
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后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01
小结…… 103

政变：正是神都有事时，还从烈火识真金…… 104
上海的应对…… 109
小结…… 118
结局：长夜难明赤县天，而今迈步从头越…… 119
华派与元老派联合执政时期…… 119
元老派执政时期及之后…… 126
小结…… 131
结语：先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 132
文革大事年表…… 133
1965…… 133
1966…… 133
1967…… 139
1968…… 143
1969…… 145
1970…… 147
1971…… 150
1972…… 153
1973…… 154
1974…… 158
1975…… 162
1976…… 167
1977…… 173

1978…… 176
1979…… 178
1980…… 178
1981…… 178
1982…… 179
1983…… 179
1987…… 179
1989…… 180
1992…… 180
90 年代 …… 180
正文部分人名、团体名索引…… 181
附录一 文革研究简介 …… 199
资产阶级学界的研究…… 199
左翼、泛左翼的思考和研究…… 201
附录二 文革史书籍推荐 …… 212
后记…… 214

序言

“为什么要学习研究文革史？在资本主义复辟了四十多年的今天，四十多年前的，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前提的文化大革命对当下有什么现实意义？”相信每个马列毛主义初学者都有过这个疑惑。毕竟历史已经远去，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已经成为屠龙之术，失去用武之地。然而，对于现在的中国左翼来说，对文革进行基本的了解还是很有益的。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左派在实际上和舆论上都是和文革联系在一起的，而资产阶级用反动的史观、剪裁与编造的史料、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等将文革彻底否定，所以我们在左转时突破资产阶级在左转路上设下的藩篱，和左转后深入学习马列毛主义，都需要对文革进行理解和评判，这就要求我们对文革史进行学习。尤其是在简中互联网兴起了一批带着左翼色彩的文革模因的今天，文革史学习的热潮已经开始。

而且，作为毛主席的学生，我们有必要了解毛主义里程碑式的新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而文革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实践，还是毛主席最看重的两件事之一，也是后人理解继续革命理论的钥匙。此外，左翼进行文革史研究还有着更深远的意义。文革是中国左翼的历史遗产，这是在我们的国家曾经进行的伟大革命，也是我们走在人类历史最前面的历史时期；同时中国左翼的历史也与老造反派有着一定关系，今天的青年左派从产生到发展都得到了老一代经历过文革的左派的滋养和指导。因此我们有义务将这笔遗产处理好，一方面为将来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社会留下好的经验教训总结，为那时的新社会的继续革命准备好理论武器；另一方面也是为现在的左翼提供认识与把握历史的材料。

可是，目前文革史研究现状可谓是庞杂无序、鱼龙混杂，这种情况使得左翼学习文革史既困难又容易被带偏，也激励着我们肩负起总结这份遗产的历史义务。本书正是试图通过梳理文革的历史脉络，以阐释继续革命的内涵，总结文革的历史经验与失败的教训。

因此，本书编写的原则是：仅大致介绍文革史的细节，对地方文革史尽量进行概括性描述，而主要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角度，从走资派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变化的角度来叙述文革史。此外，本书在文风上力求通俗易懂、活泼生动，避免使用晦涩的词汇、长难句或高深的比喻，在文风上也会适度活泼，符合入门教科书的定位；在史料上，尽力避免教科书常有的史料裁剪和史实错误，力求在实事求是的同时做到简洁干练[1]；在理论上，力求能从马列毛主义出发，阐明继续革命理论，分析出文革历史进行的内部逻辑。通过这些努力，来破除或假装左派立场、或毫不掩饰反革命实质的，老保和自由主义的谬论，解答文革初学者的常见疑惑。

当然，限于我们水平的不足和时间所限，本书难免有疏漏、谬误、分析不到位、应该写到的内容没有写到等不足之处，尤其是注释有许多地方理应加上，但埋没于资料堆中而无法找到注明，请读者海涵。此外，很多理论问题和考据问题都有争议，这里难免采用一家之言，是否准确只能由读者自行判断了。

最后，如果只是了解文革史，那么这仍然只能是书斋里的研究，或当作互联网上的话题。希望读者在学习文革史后，不要忘记现实中的斗争，能将对文革史学习的成果用于斗争中，更奋力地投身到那阶级斗争的滚滚洪流中去。

[1] 因此，部分特殊形势下产生的特例不得不被略去。

导言：百万工农齐踊跃，六亿神州尽舜尧



表现 1967 年初中央祝贺上海成立人民公社时，上海群众组织上街游行欢庆的宣传画

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

从1966年5月末第一个群众组织，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开始，到清理三种人几乎所有派系的下台，“派”有着约20年的历史，几乎贯穿了本书所述的全部内容。因此，为了帮助读者正确地理解群众运动，我们首先介绍文革中群众组织及其他参与方的系谱。

1966年5月末开始，学生群众组织开始出现，此时他们的成分都是高干子弟，但是反对学校的党、团组织和之后被派到学校的工作组，是“造反”的源头。工作组的支持者则被骂为“保皇派”（后被周恩来改为保守派），是“保守”的源头。不过，此时双方还都不是经典意义上的造保。

在工作组撤出后，学生群众组织纷纷成立，并且都模仿最早的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叫做“红卫兵”，使红卫兵成为学生群众组织的代称。这时候，围绕着如何评价工作组的问题，出现了分歧，于是根据观点不同形成了肯定工作组的**多数派红卫兵**和否定工作组的**少数派红卫兵**两派。地方党委大多支持多数派，甚至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委都在9月扶持了官办红卫兵（官办红卫兵和血统论老红卫兵也有重合的，如广东东风派红卫兵），因此遭到少数派红卫兵反对。此时的多数派的核心是高干子弟组成的老红卫兵，由于他们持血统论观点，因此本书称他们为**“血统论老红卫兵”**（如西纠、海纠等以及后来的联动）。少数派红卫兵的核心是被工作组打成右派的学生，他们多出身工农[2]（如蒯大富）。

之后随着运动深入，在10月中央批判资反路线，矛头明确指向刘邓集团，围绕对执行资反路线党委的态度，文革中两个基本的对立派别，造反派与保守派正式形成。**造反派红卫兵**主要由原来的少数派红卫兵和转向的原多数派红卫兵构成，**保守派红卫兵**主要由血统论老红卫兵（如联动）和**官办红卫兵**（如三字

[2] 本书对出身占比的描述参考了乔晞华《文革群众运动的动员、分裂与灭亡——以社会运动学视角》，282-283页。

兵[3]）构成。这也标志着血统论老红卫兵走向反面，从革命走向反动。由于局势的复杂，在学校是保守派观点者，可能在市里反而是造反派观点，反之亦然。类似这样，**在本单位和在省里造保相反的情况，在之后一些群众组织中也会出现**。因此，造保不能搞二元叙事，而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经过 2 个月的斗争，保守派在大部分省会和大城市的城市级组织都被击溃（广西大部分地方、大部分非省会城市的城市级组织未被击溃），血统论老红卫兵退出历史舞台，造反派红卫兵取得胜利。

这一时期，社会的其他部分也动员起来了。9 月，地方党委组织了“赤卫队”等工人[4]组织，后来形成**工人保守派**组织（主要由对旧秩序满意、被党委蒙蔽的工人组成）。10 月开始，**军内造反派**、**军内保守派**和**干部造反派**陆续形成组织。军内群众组织由军校、文工团等非战斗人员组成。干部造反或是因为初期被抛出（如王效禹），或是因为后来被抛出来顶锅（如徐景贤），或是跟风一起造反（如上海市委写作组组员）。越低级的干部，造反的比例越高。此外，也有少数干部虽然没参与组织，但是同情或支持造反派（如刘建勋、李再含）。11 月，**工人造反派**组织纷纷成立，早期成员是或因主动思考、或因随手提意见，于是贴大字报发表看法后被工作队打成“右派”的工人（如王洪文、黄金海），后期也有为利益而造反者（如 12 月才造反的李木森）。12 月，工人保守派组织和保守派红卫兵一样在大部分主要城市被击溃。

1966 年 12 月开始，尤其是在造反派夺权和军队掀逆流、刮黑风的 1967 年 1–4 月，造反派红卫兵、工人造反派发生剧烈的联合、分化（有各群众组织联合过程中已经分为两三个派系的，如重庆八一五和反到底；有先联合，后温和造反派分化出来，如沈如槐为首的一些清华学生分出来四派；有先联合，后激进造反派分化出来，如贵州对李再含不满的组织分出来四一一）乃至重

[3] 武汉等地的官办红卫兵，就叫“红卫兵”而没有前缀，故称“三字兵”。

[4] 文革中的工人广义上也包括工厂的低级干部、技术人员等。

组（指吸纳许多更保的组织）、蜕变，形成**激进造反派、温和造反派**、甚至保守派（如高司）三种派系[5]，以及无数小山头。其中，温和造反派一般黑五类[6]占比多于激进造反派。在2-4月，大部分地方最激进的造反派被镇压，许多地方温和造反派受压不严重、未受压或被支持，部分地方的保守派被反对造反派的军头重新组织起来（并且蒙蔽、裹挟了大量盲从的群众）。除广西、广东外，其他省份主要城市的保守派在1967年再次被击溃，部分县城的当权保守派在1968年4月被进一步打击。同时，原来执行资反路线的干部（他们往往盲从上级，包办代替作风较严重）在夺权中靠边站，在思想转到革命路线后，现在通过亮相[7]支持某一造反派，也解放出来参与运动（一般都不是一把手，如华国锋、纪登奎、马天水）。[8]这些干部中有一部分后成为**革命派干部**。5月之后，部分激进造反派中陆续分化出**极左派**（主要为旧剥削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学生），并在1967年-1968年初陆续被解散，其成员在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中被针对打击。在支左中，野战军支持造反派比例较高，地方部队比例较低（如黄永胜就是露骨地、凶残地反对造反派）。军内造反派在5月的五一三事件中一蹶不振，在10月走向解体。

[5] 有的著作中，则将1967年后温和造反派中比较右的一类分为单独的新保守派。但是本书中，新保守派单指1969年后温和造反派向右蜕化的派系。

[6] 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有时也指他们的子女），不过，他们其实情况并不能一概而论。其中，旧剥削阶级在完成经济改造后仍然一直有着巨大的潜在能量和与走资派密切的联系，因此革命派一直坚持对他们进行限制和防备。

[7] 指靠边站的老干部公开揭发批判执行资反路线的干部后，站在造反派一边。在1967年，只有亮相的地方老干部才会被解放。

[8] 为了行文方便，一些本书中1967-1972年的“造反派”“造反派头头”还包括支持造反派的干部。



该图按一些重要特征的符合程度，将 1967 年存在过的各重要城市（除了情况特殊而复杂的北京）的各大群众组织归类，相对比较可靠，值得作为参考，但是在细节上不能代替对每个组织所作所为的具体考察。

1968 年，很多表面上支持造反派的军头在清队中背刺造反派。年末，虽然群众组织全面倒旗解散，但是原来的派系却仍然存在，只有红卫兵随着毕业分配和上山下乡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在随后的科层制镇压中，温和造反派或和激进造反派合流，或向保守派蜕变形成**新保守派**，地方上的阵营重组为造反派、（新）保守派、当权的走资派三方（也有许多省份则是两方对垒甚至一方一统天下）。

1973 年以后，军队退出历史舞台。干部全面解放，其中大部分虽然仍是走资派立场，但不再强硬反对造反派，也有死不悔改的、始终反对造反派的走资派（如邓小平）。造反派此时在革委会中逼迫党委闹革命，有的地方便分化继续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派系。

1973–1975 年，有的保守派变得激进，向造反派转化（如东风派），有的原造反派脱离革命队伍成为逍遥派，革命派干部也有进有出。走资派则在老干部被解放后大大加强，其中元老派在整顿中形成了复辟的班子，华派也在整顿中第一次暴露出走资派的面目或转向走资派。

1976 年 10 月后的两年，绝大部分造反派被清算，剩余的少数造反派则在剩余的 5 年中被陆续清算，退出历史舞台。而（新）保守派则先鸡犬升天，1982 年后多被打回原形，实质上也退出历史舞台。

从各派核心成员的特点中，能够看出具有一些特征的人在加入运动进程时会倾向于某一派。这说明了文革被后来的走资派所渲染的疯狂的表现之下，人们的行为整体上还是理性驱动的。当然，疯狂，或者说“革命惯性”也是广泛存在的，这也是后来毛主席会将“打倒一切”作为文革的一个主要错误的原因之一。

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粗糙的概括。每个人加入造反派或保守派的原因几乎都不会完全一样，倾向造还是保、加入哪个组织、某个组织会怎么变化也具有随机性，因此两派也是鱼龙混杂。比如，造反派中也不都是认同、理解继续革命的人（即使是理解也

往往不是开始就理解，而是在斗争中才理解），还有一些自由派、许多投机者和大量出于个人原因加入造反派的一般群众；保守派群众组织中多数还是被走资派蒙蔽、蛊惑的群众，而真正成为走资派代理人的头头是少数。当权派也同样各不相同，例如同样在武汉，有使用狡猾的两面派手段的张体学，也有残暴镇压造反派的陈再道。总而言之，上面每类文革参与者都是千人千面的，在一些特例上并不一定符合刻板印象。此外，也有一些群众组织的演变和分化过程较为复杂，不能完全囊括进来。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奉旨造反论”的荒谬之处。造反派们之所以起来造，绝不是因为毛主席一声令下；造反派后来的被打击，本质原因也不是毛主席降温的指示，毛主席也谈不上抛弃造反派。毛主席在其中只是起到了一个提供“合法性”（造反有理），将宪法里的权利落实，让人们知道造反行动不是反革命，以及支持与推进的作用。尽管从数据上看，响应毛的号召的“个人崇拜”（事实上这也并不一定是个人崇拜，也可能是理性地认同毛主席的判断）是造反派起来造反的原因中最普遍的[9]，但是纵观造反派的回忆录，可以发现对于深度参与造反运动而不是随大流的造反派而言，他们在文革中都是主动地参与运动，而不是像傀儡一样被要求行动。此外，它同样无法合理解释保守派起来保走资派的原因。“奉旨造反论”的另一个论据是文革中造反派的行动有红线，有不能反的人，也不能反对党，但是这只能说明造反是有针对性的而不是“怀疑一切”，仍然要党的领导而不是安那其主义。事实上，真的触犯了这条红线的造反派，难道不是确实偏离了文革的目的而自己独走，实际上走到了资本主义的歧路上了吗？因此即使从策略上，这种权威也是有益的。而且这种权威来源于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带来的坚实合法性，与皇权的逻辑实质上完全不同。最重要的是，“奉旨造反论”，以及和它表面上完全相反

[9] 参见乔晞华《文革群众运动的动员、分裂与灭亡 ——以社会运动学视角》247-248 页。

的“两个文革”说，都是割裂领袖与群众的反马列毛主义谬论。列宁指出：“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不按照生产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区分的大多数同在生产的社会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10] 这些谬论把毛主席与群众对立起来，把文革放回封建王朝的逻辑而消解了关键的路线斗争与阶级斗争，却故意忽视毛主席作为工农的领袖、革命路线的司令部，本来就是和造反派同属一个阵营——工人阶级与贫下中农的阵营。

那么，实际的毛主席与地方造反派的关系，或者说，文革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如何的呢?

1、中央和地方能够直接互相影响。中央的指示和定性对地方的群众组织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地方的群众组织的形势信息，通过仍存在的国家机构、串联红卫兵（前期）和群众组织（后期）在北京的代表到达中央，影响着中央的决策（但可以被走资派阻断和用以传递错误信息，比如后述的广西）。

2、中央和地方也会通过其他途径影响。地方的生产等重要任务的完成情况也会影响决策；中央对党委、军队等等旧机构的态度和决策，也会间接影响到地方局势。

3、因此，当一个地方的形势变化时，可以通过中央对此的态度和互相的串联，间接影响到其他地方。一月风暴的上海、二月镇反的西宁、反复旧的山东，都因此达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

4、中央对地方仍是中央更强势。如果一个地方的造反派要求与中央文革派相违背，那么地方造反派往往会有悲剧性的后果。

[10] 引自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五、德国“左派”共产党人。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

尽管文革前三年最知名的是学生（红卫兵）的活动，但是**真正有着影响力和决定作用的还是工人和军队**。所以，文革前三年如果有一条“主线”的话，应该是**激进工人造反派与党委、反对激进造反派的军队和保守派群众组织的斗争**（这三者往往结成同盟：保守派群众组织先后受党委、反造军队支持，反造军队与党委常常关系亲密），而其他的斗争只能算支线。

在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的问题上，作为文革中的新事物，关于它们的各种奇谈怪论尤为猖獗。经过前面对群众组织的基本了解后，就可以理解群众组织、群众运动的列宁主义基础了。

首先是群众组织，它与党的新变化密切相关。列宁曾强调，要抵制小资产阶级性，“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而这正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谁哪怕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11]。然而，列宁在当时只发现了**小资产阶级会带来复辟的危险**，而没有也不具备条件发现社会主义在经济上胜利后，**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在党内**。而毛主席则发现了，无产阶级先锋队在社会主义阶段具有**两面性**：既有一贯作为先进部队的**革命性**一面，这意味着觉悟更高、更具有**无产阶级性**；又有**阴暗面**，这就是**党内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官僚主义作风**。这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阶段才有的（在暴力革命时期，同样有钻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和资产阶级影响导致的官僚主义作风），但是在暴力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代理人是可以通过党内斗争压制的，资产阶级作风是可以通过整风压制的；然而，在社会主义时期，由于党代表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控制了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和产品的分配权，党内资产阶级的力量增长了许多，官僚主义作风更加猖獗，在无外部帮助

[11] 引自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五、德国“左派”共产党人。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

的情况下，已经无法通过单一的党内斗争（党内斗争中可以有群众性运动，和群众运动的**区别在于是“逼迫党委闹革命”还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压制住，于是1966年前的斗争无法阻止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在大部分地方党委占据了统治地位。因此要补充党的革命性、揭露与压制党的阴暗面，必须从党外，也就是群众借助力量。

我们已经知道，群众组织分为被走资派蒙蔽或干脆出身于走资派家庭的保守派和与走资派斗争的造反派。保守派无非就是走资派在群众中扶植乃至控制的反革命力量，用于使用合于继续革命的手段对抗继续革命。他们不是革命派，也就无所谓党性派性，而执行的都是走资派的意志。造反派则复杂一些。造反派一方面有**党性。党性即阶级性的集中体现，就是把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看作是最高利益。**因此，**革命性**就是一种党性，也是造反派主要具有的党性。另一方面，造反派又有**派性。派性就是以本团体、本派别的利害为处理问题的“最高准则”，闹派性的人忘记了无产阶级的整个革命利益，忘记了革命的全局，心目中只有自己的组织、自己的派别，随时随地闹宗派主义，因而做出种种错误行为。**本质上，**派性是扩大了的个人主义和将无产阶级情感限于小团体的宗派主义，是小资产阶级偏见**（这种偏见一方面源于新工人旧的小生产的残余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另一方面得到了工厂家长制[12]的容纳与滋养）**的结果**。这种两面性，决定了造反派一方面可以用自己的党性（革命性）打击走资派，补充党的新鲜血液，赋予党更强的革命性；另一方面觉悟不足，难以从全局考虑无产阶级的利益，需要党进行领导，以克服派性。应注意，**派性不同于列宁所说的工联主义**。在列宁看来，工联主义之所以是自发性工人运动的必然结果，是因为资产阶级统治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12] 关于二十七年工厂家长制的详细情况，可阅读安舟《Disenfranchised: The Rise and Fall of Industrial Citizenship in China》进行了解。

必然成为工人首先接触和容易接受的意识形态。[13] 然而在社会主义下，工人阶级已经不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统治了，虽然存在小资产阶级偏见影响，于是有了派性，但是此时的自发运动就可以如上文所述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党性）的一面。

因此，群众组织理论本质上是继续革命党群关系理论的一部分，是**对列宁先锋队理论的完善**。资本主义社会时期产生、应对资本主义统治的状况的先锋队（外部灌输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时期旧问题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能仍然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组织，是因为还需要消除小资产阶级偏见的影响。这种情况的差别，也能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理论中群众性组织（以工会为代表）和继续革命中群众组织的作用和位置大相径庭：**因为灌输论的基础改变了，所以灌输论的内容也需要改变。**

其次是群众运动，上文已经提到它是为了解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占统治地位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新发现的问题，必须更新先锋队理论，将阻碍继续革命的那些党的纪律、党的条条框框打破；但是，也不能因此忽视从旧社会带来的旧剥削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复辟倾向，因此**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打倒、新秩序建立后又必须重新建立党的纪律**。这个过程的总体表现，就是群众组织破除了走资派控制的党组织代表的旧秩序，之后党领导着建立新秩序，在过程中扬弃群众组织（取消组织，保留队伍）的过程。这种目的在于与党内资产阶级和官僚主义作风斗争的相互作用，就构成了继续革命党群关系的理论的核心。

[13] “但是读者会问：自发的运动，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进行的运动，为什么就恰恰会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控制呢？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然而最流行的（而且时刻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复活起来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却自发地而又最猖狂地迫使工人接受它。”——列宁《怎么办？》二 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到了 1972 年，经过数年的斗争，先后打倒了刘邓集团和林彪集团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打退了刘少奇、邓小平和林彪的反动路线（林彪集团由于军队特殊性，只能用迂回的、不透明的高层斗争方式打倒，因而问题没有彻底解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重回统治地位，党内的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对比回到了相差无几的水平，党内斗争可以压制党内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作风后，群众运动由于有着派性的副作用，自然就会退居次要地位，退为解决具体问题的手段。在“批林批孔”一节中，我们将进一步结合史实分析这种斗争方式的变化。

以上是从列宁主义，或者具体来讲，从先锋队的角度而言的，而从群众视角看，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分别是对应着**“自己解放自己”**目的的组织形式和革命方式。群众组织的党性和派性，虽然其本质在文革前的群众中便存在，但都是在“自己解放自己”的过程中才涌现出来的。“自己解放自己”是以反修防修教育群众的实践在社教和四清失败后所提出的，由之前的党组织控制进程转为群众自己控制进程。当然，这不代表就否认了**党的领导**，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张力，党应该控制到什么程度是变化的、由局势决定的。“自己解放自己”最开始作为群众组织反对党委的口号出现，是反抗党委以身份压人的有力武器。之后，也成为判断党委是否执行革命路线的标准。这是继续革命中党群关系理论中的最后一部分。

可见，必须理解三个辩证关系才能从马列毛主义理解文革：**破与立的辩证关系、继续革命中群众组织与先锋队的辩证关系、群众组织自己解放自己与党的领导的辩证关系**。这是毛主义与自由主义的重要区别：自由主义最多认同到前者，而不可能认同到后者。

文革的性质

弄清楚文革，或者说继续革命的性质也是理解文革的前提。继续革命是一种激烈程度亚于我们所熟知的革命、高于一般的改革、改良的阶级斗争。我们所熟知的革命是暴力革命，采用内战形式；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以改变统治阶级为目的，是两个阶级的殊死搏斗；是恩格斯笔下“不是少数几个人活动的结果，而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14]“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15]式的革命。相反的，文革的发动是毛主席高瞻远瞩的结果，文革的目的是**进行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预防资本主义复辟**，而与此目的相匹配，文革的基本手段是**“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都是说服性质的非强迫方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革命主体不使用暴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首先体现在造反派对暴力的运用上：面对走资派及其武装的保守派的进攻，地方革命造反派仍然需要“文攻武卫”，通过暴力首先保障自己的生存（如1967年5月末提出“文攻武卫”的河南造反派[16]、七二零前的武汉造反派、长沙的湘江风雷残存组织），其次捍卫革命的利益（上海工总司踏平上柴联司）。因此，中央文革派一方面需要控制暴力的使用，防止暴力升级；另一方面也要允许适当的暴力使用。此外，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继续革命阶段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仍存在国家机器的暴力**，甚至在一些局势下，由于革命派的失误和走资派的利用，国家机器的暴力是反对继续革命的（清查五·一六最典型）。不过，这种暴力并不属于继续革命的范畴，而是属于社会主义革

[14] 引自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第一章。

[15] 引自恩格斯《论权威》。

[16] 关于该口号的历史，参见袁庚华口述，李素立采写并整理的《郑州文革武斗和“文攻武卫”口号——原河南二七公社“火指”负责人袁庚华专访》。

命的一般范畴。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对改造国家暴力的构想是减少暴力使用，实践是1966-1970年的“砍监放犯”[17]。不过，囿于现实的阶级斗争的需要，这条路线几乎没有实施，暴力在这期间反而升级了。不过，这仍能为毛主席对于新的国家机器的构想提供说明。

另一方面，文革和一般的改革、改良的区别是，**它号召群众深入参与到进程之中**，而之前的所有改革都从未有过这种群众参与度。因此，“社会冲突论”并不能解释文革，因为社会各阶层间的矛盾虽然也影响了文革的运动，但是并不是主流，主流是无产阶级与党内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社会上的**代表**，即革命派与走资派的矛盾——而前者并不构成任何阶层或阶级。而且这种阶级矛盾的特殊之处在于，两者并不是专政与被专政的关系，而是无产阶级专政会部分地被党内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取代，**两种专政关系之间相互斗争的关系**。文革中第一次提出群众不经过党的中介，自己解放自己，这点与之前所有列宁党领导的革命都迥异。事实上，文革最大的特点已经包含了以上性质，即继续革命有着新的政治力量——**群众组织**（前文已述）和建立在其基础上的新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详见后文）。

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就能分析三年文革论和十年文革论孰优孰劣了。“三年文革论”，如序言所述，是资产阶级学者提出的学说，与“两个文革说”是“社会冲突论”的孪生子。它认为只有前三年是文革，是因为只有前三年有群众冲击“官僚”甚至“极权体制”（实际上，这其实是列宁主义的科层制）的运动，有大规模、高烈度的“社会冲突”，而后七年则重建了官僚体制（科层制）。它把群众与中央撕裂并否认两者的文革是同一个运动，把前三年和后七年撕裂并否认后者的革命性，把十七年与前三年

[17] 指取消监狱、劳改、少管设施，将被关押者移至地方管制的政策。具体情况可参考 http://m.wyzxwk.com/content.php?classid=21&cpage=0&id=25534。

撕裂并完全否定前者。这是自由主义的社会冲突的观点，不是马列毛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观点。不过，还有一种文革中后期的“三年文革论”观念，它**将文化革命与斗批改视为两个连续的阶段，并统一于继续革命理论下**。毛主席为首的革命派们在这一时期对“文革”的观点，都是处于这种观念的语境。这**本质上与马列毛主义的“十年文革论”是相同的**，两者是同一观点的不同表述。不过在今天，文革的内涵已经变成继续革命的实践，这种观点就显得陈旧了。马列毛主义的“十年文革论”认为，**既然继续革命在 1969–1976 年还在进行，革命的结束是在 1976 年，那么这个休止符点在 1976 年无疑远优于 1969 年**。这是因为，在连续的革命中，每一个高峰都可以获得独立的定义；而在断裂发生之后，后革命的时代到来时，这一断裂将塑造作为整体的十年革命。因此，**十年文革论可以简洁而直接地追认后七年路线斗争和各领域制度改革的革命性质**，在表述上比文革中后期的三年文革论更好。当然，我们知道还有一种“十年文革论”——特色版本的十年革命论。它虽然把反革命写在脸上，但是却为革命的理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注脚——**走资派最清楚这场针对他们的革命是哪年结束的**。

文革成败的深层分析

（革命必然爆发又必然失败的）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

文革为什么能发生？为什么以群众运动为特点？最终为什么失败？对于这些问题，资产阶级用各式各样的唯心主义解释扰乱了人们的认识，所以我们为了在对文革的认识上破除历史唯心主义、树立历史唯物主义，必须从文革前中国社会的状况中寻找答

案。这是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8] 文革从具体形式和历程到这几个深层问题，都和文革前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

我们将时间拨回 1962 年。此时的中国还有着旧社会留下的旧剥削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旧思想残余和落后的经济，中国社会仍然需要长期艰巨的改造，且上一次彻底改造的尝试，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证明无法靠着群众的积极性一步实现彻底改造，过程中中央的领导失误和一些干部对政绩的追求导致的“五风”[19] 还带来严重的问题，和自然灾害一起导致了饥荒的后果。因此，走资派从“左”的一边跳到右的一边，并利用革命派的失误而变得更加强势，他们便成功建立了一套党委、厂长拥有着较大权力（与这段时期前后相比）的工厂管理体制。这时，工人的权力平均而言大约只有可以参与决定工会福利决策、影响干部任免的程度[20]。由于主观（试图探索一条新路）和客观（中国此时的统计能力和计算能力不足）条件的差异，中国计划经济的指令性仍然低于苏联，但同时探索新路的阻力也比较小。此外，鞍钢宪法虽然产生但尚未推广开来，在行政上和工厂中存在较为严格的等级制，生产关系上工人与干部在待遇、权力、地位等方面上下界限较为分明。这些因素都促进了资产阶级法权的膨胀。因此，工人积攒了不少不满的情绪。但在政治上，工人阶级已经拥有了领导阶级的崇高地位，这使得他们有意愿、有底气参与到文革的运动中，按照工人阶级的愿望改造社会。这就是文

[18] 引自《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一章。

[19] 指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

[20] 不过，工厂中工人的能量和权力随地区和行业等的不同有很大差异，难以一概而论。

革在工厂很快引起剧烈反应的根本原因。但另一方面，党委的领导整体上当然成绩是主要的，加上党在之前的革命与建设中已经建立了巨大的威信，所以文革前期大部分工人对党委迷信，于是保守派在工人中就有了很大的群众基础。

不过，只有这些社会条件对于解释文革的初期形势仍然不够。文革的特殊之处在于，作为**非暴力革命**（详见后文），它并不是社会矛盾已经到达必然爆发的程度的结果，在开始时也不具备革命局势，而是在偶然性的层面上，于毛主席个人的指挥下爆发的。如果毛主席没有坚持革命、坚持探索如何反修防修的方法，而是把在经济层面消灭剥削阶级当成社会主义革命的终点，那么文革确实不会发生。必须承认，一个革命政党的革命领袖如何，对该党、该革命一定会有很大的影响，这并不违反历史唯物主义。不过，**在必然性的层面上，无产阶级革命派想要深入推行革命路线与刘邓集团为首的走资派篡夺了很大一部分领导权、阻碍革命路线推行的矛盾使得一场剧烈的运动必然发生，并由于这时的生产关系与无产阶级的条件而能够具有极大的群众性**。这种必然性通过偶然性体现出来，因此即使没有文革前夕的《海瑞罢官》、彭罗陆杨，也一定有别的导火索。毛主席早期的努力包括：在政治上，苏联被赫鲁晓夫集团篡权后蜕变为修正主义的教训促使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开始了反修防修的探索：在理论上进行了中苏论战，将修正主义的问题摆到台面上，并初步提出了反修防修的理论；在实践上进行了社教与四清运动。

然而，在刘邓集团[21]的操纵下，四清运动虽然使阶级斗争的弦绷紧了，但是并没有把阶级斗争的矛头指向当权派，而是指向基层干部与群众，对他们搞打倒一大片，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也没有发动群众，而是大搞包办代替。结果，毛主席意识到靠现有的党组织内部自我清洗是无法反修防修的，最终便把目光放到了

[21] 指以刘少奇、邓小平为头子的走资派集团，详见索引。

群众身上[22]。后来的实践证明，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确实是反修防修的有效方式。此外，另一个结果是就是无产阶级与走资派[23]的阶级矛盾开始激化，不过激化到足以爆发还需要等到文革初期。

而文革最后的失败能在中国的阶级状况找到原因。虽然文革前对社会的改造在各领域较快地进行，但是远远不够。文革开始时，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化刚刚起步，快速工业化需要招进大量农民进城，这些新工人还保留了小农思想残余；无产阶级数量少，小资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等日益没落的阶级此时仍然旺盛，一些城市出身的工人沾染了小资产阶级或流氓无产阶级的习气。因此，工人队伍中还有大量不成熟的工人，他们的觉悟程度亟须提高。在种种因素下，面对内部产生的党内资产阶级这一比外部资产阶级更加凶恶的敌人，无产阶级仍然是弱小的。觉悟程度与文化水平的不足（这同样是旧社会的落后所致）都导致夺权后工人没有能力直接接管工厂和政府，自行管理生产；觉悟程度的不足还导致小资产阶级思想渗透进工人队伍，于是造反后即使是工人出身的造反派头头也出现**小资产阶级派性**[24]泛滥的缺点，工厂社会的家长制更是加重了这一点，使工人们的阶级意识被小共同体意识侵蚀。这一点上派性的“小资产阶级”性与其说指城市小资产阶级，不如说是指农民小资产阶级，即自耕农，因为这和旧式农民起义的各自为战、难以统合的特点十分相似。1967 年 1 月的夺权中，这一切带来了毁灭性后果。

[22] 必须指出，毛主席一直都重视群众的作用，鼓励群众自发的创举。可是，这一次他把群众的活动放到了更决定性的位置上。不过，在四清到文革之间的时期，他只是隐约提出要自下而上、认为要靠群众来打倒党内走资派等模糊的新想法，没有对群众运动的具体形式进行预测。

[23] 全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详见索引。

[24] 派性的表现包括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搞唯我独革，排斥别的派系，为了名分而打派仗、闹分裂；个人主义、以“我”为轴心，认为“老子天下第一”，乃至权欲熏心，于是和别的造反派争权夺利甚至想独揽大权而打派仗；在受委屈时不愿意退一点步，意气用事而不能大联合甚至打派仗；在取得优势后一味打击保守派而不会团结、不给出路，破坏大联合。

另一边，文革前夕的农村，机械化推广缓慢，集体经济并不巩固；农民文盲率仍然不低，而且思想觉悟方面，社会主义教育还在进行，对小农思想尚未取得决定性胜利，对宗族势力的斗争仍然任重道远。加上农村的阶级斗争、领导权问题是一以贯之地被强调，因此，文革在农村关注的是农村未来的大方向是走什么道路，聚焦于对农村进行改造和建设的各领域中的路线斗争，而不是城市那样的阶级领导权与生产关系变革。

文革的失败，有三个节点：一月风暴中夺权的失利，三次镇压运动对地方造反派的打击和文革最后革命派被“斩首”。夺权失利，是因为**一度夺权的造反派，内无法管理好城市与工厂，外无法互相团结成一体**。这首先是由于**工人造反派的不成熟**和由此导致的力量弱小，使得他们作为中坚却无力解决夺权中的种种问题。干部造反派本来应起到重要的统筹与辅助作用，但他们同样不成熟，由于多为较低级的干部，力量和地位有限，能力也不足，而且个人主义作风严重，此外和工人造反派也尚未磨合。而剩下的革命派干部大多还一时无法从资反路线[25]中转过弯来，因此实际上革命派干部对这些问题能起到的作用也很有限，使得对政府的夺权并不顺利。至于红卫兵和农民造反派，在夺权中对于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更是无法起到作用。甚至由于红卫兵更不成熟和小资产阶级性更泛滥，在很多造反派红卫兵主导一个省级群众组织的地方，造反派分裂更加严重，派性也闹得更厉害。因此，之后一切在城市进行的运动，除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或让工人阶级进驻各领域领导一切外，另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教育工人，消除派性、增强工人的阶级意识、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和锻炼工人的管理能力，并从靠边站的干部与工人中培养革命派干部。但是，造反派在大部分地区还是因陷入派性，夺权严重失利而没有站稳，

[25] 全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 1966 年 5 月末到 10 月初刘邓集团推行、各地党委普遍执行的一条镇压群众、阻碍文革进行的反革命路线。

随后又在派性中越陷越深，最终地方大权归于控制住局势的支左军队。三次镇压运动中，一大半省份的造反派组织被摧毁，力量严重削弱，使得军队退出后在与老干部走资派的斗争中处于大劣势。不过，斗争水平的提高弥补了组织力量的不足。然而，组织的残缺使得造反派被吸纳入党后难以把党组织改造为革命派用以对抗走资派的武器，而多陷入和走资派在党委的拉锯中，这在最后的覆灭中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走资派换到了武装斗争的赛道上，使造反派提升的斗争水平无法发挥。同时，派性虽然被基本消除，但是右倾路线的统治也是致命的。究其根源，小资产阶级正是一方面在革命高潮环境下容易“左”，因为自己或小团体的利益被触动，比谁都表现得激进，另一方面在安定团结环境下便容易右，看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敢打碎瓶瓶罐罐。于是，小资产阶级性又使得造反派不知不觉染上软弱性，而且由于中央文革派的忽视而没有进行纠正。走资派便利用了王张江姚的失误与这种软弱性，成功进行了政变与揭批查，将革命派一网打尽。可见，文革失败的根本原因正是上文所述的社会状况。

文革前夜

文革发动的准备期从1964年四清又一次搞成了包办代替的运动开始。四清的失败，使毛主席意识到党的内部运动的反修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开始寻找其他力量（比如1965年10月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26]），打倒党内露出狐狸尾巴的走资派们（中央的一些刘邓集团成员）。当然，毛主席此时已经发现的走资派寥寥无几，但他知道随着运动的深入，走资派一定会跳出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名称，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最开始仅仅意为要在上层建筑进行革命，并表明是从狭义的文化领域开始的。这是由于在文革前，文艺、教育部门已经被黑线专政（文革前夕除了这两个部门外，已被黑线专政的还有卫生部门和公检法部门）。不过，随着革命的发展，现实的继续革命实践被包括在了文革的内涵之中，使文革具有了远深于名称本身的内容。

从1965年末开始，中央革命派四面出击，在文艺学术领域，通过《海瑞罢官》[27]打倒了吴晗，彭真保他并封锁中央革命派支持的文章，又搞出“二月提纲”把争论限制在学术领域，于是在1966年4月彭真也被打倒；通过严慰冰事件[28]，打倒了主管意识形态的陆定一；罢免了偷偷在毛主席身旁安装窃听器的杨尚昆，换上汪东兴保证毛主席的安全。此外，同时被打倒的还有罗瑞卿，原因是过

[26] 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534页。

[27] 吴晗在1961年创作的历史戏剧，将海瑞拔高为站在农民的立场上，被认为是鼓吹分田、给彭德怀翻案。

[28] 指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送匿名信攻击林彪一家的事件。在1966年上半年，严慰冰被发现是匿名信的作者，于是陆定一被其他中央领导人用这件事攻击而倒台。

于张扬而引起其他军头和干部不满。这四个人就是著名的“彭罗陆杨”，他们或为刘邓集团一员，或与刘邓集团有着亲密的联系。这样，原来“针插不进”的文艺部的走资派被打垮，之后江青才能掌管并进行“文化”上的革命；刘邓集团的军事盟友罗瑞卿被**“剥笋”**，更加倚重林彪来为文革提供支持。这是因为林彪是此时军队的一把手[29]，而且从 1959 年庐山会议，尤其是 1962 年七千人大会开始就一直支持毛主席，在军队也进行革命化，是此时对进行剧烈革命表现得较为支持的军队领导人。当然，作为政治老手，刘邓集团也迅速与被打倒的人切割，并将矛头对准早已脱离工作的朱德[30]（把他当作了《通知》中“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暂时幸免于被针对，并且作为一线干部负责了最开始两个月的文革。

[29] 不过，从 1962 年开始，林彪由于长期生病，无法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30] 由于年龄较大，他早已退出政治中心，此时只是在几个机构挂名而已。

第一回合 群众组织从建立到夺权：唤起工农千百万，不周山下红旗乱

尽管有着争议（这来源于文革初期渐进式发动、逐渐深入的特点，此时革命派对怎么搞文革也没有明确的想法），1966 年 5 月 16 日的《通知》被普遍认为是之后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标志。此时，毛主席花了很大的努力使旧体系中凿开的文艺方面的口子发酵，同月高校以北大“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31] 为标志出现了反响。另一方面，毛主席继续稳住军队，把刘邓集团的盟友一一打倒，用和刘邓集团关系较远、较为支持文革的军头代替，并让林彪为文革背书（直到九大前，林彪还没有暴露出实质，因此中央文革派只是觉得林彪某些事情干得不妥，还完全没有认识到林彪的走资派本性；不过，在革命深入的过程中，中央文革派还是会在不知道对面是林彪的情况下与幕后是林彪的势力发生间接的冲突），防止军队妨碍文革。同时，他调整首都军事部署，加强警备，防止可能的军事政变（不过，他也对林彪热心于政变问题、大谈特谈政变感到不妥）。由于军队和党委两个体系、刘邓和林彪之间本身就有矛盾，而林彪不想军队受到冲击，因此最开始几个月，军队文革进行得远比地方平静。此外，彭真、陆定一所在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32] 被解散，随后中央文革小组[33]建立，中央文革派的势力被整合，并获得了指导运动的权力。

[31] 北大的这一张实际上不是第一张，但是由于被毛主席称赞而引起了很大反响。

[32] 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组长为彭真，成立于 1964 年，负责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毛主席对他们的工作一直不满意。

[33] 成立时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为副组长，组员有王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名称，在这时第一次出现，最开始仅仅意为要在上层建筑进行革命，并表明是从狭义的文化领域开始的。这是由于在文革前，文艺、教育部门已经被黑线专政（文革前夕除了这两个部门外，已被黑线专政的还有卫生部门和公检法部门）。不过，随着革命的发展，现实的继续革命实践被包括在了文革的内涵之中，使文革具有了远深于名称本身的内容。

在“五一六通知”的设想中，文革实际上也针对军队的走资派的[34]，但是军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内外敌人进攻和颠覆的压舱石具有特殊性。由于斗争的需要，军队虽然也进行了文革，但形式具有特殊性，以正面教育为主；毛主席也经常让军队在文革的风暴中不受冲击：1966 年军队不介入地方文革、1967 年初军队大部分单位不搞夺权、指示“军队的运动要和地方运动错开”和“军委八条”、8 月叫停“揪军内一小撮”。再加上军队内山头林立、各山头都将文革视为自己打击异己、扩张势力的工具使用，因此中央文革派也觉得军队情况错综复杂，尽量避免介入。可见，军队的继续革命该如何进行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处理得不尽人意，但是也谈不上是错误——即便今天进行复盘也难以给出一个更好的办法，何况前人！

从 5 月末开始，在高校很快就出现了一些自发跟进批评被点名的走资派和给党委提意见的先行者，在 6 月初部分学校的运动规模已经大到党委无法控制。刘邓集团作为一线领导，5 月末至 6 月初往学校派工作组，7月往工厂派工作队（有的地方也叫工作组），以控制文革进程。毛主席当时在杭州，最开始就不赞成，但是没有阻止。工作组迅速将初期的热潮打压下去，之后包办一切，严密控制着进程，手段包括：弃卒保帅抛出小走资派，或者甚至让所有学校干部不作区分地靠边站，以保护党委等大走资派；将矛

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人，成员在运动中也有过增减。

[34] “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五一六通知》。

头指向**黑五类师生**和“右派”等过去整的人；趁机打击看不顺眼的人；将社会矛盾转化为人际关系矛盾，默许师生攻击与自己关系不好的人，以示学校里进行了文革；将提意见的人打成右派围攻甚至进行迫害。他们最开始甚至不承认红卫兵，工作队则是组织批判彭罗陆杨和文艺界黑线，保护工厂党委，打击提意见的工人。就这样，工作组、工作队竭力维持旧秩序，把文革搞成了反右，使无产阶级与走资派的矛盾空前激化。从 6 月初工作组进学校到 7 月末工作组撤出这段时期被称为**“50 天白色恐怖”**。工作组撤出后，走资派又很快帮助多数派红卫兵操控选举，控制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十六条规定的新权力机构）。之后在 9 月，他们又组织了官办红卫兵。刘邓集团执行这样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便把自己的性质和人员暴露了出来，为地方革命派提供了造反的动力与对象，使他们迅速通过现实的经验明白了早期继续革命理论。

同时，这个时期工人还在酝酿，不满于工作组倒行逆施的学生的反抗正如历史上的其他时候一样成为运动之嚆矢。这是因为学生没有工作的束缚，加之“停课闹革命”，可以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运动中；另外，也因为四清时学生与学校已经积攒了矛盾。从 5 月末开始，资源多、信息灵通、对身份负有“责任感”、年轻气盛的中学红二代，由于对过去的中学没有足够偏袒自己而对中学当权派不满，首先强烈反对这些被工作组抛出的学校当权派，甚至有一部分因为工作组保护剩下的党委、团组织和工作组发生冲突。例如，清华附中的红二代不满于旧团组织与工作组，首先成立学生组织“红卫兵”并贴出一些表达造反精神的墙报。**在开始的这个阶段，这些老红卫兵虽然大部分后来走向反动，但这个时候却是革命的。**他们此时的行动是开向修正主义的第一枪，他们的组织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全新发明。毛主席从红卫兵的行动中，发现了群众组织（特指文革中不被党组织领导，只被党间接领导的组织形式）这一群众创造的新事物，并在之后把它推向全国。

面对刘邓集团的白色专政路线，7 月末开始中央文革派进行了一系列反击：他们直接反对工作组和党委的倒行逆施（如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并强令召回工作组，支持红卫兵的成立，发布**“十六条”**规定文革的精神和基本原则，推动**“大串联”**。毛主席还亲自在 8–11 月 8 次检阅红卫兵。在剩下的几个月里，中央文革派一方面和以血统论为代表的错误思想直接斗争，一方面将一些直接反对群众运动的地方领导调走或撤换，甚至在 10 月将对抗十六条、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做法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使各地造反派群众组织成立、进而发展壮大的决定性一击），并支持少数派红卫兵，打击血统论老红卫兵。



红八月中多数派红卫兵的一次行动

同样在 8 月，多数派红卫兵在血统论老红卫兵的带领下，走向社会，进行了一系列运动，被称为“红八月”，包括破四旧、抄家、迫害“牛鬼蛇神”（包括知识分子、旧剥削阶级和被打为右派的革命群众等）等等。这些活动中，破四旧本身确实是文化革命的一环，**它本身的革命性是不能否认的，也获得了许多群众的支持**；但是，其中个别打砸抢行为是否失当仍值得讨论。至于抄家和迫害牛鬼蛇神则是转移大方向的行为，将矛头指向了能量小得多的“死老虎”，手段也是“左”倾的。从整体的效果而言，红八月尽管确实起到了社会动员的效应，因此也得到革命派支持；

但是血统论老红卫兵的目的是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和窃取运动领导权，因此是反革命性质的运动。另一头，少数派红卫兵则没有怎么参与红八月，而是在学校反抗被走资派从幕后控制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揭批工作组的错误，获得了中央文革派的持续支持。

直到 1966 年 11 月，党委及其派出的工作组与党委支持的血统论老红卫兵，明明是文革真正的主要斗争对象，却先后是这段时期文革各运动的主导者。血统论老红卫兵顾名思义，宣扬反动的**血统论**[35]，因而同样不许黑五类造反（但是会成立“红外围”让其他成分者加入，充当自己狗腿子）；内部等级森明，以父母级别定高低；作为主要由刘邓集团子女控制的组织，支持刘邓集团。这些原因使得中央文革派从 10 月开始反对血统论老红卫兵。血统论老红卫兵红八月中的猖狂，得势时在学校内建立的血腥统治（他们使用法西斯手段对待师生，甚至把学校变成一座集中营），10–12 月争夺话语权的顽抗（靠批判已经被打倒的走资派来试图使批判止步于此而不是继续深入到红二代的爹妈身上，例如北京血统论老红卫兵批斗彭罗陆杨），甚至他们的服装（铜头皮带、军装）却成为了今天对红卫兵、乃至对文革的刻板印象，令人唏嘘。

大串联有效扭转了少数派红卫兵在全国普遍的劣势。尽管大串联开始的时候串联的人中，在北京已经开始保爹妈的血统论老红卫兵占多数，但是由于他们的到来捅破了各地党委维持的秩序，反而帮助了少数派的力量。像这样，在本地偏保的人，到其他地方后由于利益不直接相关，行为却偏造、乃至不久转变为造反派的情况，在文革中很常见。地方省 / 市 / 自治区委为了自保，普遍让相信党委、出身好的工人与学生组织成“赤卫队”和官办红卫兵，前者也成为第一批保守派工人组织。随着后期所有学生都

[35] 指可以用“鬼见愁”对联（北航附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进行概括的，一种主要在高干子弟中流行的反动思潮。它认为人的思想完全由家庭决定，因此高干子弟一定革命，黑五类出身的人一定反动。除了黑龙江等少数地方外，少数派 - 造反派都是鲜明反对血统论的。

能串联，反工作组、反血统论、反党委的思想广泛传播。到了10月批判资反路线后，少数派红卫兵紧跟号召成为造反派红卫兵，而大部分原来的多数派红卫兵都意识到了资反路线是怎么回事，不愿意跟着血统论老红卫兵和官办红卫兵保资反路线，转而加入造反派。少数派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经过大串联不仅很大程度扭转不利局面，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并使得全国血统论老红卫兵乃至保守派红卫兵迅速瓦解，残余的组织（如联动）也成为过街老鼠（如联动六冲公安部遭到群众的反对），以致1967年初在全国大部分大城市基本被击溃；还促进了工人造反派的形成与壮大。在1967年群众组织分化的时候，主要是他们进行激进造反派、温和造反派、保守派的甄别；他们也是联系地方造反派与中央造反派的纽带之一。



1966年11月9日，最早的工人造反派群众组织上海工总司成立

此外，革命派（与伪装成革命派）的干部在十六条发布后也逐渐以个人起来反对党委，他们后来从10月正式允许干部成立组织和串联开始逐渐形成了各机关单位的干部造反派组织。

1966 年的斗争有一个规律：**冲击旧秩序、领导群众运动者会得到中央文革派和革命群众支持而壮大；维护旧秩序、压制群众运动者会被中央文革派和革命群众抛弃走向灭亡。**

造反派工人斗争的开始标志着主线的开始，前面的学生斗争不过是序章。最开始，由于忙于生产、和党委的关系并不紧张，工人并没有太多精力和动力参加运动，加上中央禁止工厂成立组织，运动冷冷清清，只有少数工人提出对党委的意见。由于经验主义导致的迷信党委，在 7 月工作队（组）派驻后，大量工人被轻易地组织起来围攻作为个体提意见的工人，后者大多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十六条发布之后，被打击的工人开始联合在一起进行反击，并在串联的红卫兵攻击省 / 市 / 自治区委的影响下把矛头指向工作队（组）和党委，甚至进京上访。从 11 月初开始，虽然有着走资派的阻扰和禁令，在深入工厂的造反派红卫兵帮助下，作为少数派的被整工人迅速成立组织，可谓是被党委逼上梁山（当然，如导言所说造反派起来造反原因很多样很复杂，往往也有很多个人因素与历史因素在里面）。之后，工人造反派获得中央文革派认可，迅速壮大，并同样受到党委打压。但是造反派此时已经势不可挡地压倒了保守派，占据了优势，到了 1966 年末，党委已不敢再直接打压也无法打压下去工人造反派。硬的既然行不通，党委只好用软的一招，包括宣称支持以示紧跟中央（如武汉）、摆烂罢工（如上海）与用钱收买工人（这与对党委软弱不满的保守派工人停水停电、阻碍交通和罢工一起被称为经济主义妖风）。同时，经济主义妖风还得到了国民党遗少领导的全国性临时工组织“全红总”的支持，严重阻碍了革命的进行。于是，中央文革派激烈批判经济主义妖风，宣传“抓革命促生产”（不久，这又成为夺权后恢复秩序的口号），将其刹止。同时期的工人保守派、官办红卫兵本就已经陷入劣势，由于党委的光环褪去甚至

畏于支持，甚至有怒而反对省 / 市委的。在 1 月经济主义妖风被打击和造反派夺权中，保守派中许多被蒙蔽的群众意识到保守派的错误而脱离保守派组织，于是多数省 / 市 / 自治区级保守派土崩瓦解，只残存些工厂、街道、专区 / 地区级和县级的组织。工人造反派在许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取得优势，并成为造反派的领导力量与中坚力量，这是由革命的性质决定的。另一方面，由于天气入冬和流行性脑膜炎的流行，中央在12月开始叫停大串联（但到 1967 年 3 月才实际停止），并且再未重启。到 1967 年 3 月，学生运动的主舞台陆续回到本地，大部分甚至回到学校。红卫兵对局势的影响力随之骤降。

农村文革

比起城市，农村的运动规模则小很多（以总非正常死亡人数 /1966 年总人数为例，总计 88.7 万 ~198 万 /7.5 亿，其中农村为 75 万 ~150 万 /6.1 亿多，可估算出城市约为 13.7 万 ~48 万 / 近 1.4 亿）[36]。由于农村的特点，农村文革运动更加具有地区差异和偶然性，往往掺入宗族矛盾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遗留的干群矛盾，并且没什么影响力。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很多地方的党委都通过物质刺激撺掇农民打击反对派，阻挡造反派串联甚至让农民进城武斗。在 12 月中央仿照城市在农村试图推广造反运动，并且吸收了城市的造反运动的经验，使农村没有出现血统论老红卫兵式的组织。

农村前两年的进程和四清运动息息相关。农村的四清运动不仅延续到了文革，被指示仍按原部署进行，还在 12 月被纳入了文革运动。对于大部分比较激烈的地方，12 月四清工作队撤出后，形成的造保两派群众组织（除情况更复杂的红卫兵）主要是以四清批的干部与扶的干部为核心，两派矛盾来自四清导致的利益变

[36] 数据来自魏昂德、苏阳《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Countryside: Scope, Timing and Human Impact》、魏昂德《1966-1971 年中国国内的反抗与镇压》。

动。也有一些农民因为个人利益或跟风宗族而参与某一群众组织。至于大部分农民群众，则由于无法理解文革也没有利益纠葛，没有“自我解放自己”的欲望而未参与文革之中。到了 1967 年中期，农村也和城市一样打派仗。

此外，从 1966 年 8 月开始，受党委转移大方向影响，黑五类遭到迫害甚至屠杀。对于黑五类，正确的政策应该是**限制的同时也允许自力更生**，两者缺少一个就会“左”倾和右倾。农村还有一个特点是破四旧运动十分广泛，且持续时间更长些。破四旧本身的确是十七年革命的深化，是应该做的工作，只不过文革此时最紧要的任务是确保革命派掌握领导权。此外，对于旧社会（主要是封建的）残余更浓重的农村来说，破四旧的革命性比城市更大。

一月风暴

1967 年初，**“一月风暴”**标志着造反派中工人代替了学生，成为了革命的主力。从此，斗争的主要面变成了革命工人与走资派的斗争。

风暴的源头就是来势汹汹的经济主义妖风。面对省 / 市委鼓动经济主义妖风、煽动党委罢工的反抗，上海工人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指导下，决定彻底砸烂旧党委并自行组织生产，最终发展为全面夺权。密切关注着上海局势的中央迅速认可了这一行动，号召全国造反派以上海为模板夺权，于是上海引领起了全国范围的夺权浪潮。以工人造反派为中坚，全国大部分城市的造反派在中央支持下展现出惊人的力量，打倒了从基层到省一级绝大部分的党委，实行了夺权或筹备着夺权。甚至于，这种局势让没有倒台的许多地方军头走资派也不得不服软（如韦国清也去了桂林被激进造反派“老多”游街）。上海造反派的夺权发展到将行政权力夺走，并砸烂了以公检法为代表的被走资派篡夺权力的旧国家机器。不过，大部分地方形势则没那么好，公检法并没有像上海一样被砸烂。



上海造反派在一月风暴胜利后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

形势不好最主要的就是派性导致了严重的分裂，且没有得到很好的克服。从夺权前开始，之后很长一段时期，由于派性，造反派发生了分化，或是在一个大造反派组织内形成小山头（如工总司的三个兵团），或是大量小组织加入、挂靠或站队大组织形成一个（一般在有共同的保守派敌人时）或几个派系，此外还有大量观点极“左”、成分复杂的小组织游离在社会上，甚至还有的造反派组织有蜕化为保守派的（湖南高司）。1967 年初出现的派系大部分贯穿了之后的整个文革（如武汉钢新两派）。



1967 年 2 月 23 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2 月，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后在毛主席建议下改名上海革命委员会并实施**“三结合”**[37]。同时，其他省份也都进行了革委会的筹备。伴随着各省革委会的筹建过程的，是新秩序在斗争中逐渐建立。

[37] 指革命群众组织、人民解放军、革命领导干部的三结合，体现为革委会中有群众代表、军代表、干部代表。

众所周知，1966 年对巴黎公社原则的认可与呼唤却召唤出了革委会这个与公社原则相差甚远的实际。关于公社，《法兰西内战》有如下论述：“（工人阶级）……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它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如果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那是最违背公社精神不过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公社为了高效与责任明确，将权力集中到一起，而为了防止它的工作人员由于权力过大而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便对工作人员做出两条限制：普选并能随时罢免和低薪。因此，公社的要素可以总结为：集权、普选（包括定期换届、随时撤换）、低薪。然而我们知道，在这三点中，革委会和十七年国家机器都集权，革委会进而尝试精简机构，有一定成果；普选和随时罢免都未能实行，三结合中军代表靠任命，干部代表由群众推荐、党组织批准，群众代表是群众组织与中央和地方协商后再内部决定（普选、选拔或委任），均算不上公社式普选；低薪仅仅针对新干部（而且到了文革末期也有实际薪水增加的现象）和工厂干部[38]，而大多数当权的党政军老干部仍然拿着高薪。我们不禁要问：在对公社原则的宣传与学习中，怎么诞生出的却是“三结合”？实行“三结合”的革委会又是什么样的运行原理？为什么革委会没有实现公社的原则？最关键的是，这是否意味着以革委会代替公社是对公社的背叛？

[38] 毛主席在 1968 年说“……四是减薪，科室人员下放。厂长、副厂长的薪金要同工人差不多。”引自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 I 》1077 页，转引自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526 页。

对于最后一个问题，马克思随后写下的这一段话提供了一把钥匙：“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但是，无论廉价政府或‘真正共和国’，都不是它的终极目标，而只是它的伴生物。……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1871 年的阶级斗争形势所确立的原则本就不可能完全适用于 1967 年，这再正常不过了。革委会的形式，正是与阶级斗争的结果相适应的。

必须指出，首先夺权且表现最好、最引人注目的上海是当时中国无产阶级最强大、阶级意识最强的地方。但即使在上海，也出现了**镇压职能缺失**、现行反革命前门进后门出的现象，可见工人阶级还无力镇压阶级敌人，而这正是巴黎公社的覆辙。此外，很多造反派成员也有着经济主义的问题，甚至算不上革命派。在全国其他城市，情况甚至远远不如上海。在夺权后，派性的泛滥导致许多地方的造反派因为争权夺利而反目成仇，大打派仗，外加能力不足，使得很多地方的造反派无力管理好城市，甚至无力管理好工厂（应注意，这时的工厂管理不仅是生产的管理，还包括工厂社会方方面面的管理以及斗批改等文革提出的新任务），于是局面变得混乱，使造反派之后不得不将权力还给老干部，中央也不得不引入军队来管理城市与工厂（军代表由于同样不懂业务，很快也将具体事务的权力归还老干部），维持生产和秩序。[39] 不过，这不是简单的权力交还。工厂干部在革委会建立后相比文革前改善许多，虽然管理直接民主化仍任重道远，但官僚主义作风已明显减少，干群关系得到显著改善；并且大部分工厂干部能深入群众之中，参与一线劳动，听取工人意见，促进制度改革。

[39] 这部分情况可以参考李怀印《The Master in Bondage: Factory Workers in China, 1949－2019》197 页。

我们知道，普选和协商都是阶级斗争的手段，只是民主的形式与程度不同。事实上，当各种倾向的人一起进行普选时，结果往往是各方都无法接受，反而无法代表大多数的意见。[40] 既然群众既有革命的倾向也有保守的倾向，而协商的结果无疑比普选更能反映出革命的倾向（因为革命派的优势是力量而不是人数），那么就不应该纠结于民主的形式，因为**“决定领导机构本质的是执行什么路线，反映什么阶级的利益，而不是采用什么形式”**[41]。

无产阶级并不能立刻学会管理复杂的生产组织与国家机构，也需要克服资产阶级法权下残存的资本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最关键的是，需要掌握全新的革命理论。因此，对于那些觉得 1967 年就该公社化的人，毛主席的这段话批评他们正合适：“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42]

在这种局面下，毛主席提出“三结合”，最关键的目的是**将新权力机构纳入党的领导下**。应注意，这除了重新引入党的干部外，也包括吸收革命的造反派成员（不过，这一项得在一段时间的考验后才能进行）。因此，这一举措也会反过来利于党保持革命性。他正确地看到，对于此时的无产阶级而言，**为了进行生产和专政，列宁式政党的领导仍不得不保持很强势的形式**。一方面是造反派还无足够的觉悟和能力管理，另一方面是，造反派成员的鱼龙混杂无法保证它不依靠党也能够独自执行革命路线。此外，

[40] “大，中学校参加有各种组织，左派的，中间的，保守的，要求不经过协商，象巴黎公社选举。我一听说选举就不同意，不能光靠票数。果然，选出来大家不赞成。无记名票选，好象很民主，但不能代表大多数的意见。”，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周恩来对首都高校红卫兵的讲话，引自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二篇（上）》192 页。

[41] 引自《红旗》1968 年第 4 期 11 页。

[42] 引自毛主席《实践论》。

毛主席还提出改名的要求。诚然，“公社”的名字、形式也对革命派有吸引力，但是一方面恰如他所言，在各省以上海为榜样要求建立公社的形势下，如果全国都建立公社会导致**国体问题**，没必要因为这个不重要的形式、名义搞出麻烦；另一方面，也是向已经被上海掀起的革命风暴激怒的走资派军头妥协。

小结

文革的第一回合从 1966 年 5 月 16 日开始，到 1967 年 1 月夺权结束。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形成造反派并夺党委走资派的权。前期，走资派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暴露了自己的本质，也使得无产阶级革命派能争取到中间派，取得优势，击败保守派并迅速壮大。之后，造反派一鼓作气地进攻，一度似乎离革命派掌权的目标近在咫尺。然而，鱼龙混杂也使得造反派的头头不一定就是革命派，尤其锻炼时间的短暂使得头头很难在政治上成熟。于是，派性的裂痕使得大部分造反派走向分裂，而走资派的趁虚而入更是加重了这一点。而另一方面，造反派在夺权后，并没有足够的觉悟与能力马上管理好全部国家机器和工厂，于是不得不将权力经由军代表还给老干部，于是老干部得以站稳脚跟，并成为三结合中举足轻重的势力。

第二回合 从二月逆流到造反派进入革委会：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在1966年，尽管《通知》中要打倒的走资派范围囊括了军队，但是由于中央文革派和林彪等军头并不想军队被冲击，所以1966年军事系统除了军事院校均置身事外。1966年末开始，以黑材料问题（军队藏着黑材料不交出来）为导火索，随着有造反派开始出现冲击军区，军头越来越反对造反派，在内蒙古和新疆甚至出现反革命流血事件。另一方面，由于造反派普遍不够团结、或没有能力以管理生产运输等等维持城市正常运转，大部分靠边站的可争取干部也来不及这么快转变和亮相，在造反派夺权后的大部分地方都出现了基层行政组织瘫痪导致的无秩序无政府状态，中央文革派必须采取强力手段恢复秩序。同时，一些军队干部站到了革命派一边，其中山西甚至被毛主席点名表扬。多重作用下，毛主席批准“军委八条”，要求军队**支左**，试图靠军队对党的服从来借助军队的力量，帮助造反派将夺权的成果融入生产环节，使夺权回到抓革命促生产的革命路线上。但是作为伊始的文件，由于没有料到军队普遍支的是较保守的一方并且造成或加大了派系之间的裂痕，“军委八条”写得比较模糊（除了因为情况不明，也是为了避免包办代替），且大部分内容是约束造反派（为了帮助军队顺利介入）。

最高指示

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通告

当前，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新阶段，形势很好。但是，阶级敌人决不会甘心死亡，他们正在纠集各种反动势力，妄图进行垂死挣扎。

“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成立以来，在少数反革命分子操纵下，与湖北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互相勾结，干尽了坏事。他们竭力封锁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反对毛泽东思想。公然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斗争矛头指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革命的领导干部。拼命反对革命的“三结合”，到处单方强行夺权，实行反革命复辟。肆意违抗“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他们的滔天罪行，已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

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保障“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的顺利贯彻，保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特宣布从即日起，“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一律解散。现将有关问题通告如下：

一、对这个组织中的反革命分子及其后台，采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立功赎罪的政策，区别对待，彻底查处。

二、这个组织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头目，凡自动投案、彻底坦白交罪者，尤许他们改过自新，立功赎罪，给予从宽处理。抗拒、破坏或畏罪潜逃者，定予严惩。

三、参加这个组织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等牛鬼蛇神，一律不准改换姓名，伪造历史，再混入任何革命群众组织；如有破坏行为者，要依法严办。

四、这个组织中的群众是受蒙蔽的，是要革命的，一律不予追究。他们应当迅速醒悟过来，自觉地与其反革命头目严格划清界限，积极揭发和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罪行，真正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对他们应当采取积极热情的态度，团结、教育、帮助他们，欢迎他们参加革命群众组织，一道进行革命。

五、一切革命职工、革命干部，要最热烈地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更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成为现阶段全国劳动模范抓革命、促生产的最出色的模范。

一切革命群众组织，一切革命同志，广大民兵和我部队全体指战员，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行动起来，与专政机关密切配合，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壮大革命左派队伍，争取团结大多数，尽快地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完成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伟大战略任务，为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而共同奋斗！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附：“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反革命分子的罪行）

三月黑风中武汉造反派组织“工总”被支左部队取缔

紧接着，**“二月逆流”**[43]代表着老帅为首的元老们与中央文革派的彻底决裂。随之而来的就是“二月镇反”[44]、“三月黑风”——大部分军队在支左中肆意妄为地曲解和无视“军委八条”（叶剑英甚至扣压中央命令），在大部分省份攫取造反派夺走的权力，有的甚至借军管进行大抓捕，打压造反派，扶持保守派甚至旧党委（如武汉），使冲突升级。中央文革派没有实现让军队支持造反派夺权并稳定局势的目的，这是这些军头们阶级本质导致的必然结果。之后，中央文革派开始反击，在通过地方造反派的上访和串联的造反派红卫兵了解了各省情况后，把许多直接反对的军头和扶持起的党委调走或撤换。赵永夫因二·二三事件[45]被处理后，军头不敢再用军队直接攻击造反派。4月，毛主席让中央军委发布“十条命令”明确限制军队权力，造反派开始恢复力量，但军队仍不思悔改、阳奉阴违，在暗中继续支一派压一派，甚至有的地方将原已溃散的省/自治区级跨行业保守派复活（如武汉），被称为“四月黑风”。之后几个月，中央文革派都在忙于支持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和反对死灰复燃的保守派。

许多地方造反派在对待军队的态度上分裂为支持军队和反对军队的派系，一般后者更激进。在分裂后，很多地方的温和造反派与激进造反派进而出现了系统的观点差异（这种分歧往往不是根本性的，而是具体到某个小事、对一个矛盾两个方面的不同倾向的程度）。由于派性（如八一五和反到底），在许多地方出现

[43] 指以1967年2月16日“大闹怀仁堂”（在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前向中央文革派发难）为代表，叶剑英、聂荣臻、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军头揪合李先念、李富春、余秋里等老干部在2月的多次会议上疯狂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文革的逆流。这些走资派在1966年8-12月由于惯性一度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干，但在革命深入到夺权阶段后意识到了文革是针对自己这个阶级的，于是开始反对。

[44] 有的省叫做“二月黑风”。

[45] 指青海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囚禁支持造反派的青海省军区司令刘贤权，之后在围攻造反派占领的青海日报社时命令开枪，打死打伤几百名造反派，并在之后抓捕、迫害上万造反派群众的反革命事件。

了造反派内斗（如罗广斌[46]之死），其中多数甚至长期解决不了。随着不同派系间矛盾的激化，武斗之风从春季陆续开始，夏季达到鼎盛（因为毛主席7月提出了要武装左派），从秋季开始陆续减弱，随着革委会成立和稳固陆续结束（部分省份革委会成立后仍有反复）。



在6月武汉的武斗中，保守派围攻造反派据点后的现场

很多比较狡猾的军头没有被调走，比如搞表面支持暗中打压或拉一派打一派，这更加重了派性和派别间的矛盾。同时，军队的介入带来了热武器，使得武斗迅速升级（例如重庆就是这两点的典型）。

由上面可知，“恢复文革前秩序论”是对支左常见的错误理解，支左既没有做到恢复秩序，也不是为了恢复旧秩序。最开始许多地方确实一度通过镇压造反派恢复了夺权中部分瓦解的秩序，但随后这往往使得地方分为拥军反军两派打派仗，陷入更大的混乱，更不用说军队对这混乱还推波助澜。革命的目标是瓦解旧秩序与

[46]《红岩》作者、四川（重庆）激进造反派罗广斌，在被温和造反派八一五抓走数日后被发现死于楼下，死因有自杀说、谋杀说、逃跑说等。

建立新秩序，亲自发动文革的毛主席怎么可能为了维持旧秩序而派出军队呢？二月逆流时毛主席支持中央文革小组，与那些党政军元老们的决裂又怎么解释？这么想的人，实际上就站到保守派的立场去了，保守派正是认为最坏的秩序好过最好的无秩序，甚至认为毛主席是站在自己一边并且文革是“引蛇出洞”。

但是，必须指出，秩序的缺失对于工业化的城市是不可容忍的，因此恢复秩序势在必行，且此时只能依靠军队重建新秩序。文革并没有进入战争状态，不可能要求群众完全抛弃生活、回到战争年代的艰苦。生产的需求也要求秩序的重建。事实上，文革最大规模的武斗，也远不如革命战争激烈。不过，大部分地方如上所述没有结束混乱建立起新秩序，只有在少部分地方，造反派团结夺权、成功打击了内外分裂革命派力量的山头、对老干部留用得当（如上海），顺利建立了新秩序。

当然，中央文革派也知道武斗不仅和文革理论背道而驰，还会使群众感到厌倦，使文革失去人心，因此只能作为维持生存或提高生存能力的手段（文攻武卫）。因此，与走资派达成一定的妥协换取造反派的稳定存在被认可，走向以政治斗争代替武斗的新秩序是必须的。故中央文革派的态度始终是降低武斗烈度，从之前批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就有这个目的。于是，中央文革派在8月要求“停止揪军内一小撮”，并一直在督促革委会成立转到下一阶段，尤其是和各地造反派谈话，安排对立的造反派谈判，促进双方达成“大联合”即妥协。这些都是为了维持着低军事化程度，防止武斗损失过多。乃至于，在武斗高潮的1967年8月，中央文革派抛出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关戚，原因之一[47]可能就是为了换取军队的支持，因为不支持文革的军队是武斗的最大推手。

[47] 王关戚被打倒的原因至今仍扑朔迷离。王力当时因为“王八七”讲话等问题犯了很大错误，戚本禹、关锋当时也已经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一次性把他们三个全部抛出且没有把与他们立场相似的人补充上来，可以认定是对军队的妥协。

造反派对“批”服软的走资派和溃散的保守派也犯了不少错误甚至严重的错误（前者如老多游街韦国清时的过火行为是韦国清彻底走向反动并黑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后者如1967年8月武汉造反派对前百万雄师成员的报复）。关于如何正确对待保守派，正确的观点是：在保守派还是有领导层、有影响力、执行资反路线的完整组织时造保间矛盾是敌我矛盾，造反派应该依靠中央，使用武斗在内的手段保证自己的生存并打倒对方；在保守派已经被击溃时造保间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造反派应该放过一般群众，并争取其一般群众和基层组织，在他们改正错误、转换思想可以加以吸收。中央文革派也发过一些指示反对过火行为，但是由于为了保护群众热情没有硬性措施，造反派在“批”时怒火往往非常大，所以效果甚微。

作为群众组织而非先锋队的造反派，由于经验不足和充斥着许多仅仅因为相信毛主席甚至个人利益站在造反派一边的“同路人”和投机分子，**出现各种错误和不足是必然的**；由于其中的群众中真正具有无产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较少，而仅仅服从于自己的情绪和直接利益者较多（不过在斗争中后者不断转变为前者），造反派本身也比较幼稚（当然，造反派也在走向成熟），应有的鼓动起群众热情的激进行动与过火行为边界模糊，唯我独革的错误思想、革命惯性也都会使革命者误入“打倒一切”的歧路，所以**过火普遍存在是必然的**。许多能在斗争中脱颖而出的造反派在大浪淘沙中成为合格的地方造反派领袖需要时间，相对的很多地方造反派领袖并不具备应有的能力和素质；造反派自己也没有经过淘洗。再加上派性问题，1967–1968年的**大量非必要的、错误的武斗和过火行为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革命派走向劣势甚至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

不同省份，军队还在革委会的筹建中掌握了不同程度的话语权，由于军队整体偏保，形势对造反派有利的省是少数[48]。在这些地方，造反派的主要课题是如何在保持秩序的基础上妥善地与各单位保守派斗争、如何整合造反派内部的山头和处理外部反对自己的非保守派群众组织、如何保持政权不被老干部重新复旧。而在武斗比较激烈的地区（如武汉），革委会往往由于双方互不相让而难以筹建，最终成为“三凑合”，在勉强成立后、九大前成为类似于议会的政治斗争场所。在1968年春反三右一风[49]中，某些建立了革委会的省份的造反派发生分裂整合，形成新的两派（如湖南汽电派和湘瓷派，宁夏布派和米派），便进行了这种议会斗争。而军队则利用这种分裂，削弱造反派，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不过，军队毕竟还是得表现得支持造反派的，所以除广西、广东外，造反派在革委会初建时都有一定实权。

吸收了所有被中央认为是造反派的革委会的成立象征着秩序的恢复。在这之后，生产和运输就基本恢复了正常水平；专政机关基本恢复工作，现行反革命能够得到更全面地抓捕镇压。1967年，中央文革派为了让群众组织互相协商、促进大联合，号召群众组织进入三代会[50]。不过，很多地方革委会成立后才实现这一点。具体来说，群众组织中的学生绝大部分先进入红代会（1968

[48] 在1968年末，除作为首都而情况特殊的北京外，全国的省级行政区中，仅有上海是造反派一统天下，黑龙江、山东、云南、河南、贵州（温和）的造反派称得上强势，此外青海、甘肃、辽宁、吉林、安徽、浙江的造反派虽然没有那么强势，但革委会主任（均为支左军队首长）较为正确地执行中央政策，支持造反派并维护了造反派团结。

[49] 又称“三反一粉碎”，指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除了引起一些省份的造反派分裂整合进行议会斗争外，这个运动还引起另一些省份造反派分裂后陷入武斗。不过，这个运动最重要的作用是帮助造反派清洗了许多保守派掌权的县，遏制了地方上老保翻天的现象。

[50] 指革命职工代表会议（工代会）、红卫兵代表大会（红代会）、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农代会）。

年末至1969年初毕业分配和上山下乡[51]后红代会解体）；工人进入工代会（1973年工会恢复代替工代会后头头部分进入工会常委）；少数与城市较密切的农民群众组织进入农代会。

回到革委会，既然造反派无力独自掌权，那么在新权力机构中引入军代表和老干部，尤其是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也是必然的。而由于老干部有技术优势，军代表有专政机器的优势，而造反派却只有自己一派的群众，所以军代表和老干部的话语权更高也是必然的。于是，革委会就是这样的景象：群众代表因为群众组织人多势众，加上中央文革派的支持，在数量上最多，但是实权却依现实中斗争的结果而定，群众组织越有力量自然权力越大；军代表最有权，这是军队掌握着枪杆子的结果，在大部分地方，他们自然能凭借着军队带来的决定局势的力量成为主导方，再加上中央文革派对军队的让步，以及掌权的干部也需要在军队中的职务来方便斗争（王效禹、张春桥等人都在当上革委会主任后又任所在军区政委），导致最后大多数地方的革委会主任都是军队干部；干部代表由于两边群众组织的争取，也同样分裂为支持不同群众组织的各派，甚至偶尔在不满于现状时带着一部分工人分裂出新的一派（如湖南汽电派）。至于精简机构的反复，则是由于后续的斗争形势，每一次运动都会产生新的职位与权力真空，造

[51] 从1968年末开始，老三届、小三届（分别指1966、1967、1968年毕业的三届高中生和初中生）被半强制性安排到农村作为知青插队（大学生和中专生则直接分配为工人或在农村锻炼一两年后分配为工人）。上山下乡的目的包括：缩小三大差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疏散城市，防止知青在战争中损失殆尽；让知青与贫下中农朝夕相处，支援农村建设，并由贫下中农教育出反修防修的意识；防止学生脱产化，蜕变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防止派性较强的红卫兵影响大联合；在城市运转恢复过程中减少安排这些学生的负担。上山下乡带来了多方面影响，包括：不同出身、派别的学生待遇不同，引发不满；部分地方安排知青有严重问题，甚至出现许多强奸女知青案例；知青与农民朝夕相处，培养出与劳动人民的感情；知青忙于劳动，消磨了反修防修、参与运动的革命热情；农村获得了缺少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需的教育、卫生、机械等方面的人才。可以说，在改造农村和实用主义的目的上成功了，在改造知青的目的上整体失败了。

反派与走资派对此的争夺导致机构再次臃肿化；此外以党委为首，科层制的恢复也是重要原因，而且老干部走资派往往会倾向于全盘照搬旧体系。而低薪的失败（高薪其实本来也是高级干部才有的问题），则是由于这些走资派没有被打倒，那么对薪金、娱乐、医疗、物资等的特权等细枝末节的限制就不是重点，也难以实现。此外，新的干部也需要更高的工资来维持革命工作。

这样，我们就能回答上一章的问题了：革委会没有实现公社的原则是**现实的阶级斗争的结果，而并不是对公社原则的背叛**。当然也必须承认，革委会确实是和公社完全不同的机构了，它的运行原理与公社大相径庭。三结合后尤其是九大后革命派的主要目标就是**提高无产阶级的理论水平、阶级意识和管理能力，来为将来能贯彻公社原则作准备**。革委会只不过是用来恢复秩序、等待这个目标达成的过渡性工具。另外需要注意，老干部不等于走资派，虽然现实中走资派的划分因为要打击一小撮而划得很少，使得后来看剩下的“革命干部”似乎还是走资派占多数，但是实际上，老干部也有很多能在一定形势下站在革命的一边，即可以被拉拢。而且，老干部也不能等同于公社所面对的旧国家机器里的官僚，因此结合他们本身就是应有之义。只不过在具体的阶级斗争情况下，结合老干部的结果是造反派必须找到足够有分量的老干部出来“亮相”才能让干部们站在自己一边，才使得大部分走资派也能顺利过关。

而且，在革委会中进行“议会斗争”相比于武斗对造反派更有利。议会斗争中造反派不用直面武装差距，造反派的生存不会受到直接威胁，能保持群众政治参与度。不过，议会斗争依旧是复杂艰难的，且继承了之前造反派面对的阶级斗争局面和内部情况。实际上，大部分造反派在伊始的议会斗争中表现不佳。

从夺权到革委会的权力分配，每一步都往往走向武斗。因此，1967 年全年武斗烈度最大，次数最多。

小结

文革的第二回合从一月风暴开始，到革委会成立为止。在这一阶段的开始，支左、二月镇反和三、四月黑风等一系列事件，使得形势陡然逆转，革命派的目标也收缩为实现和平，让革命造反派通过“三结合”进入革委会并掌握实权，建立新秩序。为此，中央文革派一方面要摸清哪些群众组织是革命造反派，并给予支持；另一方面要摸清各部队的立场，并通过调度支持造反派。尽管有一些失误，但是整体上中央文革派基本做到了这两点。最终，造反派除了在少数偏远的地方由于自身错误和外部环境而走向灭亡外，在大部分地方成功保持了势力，在革委会中拥有一定实权。

第二回合失败的造反派：遍地哀鸿遍地血，斑竹一枝千滴泪

在1967年的斗争中，也出现了失败的造反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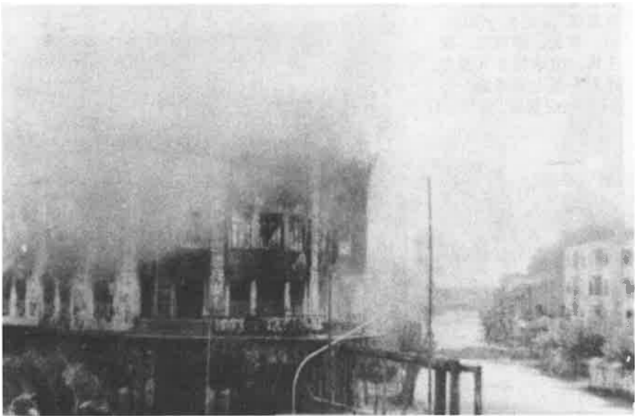
失败的地方造反派

一些较为偏远的地方由于造反派力量相对较小、消息闭塞，加之军队或保守派使用热武器对付造反派，从1967年开始出现了针对造反派的屠杀（如二·二三事件）。一些农村由于消息闭塞、走资派控制行政权力，从1966年开始出现对黑五类的屠杀（如赣南）。但是更多地方，这两种屠杀是同时进行的：或失势、或根基不稳的保守派甚至比较右的温和造反派，害怕“黑五类”跟着造反派一起造反，也为了证明自己的政治上的正确，于是对造反派的俘虏和黑五类进行屠杀。



联指枪毙被俘的四二二成员

以广西为例。**广西的屠杀是文革中最恶劣、持续时间最长、死亡人数最多、对造反派打击最大的屠杀。**从 1967 年在一些农村开始，直到 1970 年仍有零星，以 1968–1969 年为最（农村为主，城市为辅），**主要**针对黑五类、**有“历史问题”者**和造反派（**四二二、老多**），由韦国清撑腰的联指和韦国清控制的农村贫农组织和革委会甚至采用了取受害者人肉、人肝而食（**对所有类型的受害者**）[52]、水淹（对南宁的四二二）、活埋（农村**地主、富农**）、灭族（农村**地主、富农**）等骇人手段，屠杀有明确记录者 8.5 万多人[53]，总计 15 万 –20 万人[54]，令人发指。从这些惨无人道的屠杀中，除了对走资派罪行的愤怒之外，我们更要知道广西造反派是如何一步步从优势变成劣势直到被绞杀的。



1968 年 7 月 17 日，联指炮击四二二据点南宁百货大楼，使大楼三层起火

[52] 被吃的受害者有名有姓者达 421 人之多，参见宋永毅《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 (1)》12 页、23-31 页。

[53] 参见《广西“文革”档案资料》前言，宋永毅《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 (1)》32 页。

[54] 晏乐斌在《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中回忆韦国清曾在谈话中承认非正常死亡 15 万，民间调查数字有达到 20 万的。参见宋永毅《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 (1)》20 页注 2。

一方面，韦国清作为一个精明狡猾、政治手腕高超的走资派，前期在北京遥控指挥假装自己没有参与两派之争，后期宣布四二二内有反共救国军，把支持造反派的干部打成走资派，严密封锁消息和人员流动，设立军队控制的贫农委员会，谎报武斗情况。在广东掌权的军头黄永胜的配合下，韦国清瞒过了中央和其他省份，甚至争得了中央对他掌权的支持。同时，韦国清作为军头，直接武装打击造反派。另一方面，广西造反派的头头“三人团”一方面强行反韦、手段粗糙强硬，甚至在 1967 年 8 月在北京殴打韦国清；另一方面政治水平低下，往圈套里跳致使造反派在 1967–1968 年犯了很多政治上不利于己的错误（比如韦国清曾在多个城市挑起武斗，结果四二二被动地迎战，反被诬陷挑起武斗），都是被屠杀很惨的内因。[55] 于是，在 1968 年 2 月黄永胜将支持四二二的 6984 部队调走后，四二二组织被从薄弱的地方各个击破，联指在每一个打下四二二的城市都进行了屠杀。1968 年，韦国清在造反派占领铁路、抢夺援越物资后又上报中央虚假夸张、掐头去尾的信息，促使中央文革派在 1968 年通过了七·三布告（正是直接针对广西而发的）。当然，广西造反派在绝境下的武装反抗（包括抢夺援越物资）和中央的强行禁止武斗（详见后）都不是错误，此时广西造反派和中央文革派间确实出现了甚至是根本性的利益冲突。但也必须指出，这是广西特有的情况，因为联指是唯一不被定性为保守组织的保守派，也是唯一此时没有倒台的省级保守组织。

随后，韦国清顺理成章宣布四二二是反革命，很快靠武器优势（南宁）和恫吓造反派放下武器（桂林）彻底绞杀了造反派的反抗，局势沦为单方面屠杀。在封锁了省界“清理流窜人员”（即逃命的四二二成员）、农村也进行屠杀的情况下，四二二几乎被赶尽杀绝。在后来，广西就这样成了全国造反派势力最弱的省份（完

[55] 可参考张雄飞《“桂林老多”四十四年祭》。

全消失，只有革委会中的傀儡）。韦国清则由于在抗美援越中的重要作用扶摇直上（同时这也是他始终没有被撤换，且在后来能控制后来多次运动为自己所用的重要因素），牢牢控制了广西。

军内造反派

军队在文革初期没有进行文革，但是军校是例外。军校从5月末也开始研究如何进行文革，搞法与一般院校类似，但是强调运动在党委领导下进行，6月派来的工作组没有否定党委。8月后，工作组虽然撤出，但是运动仍然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因此仍然冷冷清清。军队在1966年8月开始文革，主要形式是开展“四大”（师级以上）和正面宣传（师级以下），同时一些中下层干部被冲击，遭到撤换和审查。师级以上造反的干部会与造反派走到一起，与当权的军队干部形成对立。尽管限制较多且直到次年1月前军队内外都几乎隔绝，但是也有揪斗发生，除了倒台的军头会被揪斗外，就是中央和省军区的一些军头被军内造反派揪斗。军内造反派在1966年10月解除禁令后形成，其中军校造反派进程与同期的一般高校的红卫兵同步。军内造反派直接针对并批斗的人中包括了邱会作等林彪山头的人，又受到杨成武、萧华为首的另一派军头投机支持，卷入军队派系斗争。在二月逆流后，军内造反派也被镇压，在4月军委十条后重新活跃。5月的五一三事件中，军校造反派错误冲击军内保守派的演出而被中央文革派与林彪山头批评，随后走向衰落，并在10月走向解体[56]，成员遭到林彪山头的打击报复。萧华也因为五一三事件而不好过，并在军内保守派的冲击与林彪的打击下，于8月倒台。

杨成武成功从五一三事件中抽身，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但后来，由于杨成武紧跟林彪搞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使毛主席不满意，

[56] 参见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487页、叶青《“文革”时期福建群众组织研究》276页。

又耍弄两面派手法，脚踏江青、林彪两条船，借江青的拉拢耍横，引起江青不满，同时又插手林彪山头控制的军队，引起林彪不满，1968年春，他也被中央文革派抛弃、进而在林彪攻击下倒台了（即杨余傅事件，同时该事件也是1968年反三右一风的导火索）。林彪的山头也借此机会控制中央军委工作、进而形成宗派。这是中央文革派维系和林彪的盟友关系、保持军队稳定之举。

由于中央文革派此时需要林彪这一派的军队支持，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暂时的**政治联盟**，所以毛主席默许了林彪山头在中央的做大，中央文革派也没有意愿给予军内造反派支持（前文也说了中央文革派本来也没有能力恰当地介入）。在支左之后，对于军队，毛主席试图达到的状态是不同山头互相制约，维持住钢丝上的平衡。因此，林彪在中央不断扳倒其他山头、最终在中央做大的同时，毛主席在地方又尽力保住其他山头。包括叫停“揪军内一小撮”，也有防止林彪借此将别的山头打垮而做大的目的。于是，军队在文革中没有发生自下而上地打倒省级及以上的走资派，也不是所有军头走资派都倒台，而只有由中央自上而下调走撤换一部分军头，而只要求它“支造”，即认可造反派的存在。至于为什么不针对林彪山头在内采用更激进的运动方式，一方面是缘于南北军事压力等国际因素，今天的我们无法想象在冷战时代，一只保持着战斗力的军队对于防止政权被武装颠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缘于国内因素，文革需要军队一定程度的支持，如果与军队彻底闹掰，控制不住枪杆子，文革面临的危险将大大增加。

第三回合 通往天下大治：赤县原藏万种邪，更无豪杰怕熊罴

进入1968年中期，形势似乎已经具备了走向“天下大治”的条件。在少数武斗仍在进行的地方，造反派越发不利。中央定性为保守组织的省级组织都已经被击溃（广西的联指被中央定性为造反派吸收了保守派组织，西藏大联指被定性为群众组织，新疆三促派被定性为革命群众组织），甚至县级的都已经进行了打击。保守派（除上述三个）已经式微，然而造反派间仍然内斗不止，死伤、对经济的不利影响、人心思安和造反派转逍遥都使得造反派人数和影响力减弱。在其他地方，吸收了造反派的、三结合的革委会在大部分省份的全面成立并初步巩固，群众运动的目标表面上都已经达到，使得中央文革派判断自下而上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新的秩序已经成立，因此开始了自上而下的第二阶段，却被军队实际掌握了权力。军队的主导使得造反派进一步被削弱。中央文革派在1968年下半年加大力度制止武斗，并要求军头做到一碗水端平，以尽可能保持造反派的生存和影响力，维护造反派的团结。到1968年9月，全国省级革委会全部成立，武斗也基本消失。1968–1969年，群众组织陆续倒旗解散，进入三代会。另一头，中央的局势在斗争中也走向暂时的尘埃落定，中央文革派需要开一次大会来确认文革在第一阶段的成果，总结第一阶段的经验。于是，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完成彻底打倒刘少奇的手续，再次批判二月逆流，并宣布要召开九大。之后，经过5个月的筹备，九大于1969年4月召开。这标志着通过中央文革派与军头为代表的走资派在一定程度上妥协的方式（“安定团结”

和宣布林彪为接班人），第一阶段完全结束和第二阶段全面开始，文革的主要斗争方式从群众运动转为政治斗争。

清理阶级队伍



清队中的批斗会

中央文革派发动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运动本意是要开启文革第二阶段，打击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类似于肃反），尤其是清查潜伏的历史反革命（包括叛徒和参加反动组织）和特务，此外计划打击的对象也包含走资派，并加强对黑五类的专政。1968 年 5 月开始，清队于全国陆续铺开（5 月前在少数地方已经开始试点），此时自下而上打击走资派的运动已经基本步入尾声，革委会已经大量成立，中央文革派认为已经到了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阶段了（继续革命的理论也是建立革委会、大批判后应该清队——早在 1967 年毛主席就提出了需要清队并进行了试点）。本身清队就在冷战的紧张化背景下对旧社会的帮会

残余、黑五类、潜藏的特务等过度反应，高估了其数量和危险性（当然，这不能说明这些危险完全不存在）。又由于中央文革派经过长期做工作和调整部队部署，看到此时各革委会掌权的军队和造反派相处比较融洽、也能执行中央路线将造反派结合进各级革委会，军队也没有对造反派此时掌握一定的实权表现不满，于是误判这些军队是支持文革、能执行文革路线的，也因为此时军队占有主导地位，“自上而下”的权力被授予给了军队，导致在军队掌握大量权力的时候在许多地方又被授予了打击其反对的造反派的权力（当然，军队如果有支持的一派，这一派也会参与）。但是地方掌权的军队许多并不是真心支持文革，而是服从于自己的阶级利益，有的甚至突然背刺造反派，有的则是继续拉一派打一派，通过派驻自己控制下的工宣队和军宣队、剥夺造反派的实权以控制各级革委会权力、罗织罪名清洗、批斗造反派、办学习班、设立专案组并逼供来整造反派，把“清队”搞成“清造”，甚至扶持保守派与走资派进入各级革委会，以将造反派排挤出权力层，使革委会里的群众代表沦为政治花瓶（造反派主导的地方、造反派政治水平高的地方往往未被打击，甚至有反推军队的）。但另一方面，很多地方的清队也有造反派的参与，带有群众运动的色彩，因此和之后完全科层制的镇压又有所不同。由此可见，**清队中造反派受打击表面上是清队所导致的结果，根本上是造反派自身力量弱小的结果。**军队在政治斗争的第一回合通过出其不意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巩固了自己力量的优势。但是相比于1967年2–4月军队让不少的地方造反派组织直接濒于解体，清队中造反派受到的打击还是较小的。除了造反派受到惨重打击之外，清队也打击到了许多成分没有问题、且属于逍遥派的人，这往往是杀良冒功与个人恩怨的结果。

干部中除了被打击的造反派一边的干部会跟着遭殃外，尚未亮相被解放的干部如果没有被中央保护，那么一般也会作为“走资派”成为打击对象。亮相后没有紧跟被打击的造反派的干部、亮相另一边的干部、中央保护的干部则一般不会被打击。而打击的轻重，则与干部的历史履历有关，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进行清队的军队、军代表。

对于黑五类，则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左”倾对待，这一次的理由一个和打击前述的逍遥派相同，此外也和抓特务、历史反革命的对象有关。必须理解，革命中暴力必然会伤及“无辜者”，即便文革并不是暴力革命，这种现象也是不得不接受的。而且考虑到伤及无辜的军代表的立场，倒不如说这是走资派趁机制造的白色恐怖的结果。

不久，毛主席在发现清队运动偏离初衷后也进行了**纠偏**。在1968年末强调要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多做教育工作[57]。纠偏持续到九大前后，例如这时叫停了内蒙古“挖肃”[58]，批评了滕海清。

清队在九大前烈度大，之后和“一打三反”合流，在林彪死后基本从官方话语中消失。

此外，“人道主义者”所关注的知识分子被“迫害致死”的事件主要发生在清队期间。然而，事实上这些知识分子往往并不是置身事外的，他们也参与了所在单位文革的运动，并像

[57] 参见毛主席对《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发 新华印刷厂在对待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的报告》的批示。

[58] 即“清查内人党”，是由滕海清主持的一场运动，清队开始后与清队合流。“内人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指60年代后由第二代“内人党”残余分子复活的秘密组织“新内人党”，这个组织很可能存在，但规模一定很小。在文革前多重矛盾、问题交织的背景下，这次运动严重地扩大化，并伴随着大汉族主义，导致许多无辜群众，尤其是蒙古族群众被残酷迫害甚至拷打致死，造成很恶劣的影响。造反派在运动中受压、遭到残酷迫害，有的地方老保翻天。运动中揪出48万多新内人党（一说34.6万），打死1.6万余人（参见内蒙古政府1980年文件《关于林彪、江青“四人帮”制造“内人党”假案的报告》）。值得注意的是，它与康生关系不大。

其他地方一样分裂为造保两派（如七机部造反派九一六与保守派九一五）。此外，“十六条”中对科学家等知识分子也是保护的。[59]由此可以看出，这些迫害**首先是所在单位发生的斗争的结果**，而不是什么文革使人看不起知识分子的结果（当然，许多主持清队的军代表一贯看不起知识分子）。此外，这些单位的清队往往受到人际关系和军代表个人倾向之类的偶然因素的严重影响。可见，这些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前面的其他城市群众本质上没有什么显著不同，如果能明白前面一般的清队，也自然能理解对知识分子的清队。不过，知识分子确实会在清队中更容易受到打击，因为他们基本都有留学、在国民党政府大学任职或在旧社会与国民党高层相识的经历，又有不少在“双百”期间被打成右派，所以历史问题往往较多。当然，这不是说他们应该被打击，而只是解释悲剧的原因。总之，**是军队违反政策、直接制造了这些悲剧，那么就应该由军队为此负大部分责任。**

同时，农村的清队也存在大量“迫害”。农村的清队烈度也很大，存在着严重的扩大化和“左”倾过火现象，死亡人数虽然无法统计，但可以肯定远远超过城市。主要内容同样是反特和加强对黑五类的专政，但在基层走样极为严重。

军队虽然在地方主导了清队，但是内部也同样针对特务和历史问题进行了清队。和其他清队类似，有外国（例如苏联）和旧军队背景的人更容易受到打击，同时军头也利用清队打击军队里曾反对过他们的“刺头”，并伴随着一定的杀良冒功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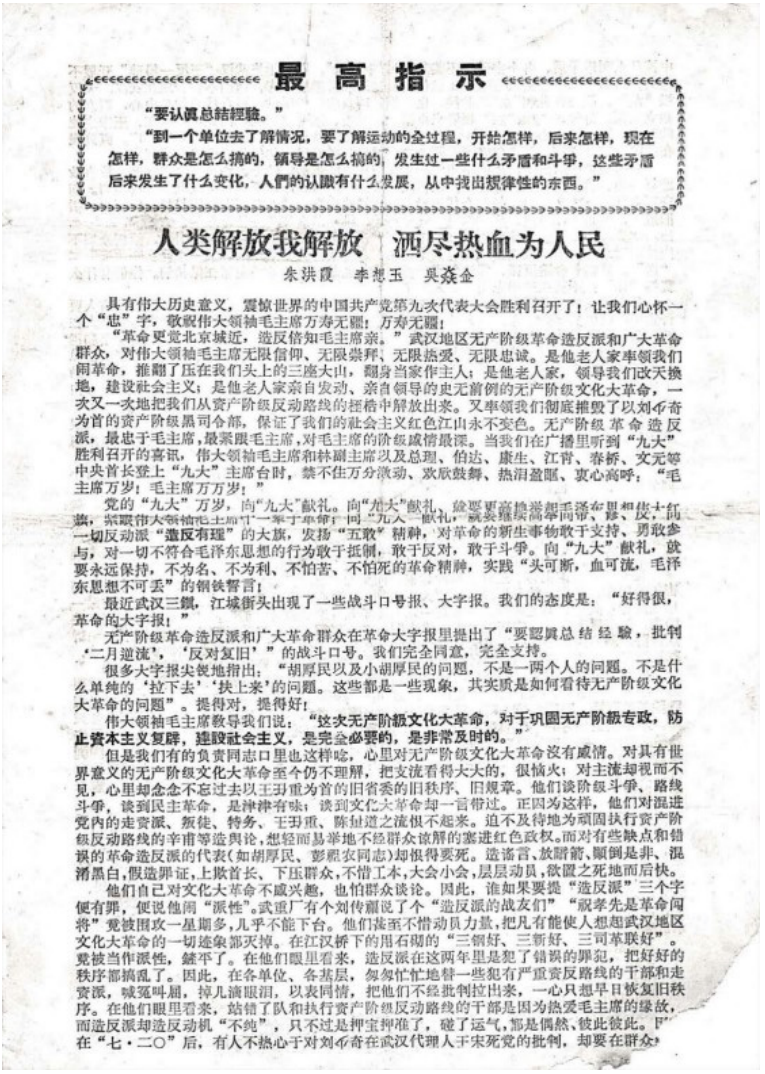
然而，常被忽视的一点是，清队作为恢复秩序的一次运动，它的效果是多方面的。在秩序崩溃后，必然伴生的是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的行为，在造反派内部也有许多在造反中浑水摸鱼、搞烧

[59] “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第八条

杀抢掠的人，此外特务也在蠢蠢欲动。另一方面，革委会所建立的新秩序并不稳固。反过来说，这种情况也加重了冷战中的中央文革派对形势严重性的估计。因此清队打击这些人，对于维护社会主义有着重要作用，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扩大化。因此，综合来看，必须指出**清队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也起到了不小的积极作用**。

反复旧

反复旧的设想在 1967 年的中央文革派控制的报纸中开始出现，在 1968 年 10 月由《红旗》正式提出，很快被部分省份的造反派作为旗帜。运动于 1968 年 11 月自山东开始，之后在全国许多省份进行，至 1969 年 5 月结束。“反复旧”的提法中，“复旧”指的是革委会没有吸收新鲜血液、还是原班人马，甚至因而产生独立王国的现象。这些现象在走资派仍然掌权的地方很普遍。所以，它针对的是钻入革委会的走资派，因此在进行的省区，造反派借此大造声势，以获得更多权力，壮大造反派在革委会中的势力。在一些地方，造反派在清队中被整，怒气很大，甚至大到了压倒派性，因此反复旧迅速展开；而在派性严重的造反派掌权地区，也想要趁机打倒对立的造反派与保守派，扩大权力。在第一种地方（如武汉），造反派最后一次进行大规模群众运动，由于原群众组织已经倒旗解散，便通过工代会等组织进行运动，试图把之前清队时被军队收走的权夺回来，把被抓的造反派放出来。在后一种地方，造反派则搞得老干部到中央上访，同时也让反对他们的军头不满。自然而然地，反复旧的造反派与军队出现了大量冲突，甚至有了派仗的苗头，也就违背了中央“安定团结”的方针，导致中央文革派没有出面支持（也有中央文革派忙于准备九大无暇顾及的因素）。



最高指示

“要认真总结经验。”

“到一个单位去了解情况，要了解运动的全过程，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群众是怎么搞的，领导是怎么搞的，发生过一些什么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的认识有什么发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人类解放我解放 洒尽热血为人民

朱洪霞 李想玉 吴森金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震惊世界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了！让我们心怀一个“忠”字，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革命更觉北京城近，造反倍知毛主席亲。”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是他老人家率领我们闹革命，推翻了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翻身当家作主人；是他老人家，领导我们改天换地，建设社会主义；是他老人家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次又一次地把我们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又率领我们彻底摧毁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黑司令部，保证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最忠于毛主席，最紧跟毛主席，对毛主席的阶级感情最深。当我们在广播里听到“九大”胜利召开的喜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以及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春桥、文元等中央首长登上“九大”主席台时，禁不住万分激动、欢欣鼓舞、热泪盈眶、衷心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党的“九大”万岁，向“九大”献礼。向“九大”献礼，就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illegible]一系列革命[illegible]同“九大一献礼，就要继续高举[illegible]一切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发扬“五敢”精神，对革命的新生事物敢于支持、勇敢参与，对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敢于抵制，敢于反对，敢于斗争。向“九大”献礼，就要永远保持，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实践“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的钢铁誓言！

最近武汉三镇，江城街头出现了一些战斗口号报、大字报。我们的态度是：“好得很，革命的大字报！”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革命大字报里提出了“要认真总结经验，批判‘二月逆流’，‘反对复旧’”的战斗口号。我们完全同意，完全支持。

很多大字报尖锐地指出：“胡厚民以及小胡厚民的问题，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不是什么单纯的‘拉下去’‘扶上来’的问题。这些都是一些现象，其实质是如何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提得对，提得好！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但是我们有的负责同志口里也这样哈，心里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感情。对具有世界意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今仍不理解，把支流看得大大的，很恼火；对主流却视而不见，心里却念念不忘过去以王羽重为首的旧省委的旧秩序、旧规章。他们谈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谈到民主革命，是神神有味；谈到文化大革命却一言带过。正因为这样，他们对混进党内的走资派、叛徒、特务、王羽重、陈短道之流恨不起来。迫不及待地为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辛甫等造舆论，想轻而易举地不经群众谅解的塞进红色政权。而对有些缺点和错误的革命造反派的代表（如胡厚民、彭积农同志）却恨得要死。造谣言，放暗箭，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假造罪证，上欺首长、下压群众，不惜工本，大会小会，层层动员，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他们自己对文化大革命不感兴趣，也怕群众谈论。因此，谁如果要提“造反派”三个字便有罪，便说他闹“派性”。武重厂有个刘传福说了个“造反派的战友们”“就孝先是革命闯将”竟被围攻一星期多，几乎不能下台。他们蓄至不惜动员力量，把几有能使人想起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一切迹象都灭掉。在江汉桥下的用石砌的“三钢好、三新好、三司革联好”。竟被当作派性，铲平了。在他们眼里看来，造反派在这两年里是犯了错误的罪犯，把好好的秩序都搞乱了。因此，在各单位、各基层，匆匆忙忙地替一些犯有严重资反路线的干部和走资派，喊冤叫屈，掉几滴眼泪，以表同情，把他们不经批判拉出来，一心只想早日恢复旧秩序。在他们眼里看来，站错了队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是因为热爱毛主席的缘故，而造反派却造反动机“不纯”，只不过是押宝押准了，碰了运气，那是偶然、彼此彼此。[illegible]在“七·二〇”后，有人不热心于对刘少奇在武汉代理人于宋死党的批判，却要在群众

武汉的反复旧开始于 1969 年 3 月，4 月 10 日钢新两派代表性人物共同贴出这篇宣言

山东（此外黑龙江也类似）属于后者，且是反复旧兴亡的关键省份。由于山东的造反派头头王效禹和本地保守派、中央走资派与军头（尤其是南京军区的许世友）关系都很差，而且在1968年恶化，无力控制山东；而且山东的反复旧打击面过大（打击三结合的干部、军代表过大，对各地革委会大换血）、有派性作祟，再加上许多军头的反对，中央文革派已经保不住他了，于是他在九大后被作为“安定团结”的靶子打倒，反复旧运动也随之被批判并归于沉寂。黑龙江则是由于潘复生大搞派性，打压大量反对自己的造反派和老干部而被撤换。而反复旧揭开的问题——军队的排挤与打压，也只得到一定的缓解而并没有解决。尽管复旧的现象可以说本身在三结合老干部时无法避免，由于妥协还变得十分严重，但中央文革派却为了稳定只承认复旧现象，而认为九大后的革委会都在无产阶级手里，无反复旧的必要。[60] 这一次，中央文革派明知是造反派的反击却仍然打击，虽然是作为向军队的妥协，但是仍然可以说是**失策**的——这些失败的造反派之后几乎成为了军队砧板上的鱼肉，也使这些省份的造反派基本上失去权力。后来，反复旧在清查五·一六中也成为了罪状之一。造反派在政治斗争中又败。

小结

文革的第三回合从清队开始，历经反复旧，到九大结束。在这一阶段，革命派一方面需要稳定新秩序和确认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准备与苏修打人民战争，另一方面需要在革委会中争取与保持权力，在群众中保持影响力与动员能力。其中，前者对走资派没什么打击甚至可以用来巩固自己的权力，而后者对走资派不利，因此前者阻力显著小于后者。然而，由于现实的力量对比是革命派比走资派在中央势均力敌，在地方占据劣势，于是结果是前者基本完成，但是后者遭遇了失败。

[60] 在谈“反复旧”时毛主席说：“个别的复旧是有的，但提‘反复旧’的口号是错误的。”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252-253页。

九大 文革第一阶段结束



1969 年 4 月，中共九大于北京召开

九大标志着文革第一阶段，即通过群众运动让无产阶级革命派将权力夺到手中的阶段的结束，和文革第二阶段，即通过教育群众来反修防修、防止资产阶级复辟的阶段的开始。不过，第二阶段首先的任务是**将权力膨胀、想要抢班夺权的林彪集团铲除。**

经过紧锣密鼓的准备，九大在 1969 年 4 月召开，从代表来京开始，全程都有严格的保密措施，这是出于战备的考虑。

九大召开前，除中学红卫兵[61]外，群众组织已经基本“倒旗”解散。在九大的人选上，中央文革派经过激烈的斗争与一定的妥协让步，使得一部分革命派能成为代表，同时不得不将林彪确立为接班人，让他的妻子叶群进入政治局，林彪集团进入中央委员会核心层，作为对他们地位的认可，以安抚林彪集团。此外，军

[61] 中学红卫兵通过转而代行早已瘫痪的共青团的职能继续存在。

队势力膨胀导致代表中军人的占比也大幅上升。另一方面，之前被打倒和边缘化的许多干部也被毛主席要求选进中央委员会，作为对他们检讨自己错误的肯定。在九大上，中央文革派主要完成了以下几个目标：初步总结了继续革命理论，将它确定为**党的基本政治路线**，并肯定前三年文革群众运动的手段与反修防修的成果；肯定了革委会的革命性，再次规定了革委会的地位、权力，实际上暂时放弃了群众运动的手段；围绕政治报告与林彪、陈伯达进行斗争，看出他们想搞唯生产力论、放弃阶级斗争的企图，明确了之后的重点仍然是**阶级斗争**。九大之后，**政治局的集体领导**代替了中央碰头会和中央文革，党的组织生活全面恢复，革命派在党组织中的势力有一定的扩大；斗批改全面铺开，成为文革的主要内容，旧规章制度的改革、新制度的尝试广泛展开；“吐故纳新”中的“吐故”，即打倒走资派干部基本结束，“纳新”，即从造反派中吸收被证明是革命派的成员逐渐开始。但是，在林彪集团的阻挠下，革命派只能进行一定的妥协，并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没有获得足够的实权，尤其是中央文革派无法在军队中争得权力，这使得他们没有根基，很容易成为花瓶，这在后面的斗争中会明显地体现出来。

九大之后，1969 年剩下的半年里，尤其是从 10 月开始[62]，中苏冲突到达最剑拔弩张的时期，一切围绕着战备进行。乃至于 10 月开始，主要领导人和党政机关都战备疏散到各地，仅周恩来和军委办事组等留守北京。在 1970 年冲突逐渐缓和后，国内局势开始了新一轮的运动。

[62] 1969 年 3 月至 10 月中旬为高度戒备状态，1969 年 10 月中旬到 1970 年 4 月下旬为临战状态，1970 年四月下旬后再次转入高度戒备状态。参见余汝信《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1011 页。

科层制镇压：高天滚滚寒流急，洒向人间都是怨

在九大之后，周恩来主导了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两场运动。其中，一打三反再次犯“左”倾错误，制造了大量冤案。造反派在清查五·一六中再次被广泛、严厉地打击。对这两场运动的研究都面临严重的史料缺失、档案不公开的困扰，使得至今这两场运动都迷雾重重，以至于周恩来对此的重大责任都尚未能定为铁案。但是，一些间接证据表明，**周恩来对这两场运动的扩大化负有重大责任。**

一打三反运动是文革中最严厉的一次运动。运动从1970年2月开始，“一打”主要针对之前文革中的现行反革命、武斗杀人犯，最开始的目的是**备战**，于是由于紧张的气氛，抓人、杀人严重扩大化，抓了很多只是有历史问题和小错误的人，并且大量罪不至死的人也被枪毙；更糟糕的是，在最高法精简人员、无力复核大量死刑的情况下，中央为了方便地方行政，便下放死刑复核权，先下放到省[63]，后来甚至下放到县，恶化了杀人扩大化现象。林彪集团也趁机兴风作浪，打击异己。此外，出现的问题还包括走资派趁机对造反派头头打击报复（尤其是抓住武斗、批斗打人等事件大做文章）、杀良冒功、针对知识分子等其他清队出现过的问题。短短一年的时间内，全国挖出184万多“特务”“叛徒”“现行反革命”，非正常死亡十余万人，28万余人被逮捕，几千人被判死刑。[64]在10月公安会议上，毛主席在发现运动杀人过多后指

[63]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

[64] 参见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篇（上）》376页。

出“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的”。1971 年 2 月会议纪要下发后，运动迅速结束。

另外，一打三反除了“一打”（打击反革命破坏运动），还有“三反”（反对铺张浪费、投机倒把、贪污盗窃）。三反针对的是经济犯，打击了秩序崩坏导致的农村资本主义复辟和在城乡泛滥的黑市，稳定了因运动松弛的城市生产秩序，促进了生产的恢复。



清查五·一六中的批斗大会

清查五·一六运动是文革中扑朔迷离的一场运动，历史细节缺失严重，不过影响却很直接。它的基本原因是在冷战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周恩来忽悠住了中央文革派很长一段时间，使他们确信有一个隐蔽而广泛的反革命秘密组织“五·一六”。“五·一六”指的是“五·一六兵团”，一个存在于 1967 年北京的极 “左”派小组织。当时在一部分极“左”派中存在着一股反周思潮，他们反对周恩来是为了获得新的激进性，本质上是“唯我独革”思想的一个变种，因此他们实际上已经偏离了革命路线。于是，他们刚在 5 月 16 日亮相，便很快因为反周而受到严厉的打击。

10 月，经过细节未知的追查，毛主席错误判断并指示五・一六背后存在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并有着黑后台。之后，五・一六就成为打击人的一个罪名，被打倒的王关戚杨余傅等人都被安上了“五・一六黑后台”的身份。但直到 1969 年，挖五・一六都是仅限于北京与高层的一个运动。在 1969 年，毛主席在中苏冲突的高潮又想起五・一六的事，于是指责北京不抓五・一六。[65] 之后周恩来借题发挥，要求挖五・一六“搞深搞透”[66]。毛主席当时还支持，但是到 1970 年 2 月就开始降温，指出五・一六数量少、抓得早，不要乱挖、不要搞逼供信 [67][68]。1970 年 3 月，“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简称批清）运动正式开始，但因为提出了不要扩大化，初期烈度不高。然而，到了 10 月，毛主席对“一风吹”（指运动像一阵风，没有深入）不满意，于是随后在 11 月，周恩来指示**“重在罪行”**，不再看和“五・一六兵团”的组织关系，而是只要干过“极左”的事、搞过“阴谋活动”，甚至包括“背着中央开会”就可以定性为“五・一六”。[69] 于是清查五・一六从此彻底扩大化 [70]，一发不可收拾。1971 年 11 月，随着林彪集团的覆灭，林彪也被算进了五・一六黑后台 [71]。到了 12 月，毛主席再次降火，说五・一六“没那么多吧？有的是打击

[65] 参见吴德回忆录《风雨十年记事》，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119 页。

[66] 参见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讲话讲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部分，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120-121 页。

[67] 意为“一逼就供，一供就信”。

[68] 参见一九七〇年二月，毛泽东关于清查“五•一六”问题的意见，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124 页。

[69] 参见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一日，周恩来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时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同上，126 页。

[70] 有许多造反派之后怨恨周恩来，就是因为这一指示使得清查五•一六范围猛增。

[71] 毛主席相信了这一说法，参见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四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的讲话，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414 页。

报复打成的吧？”最后，运动在1972年下半年逐渐结束（事实结束，没有正式文件宣布）。

清查五·一六在许多省份对造反派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打击，在剩余的大部分省份也迫害了不少造反派，且扩大化也波及了许多逍遥派，约有上千万人被打为五·一六。这些省份的军头往往直接将反对军队、反对“大联合”作为罪名，将反对自己的造反派成批打成五·一六，并大肆使用逼供信等手段屈打成招。例如，许世友[72]为了打击反对自己的造反派和老干部（应注意，打击老干部是江苏的特例，不是普遍情况），在江苏抓了26万以上的五·一六，致死致残2540人，致残三四千人（致死致残数量为官方数据，实际数量至少两倍以上）。[73]当时南京甚至有“五·一六，家家有，不是亲来就是友”的说法，可见扩大化的严重程度。在他被调走后，造反派和老干部甚至一度联手翻案。此外，有些省份将清查五·一六和清查省内的极“左”派联系起来（如湖北的“北决扬”），于是这些省份的造反派除了被打为五·一六外又被打为这些极“左”派的分子。

事实上，清查五·一六中抓的“阴谋集团”都是子虚乌有的，对五·一六的各种判断，无论是后台还是进行各种极“左”行动（围困中南海揪刘少奇、火烧英国代办处、揪军内一小撮等等）都和五·一六没什么关系。中央文革派在清查五·一六中，虽然反对扩大化和逼供信，但是由于相信五·一六是个大阴谋集团、搞各种破坏，且仍然广泛地隐藏在各处，所以要求不能一风吹，要稳准狠地抓出五·一六。这种认知的失误被周恩来以及掌权的走资派利用，使得造反派大批地被抓，又一次受到惨烈的打击。一打

[72] 许世友有一个广泛流传的梗“能文能武，长相十分英俊”，指的事之一就是清查五·一六。此外，“从紫金山天文台200人中挖出180个特务”也是他清查五·一六中干的事。

[73] 参见刘定汉《当代江苏简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第235页；《江苏省志·中共志》，2002年，第320页；潘祝平《江苏清查「5·16」冤案》，《炎黄春秋》2007年，第11期；董国强《“批林批孔”运动与江苏“军管”的终结》。

三反和清查五·一六标志着**周恩来在九大后逐渐脱离革命派阵营，投向走资派阵营。**

小结

我们可以将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这三场重建秩序后的镇压运动进行对比：清队和一打三反都是多领域、有必要的运动，而清查五·一六是完全可以避免、没有任何革命意义的运动。清队的结果取决于各派的力量对比形势；一打三反的结果因下放死刑权而在结果上有判刑过重的特点，来源于中央的判断与决策失误，并在周恩来的纵容下迟迟没有刹住；清查五·一六是纯粹的走资派打击异己的运动，效果有且仅有再次削弱造反派。在死亡人数上，清队（除去情况特殊的广西和内蒙古）> 一打三反 > 清查五·一六。这是因为清队打击面广，又带有报复因素和绩效因素，而且杀人是主要手段；一打三反枪毙的主要是“首恶”和思想犯，打击范围没那么大；清查五·一六中以抓为主，死亡一般是逼供而死或迫害致死，枪毙有但是很少。如果说清队还是文革的范畴，是建立新秩序的尝试被军头歪曲的话，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则是完全与群众无关、与文革无关的，旧式国家机器完成的专政。

不过，在大部分造反派不被革委会主任支持的地方，这三场运动的影响共性是主要的：它们渐进式地剥夺造反派的权力，对造反派进行迫害。一般而言，清队是对从领导层到基层的造反派进行一次次微型的、表面上互不关联的、理由较为充分的打击和排挤，一打三反是专门腾出一只手明显地针对造反派头头进行集中打击和排挤，清查五·一六是对所有造反派进行看起来莫名其妙的打击。**经过这三次清洗，造反派丧失了一大批领袖（被杀或被关押），丧失了部分战斗力，几乎彻底丧失了从上到下各级革委会中的权力。**

林彪集团的覆灭：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九大中，林彪集团彻底形成了共进退、有意识地以林彪为中心反对革命派的宗派，他们的右派嘴脸已经开始暴露，完全站在文革的对立面，不想让文革的第二阶段进行，他们想干的事与后来的元老派无异，同时他们的势力也在清队和备战中大大膨胀。九大中，毛主席隐约认识到围绕林彪形成了一个宗派集团。九大后，“李必达事件”[74]更让毛主席渐渐意识到林彪集团的野心。因此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已经无法妥协，不得不集中力量对付林彪集团。但是，此时林彪集团还没有完全发展和暴露，毛主席只是觉得军队有问题、不正常，还是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开展斗争。革命派与林彪集团斗争的历史，本就是高层斗争，同样扑朔迷离，因此不得不将现在已知的史实较详细地铺开。

毛主席首先是将各种事务尽量绕开林彪集团。例如，改革国务院机构，将国务院的权力压缩的同时，将林彪党羽排除在外；在战备疏散时，中央决策将林彪冷落在一边等。不过，这一时期由于战备压力，不可能太大动作。

之后，从 1970 年 3 月开始，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中央文革派与林彪集团进行了长期的交锋。毛主席坚持不设、不担任国家主席，而林彪则要求设立、要求毛主席担任。这是毛林第一次明面上产生如此明显的观点分歧。两人的争论从 3 月一直

[74] 李必达事件，指在九大刚闭幕时，林彪集团秘密串联、反对江青的言行被黄永胜的秘书李必达发现，他写了检举信并送达中央，但是也被黄永胜发现，李必达本人随后被黄永胜关押迫害。

进行到 7 月，以林彪对此的沉默告终。但是，林彪仍然让手下坚持要求设国家主席。

随后，在 8–9 月的庐山会议上，林彪集团与中央文革派，尤其是张春桥进行了新一次交锋。林彪集团之前就一直很防备张春桥。在庐山会议前夕修改宪法的讨论中，关于国家主席存废再次爆发争论。随后，吴法宪和张春桥关于宪法中吹捧毛主席的言论存废爆发激烈争论，要求删除的张春桥最终主动退缩，林彪则认可了要求保存的吴法宪的说法，这说法很快发展为**“天才论”**。因此，庐山会议双方便围绕“天才论”展开了交锋。



庐山会议上的林彪

为了理解这段历史，我们必须知道林彪集团的常用伎俩就是形式主义、吹捧毛主席，并在这层外衣下面塞自己的黑货。在文革前三年，他们就在“讲政治”、推广毛泽东思想的外衣下，模糊路线斗争、搞锦标主义。这一次，他们要设国家主席、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是用这种风险小的行为进行试探，而不断的要求则是猜测毛主席的不同意可能是在谦虚；毛主席不同意，是因为国家主席的职务增加了额外的负担，担任这一刘少奇刚担任过的

职务也留下话柄，不担任更是给林彪集团留下机会。而林彪集团之所以吹捧毛主席天才，则是为了让资历尚浅的林立果作为“天才”快速上升。为此，在7月林立果抛出自己的“讲用报告”后，林彪集团就已经组织了全军的学习和吹捧。相对的，毛主席在九大后一直在为个人崇拜降火，刹止了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活动，并多次在各种场合表达了对自己“四个伟大”等叫法的不满。

庐山会议上，首先，林彪在24日开幕的讲话上，在“天才论”和国家主席问题上不点名批评了张春桥的观点。在会议之后的时间里，林彪集团频繁串联，统一行动。在25日随后的分组讨论会上，陈伯达从导师的著作中拼凑出“天才语录”，试图用导师的话来为“天才论”背书，并由汪东兴散发。随后，汪东兴又建议恢复国家主席职位，在他所在的华北组引起巨大反响，大部分人都赞成在宪法中写入国家主席职位。于是第二天26日上午，华北组分发简报，将反对设立国家主席打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使其他组也跟进批判，林彪集团成员更是煽风点火。对此，毛主席立刻作出反击，下午就明确不设国家主席并严厉批评陈伯达，停止讨论林彪的开幕讲话，收回简报并让陈伯达作检查。然后，毛主席一直到31日都在找各政治局委员谈话。而另一边，周恩来和康生也在和林彪集团成员谈话，追查统一口径的情况，并查清了“天才语录”的出笼经过，在27日将责任确定到吴法宪、汪东兴、陈伯达、陈毅的头上。于是次日28日，周恩来让吴法宪做检讨，却让他保护林彪，替林彪担责任。30日黄永胜上山，毛主席批评他搞突然袭击，却一直谈论江青和张春桥这两个和林彪集团最不对付的革命派。31日，林彪集团决定各自检讨，不承认是自己一伙人，并且不涉及刚上山的黄永胜（假装山上和山下无联系）、需要保护的林彪、陈伯达和汪东兴。同时，毛主席写下《我的一点意见》，批判陈伯达的天才论。之后，陈伯达很快就先后在政治局扩大会议被批判、审查、软禁、成立专案组调查

历史问题。庐山会议标志着林彪集团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宗派集团，发展出自己的理论纲领和政治目标，完全跳出来进行宗派活动和政治攻势，性质从政治错误发展到了篡党夺权，第十次路线斗争全面展开。

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再次使用“剥笋”，将陈伯达先剥下来打倒，暂时不动林彪，以免打草惊蛇。黄永胜等人果然没有意识到目标是林彪。但是，林彪已经隐约觉得不对劲，让这些党羽“照常工作”“有事多向总理报告”，企图蛰伏起来，并认为自己最严重有“彭德怀第二”的风险。

之后，毛主席在和林彪谈话时有换掉吴法宪的空军司令之意，林彪尽力保护。同时，主席拒绝了吴法宪的多次求见。在吴法宪的检讨送达后，毛主席指出吴法宪的问题是不光明正大，并强调要反潮流。在叶群的检讨送达后，他又指出陈伯达犯的是路线错误。不过，这时他仍然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没有逼得太死。同时，汪东兴积极参与批陈，成功使自己的问题完全蒙混过关。

11 月，中央组织宣传组成立，林彪集团被排除在外，宣传组下辖的原军管单位于是转归革命派控制。同时，往林彪集团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掺进谢富治、纪登奎。“批陈整风”也在这时开始，不过很快毛主席强调了重点是“批陈”，也就是将与陈伯达有关系的林彪党羽剿除，整风是次要的，以叫停地方走资派借机对几乎不可能没听过陈伯达讲话的造反派的迫害。然而，之后一个月里批陈的会议却都开得不痛不痒，被毛主席批评。次年 1 月，陈伯达罪行被公开，并在各地进行了批陈整风。

1971 年 3 月，轮到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检讨，毛主席认为检讨得很好，对他们几个没有太追究。同时，林立果开始行动，研究林彪接班问题，并炮制了《571 工程纪要》。直到此时，毛主席仍然对林彪集团抱有改正的希望。然而，林彪在听完报告后表示拥护，却没有作检讨的意思。毛主席得知后，大怒并警告四

大金刚“到了悬崖边沿”“能不能拉回来全靠自己”。随后 4 月的批陈整风汇报会上，林彪开始未参加，毛主席便要求延长会议。第四天林彪急忙回到北京，但是仍不愿出席和讲话。毛主席自然也不好屈尊讲话，便不出门，由周恩来作总结，将军委办事组定为路线错误、宗派主义和人民内部矛盾。可以看出，此时林彪已经拉不回来了，毛主席只能先怀柔其党羽，以便针对林彪本人。

之后，毛林关系急转直下，双方先是见面也不交流，后来甚至不再见面。同时，林立果秘密进行了反革命政变的筹备，拉起了自己的“小舰队”。他计划秘密发动政变，除掉毛主席等革命派，秘密处决各地的造反派头头，解放老干部走资派，经济上放开贸易，最终让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可见，本质上林彪集团与一般的走资派没有差别。

8月，毛主席提出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并打算召开四届人大，由张春桥（主持）、纪登奎、李德生组成筹备小组，将林彪集团排除在外，标志着毛主席准备向林彪集团发动总攻。之后，毛主席南巡，与各地方领导人谈话，准备彻底铲除林彪集团，不过仍然在表面保持怀柔的态度。南巡开始后，将准备召开全会和人大的消息传达给林彪，给他施压。在南巡中，毛主席主要强调自己要管军队，军政领导人要听指挥，并察觉到部分隐藏在地方的林彪党羽。同时，吴法宪一直在向林彪汇报毛主席行踪，但因为毛主席要求对北京保密而一度不知道主席谈话的内容。但是到了 9 月初，林彪党羽还是将部分内容透露给了林彪。林立果的小舰队得知后，加紧行动。他们先是策划北逃，后来又打算刺杀毛主席，不成功再逃跑，此外还计划南下广州另立中央（后因为打草惊蛇而放弃）。林彪在 8 日同意了林立果的阴谋。然而，刺杀没有得逞。12 日，毛主席安然到达北京，并讲了中共历史的十次路线斗争和庐山会议，表达继续斗争的决心。他看出此时的斗争是庐山

会议的延续，表示不相信军队会跟着黄永胜造反，并批评林彪“只搞文不搞武”，形式主义盛行；还批评叶群当林彪的办公室主任。最后，安排好安保后，他安全回到中南海。

林彪集团见刺杀失败，准备逃跑，齐聚山海关机场。一开始他们准备南下广州，但周恩来控制了飞机，使小舰队一度气馁打算“不搞了”。同时，周恩来也向叶群打电话试探，并要求飞机只有周恩来、吴法宪、黄永胜、李作鹏中一位的指示才能起飞。林彪一家惊慌失措，认为自己要被抓了，林立果决定启动**北上叛逃苏联**的计划。林彪一家仓皇上飞机，用枪逼飞行员起飞，最终坠毁于蒙古国温都尔汗。同时，北京的小舰队也进行了垂死挣扎，同样被挫败。



飞机坠毁后林彪的尸体

在尘埃落定后，21 日，林、陈专案工作小组成立，纪登奎为主、汪东兴为副。由此也能看出汪东兴的伪装骗过了中央文革派。随后，拼命烧材料、妄图逃避惩罚的四大金刚被离职反省，林立果残余的党羽陆续被捕，揭发林彪的工作陆续展开，林彪的罪行从上到下陆续传达，最终传达到了几乎所有人，林彪在各地各部门的党羽也一个个被揪出进行处分和审查。军委办事组被撤销，军委改由叶剑英主持。

从叶剑英复出开始，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毛主席对老干部主动示好（甚至为二月逆流平反[75]），加之周恩来的鼎力相助，**从中央到地方的老干部纷纷复出，**其中最重量级的就是邓小平。

小结

林彪集团的覆灭可分为四个阶段：1969 年 5 月 –1970 年 3 月，毛主席开始戒备；1970 年 3 月 –8 月，围绕国家主席和天才论革命派与林彪集团展开第一次交锋，以庐山会议为高潮，结果是陈伯达被打倒；9 月 –1971 年 3 月，围绕检讨和人事安排展开第二次交锋，林彪集团节节败退；1971 年 4–8 月，暴风雨前的宁静；9 月是最高潮，反革命阴谋失败，林彪集团彻底覆灭。

革命派与林彪集团斗争的历史，主要是通过拉拢中间派、对林彪集团进行“剥笋”，以此孤立林彪集团完成的，因此不得不对中间派“论功行赏”，对以前被打倒的老干部进行让步，用他们填补中央的权力真空，以维持国家尤其是军队的运转。后续军队退出解决了军政府问题，但也使得地方的管理职权出现真空，老干部复出的阻碍消失、需求增大（应注意，老干部复出是既定政策，因为老干部仍是最懂得管理生产与国家的群体；不过毛主席的让步和老干部复出的速度都过于大了），加上中央走资派的奋力推进，在这之后，**老干部彻底翻身，再次成为走资派的主力。**在政治上，无产阶级和党内资产阶级的矛盾表现变化为新干部和老干部的矛盾。之后，双方的阵营划分变得愈发明确，斗争也变得更加针锋相对。

林彪集团由于和老干部有很大矛盾，且试图对毛主席搞政变而在改革开放后仍然被定为反革命集团（尽管对集团成员判刑不过是象征性的），今天便有一些林粉借此试图靠着资料的缺乏给

[75] 参见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的讲话，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414 页。这主要是为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铺路。

林彪翻案，认为他是被陷害的。对此，只需要指出以下三点：1、在文革期间，林彪身为文革的核心人员（反对不被允许的程度），却没有做出什么有利于造反派的行动，尤其是军内造反派问题和清队这种和军队强相关的事情上完全没有革命派应有的作为（作为参考，周恩来在体育、外交等领域和对待地方造反派上是有的，支持过造反派）；2、在九大之后，他与张春桥激烈冲突，和毛主席的关系也走向冷淡；3、之后革命派主导、毛主席亲自过目的调查把他定性为反革命，而且到毛主席逝世也没有翻案。这些都表明，即使史料缺乏，但是林彪的反革命性质仍然是板上钉钉的，而不是什么老干部栽赃之类的结果。

军队退出后的新格局：乱云飞渡仍从容，孔学名高实秕糠

林彪集团覆灭后，对他们如何清算成为革命派与走资派的交锋战场。转向走资派的周恩来想要借机**批“极左”**，来给经济上刚刚展开的革命路线一记重拳。从 1971 年 12 月开始，他就在鼓吹“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极左思潮”，质问“为什么合理的规章制度没有恢复”[76]。他将“极左”和林彪联系起来，说林彪用的是“极左的方法”；并把“极左”定性为“空洞、极端、形式主义”，与林彪的行径联系起来。[77] 他要求无产阶级“服从无产阶级纪律”[78]，实质上就是要服从刚复出的老干部。毛主席这时虽然在给清查五·一六降火，但是还是相信有“极左”分子在破坏，因此起初默许了周恩来的行动。

等到 1972 年 8 月，批判“极左”思潮的矛头指向的是造反派逐渐明显，于是中央文革派开始遏制报纸上以批林为名义的批判“极左”思潮。1972 年 10 月，批判“极左思潮”开始在人民日报屡次出现，中央文革派意识到这是转移斗争大方向，并提出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即林彪路线 = 极“左”路线 = 文革路线、林彪的错 = 文革的错、林彪的叛逃死亡 = 文革的失败的思潮。随后在 11 月，中央文革派反对在外事会议上以批林为名的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并针锋相对地提出要批林彪的极右，在政治

[76] 见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中央航空产品质量座谈会上的发言，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篇》617 页。

[77] 见一九七二年八月一日、二日，周恩来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谈话纪要，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篇》618 页。

[78] 见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的《人民日报》，《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一点体会》。

局会议中取得首胜，使周恩来同意从报告中删除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提法。之后在 12 月，毛主席**将林彪路线的实质确定为极右**，于是批林从批判极左彻底转为批判极右，矛头从造反派转向了走资派，主导权回到了中央文革派手中，中央文革派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之后，中央文革派在外交领域对右倾路线（包括对美苏软弱、对形势悲观、周恩来在与基辛格突然会谈中接受核保护伞）展开进攻，对周恩来、叶剑英在外交上的错误进行批判，但在批判中江青犯了扣大帽子的错误，把这次批判上升到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之后遭到了毛主席的批评。应注意，此时不仅是中央文革派批周，包括邓小平在内，中央走资派也都积极参与了对周恩来的批判。[79]

此外，从 1973 年开始，中央文革派顺着反右倾回潮的方向，在文艺战线、教育战线、新闻战线发动进攻。文艺战线江青一马当先，1 月就开始支持电影工业。但是后续对一些作品的批判过于严苛，毛主席不支持，因而进展不大。教育战线上，早在 1971 年中央文革派就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主导建立了一套较为系统的新教育方针。在 1973 年，中央文革派批判了复辟路线，宣扬了革命路线（如白卷英雄张铁生 [80]），但是随后批“走后门”因为与批林批孔时间上相冲而缓行（江青直到十月反革命政变前夕还在讲话中**批“走后门”**[81]，可见一直没有忘记），之后由于局势的发展始终没有机会进行。

1973 年 8 月，在林彪集团的余党基本都已经处理、人事安排再次稳定下来后，十大于北京秘密召开。十大的主要目的是将打倒林彪集团这一结果用大会确定下来。十大相比于九大，保密措

[79] 参见郑重《张春桥 1949 及其后》577 页。

[80] 辽宁知青张铁生不满以分数取大学生的做法，在大学招生考试上交白卷并在卷背面质疑，被《辽宁日报》报道，获得中央文革派肯定，成为“白卷英雄”。

[81] 参见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下午，江青在清华大学农村分校的讲话，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五篇》95 页。

施更加严格，全程秘密进行，这是为了主席身体、防止过多露面损害健康的原因——如果不保密同时主席不露面，又会引起更多误会。[82] 召开前夕，在副主席人选上，此时已经调到中央工作并在十大的筹备中身居要职的王洪文也被提名并在会上被通过，引起了以许世友为首的老干部的不满。此外，通过保证**“永不翻案”**，在 3 月复出的邓小平也成为了中央委员（毛主席主要是要让一个“壮丁”代替病重的周恩来主持工作，也需要一个改正的代表作为老干部的榜样）。十大在人员上，军队代表比重降了近一半，干部代表比重升了一半多。同时，也有更多造反派成为中央委员，同时许多工农等基层劳动者也从基层提拔上来，担任中央委员或其他职位，被称为“新干部”。从人员变化中可看出林彪集团覆灭后各势力实力的变化。此外，最重要的是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代毛主席投票，标志着他在中央的闪亮登场。

之后，在 12 月，毛主席批评了叶剑英、李德生在中央军委的问题，并主持**八大军区对调**，结果由王洪文宣布；并且让邓小平亮相当总参谋长，以用他的威信压住军头，又给了邓小平“三七开”的评价，为两人撑腰。八大军区对调进一步整饬军队，使盘根错节的军队与地方的关系被削弱，各军头在调任后由于关系的变化，不得不更多地执行革命路线。之后，**军队完全退出地方**[83]，基本不再能干预地方局势。虽然地方革委会里还有军代表的位置（基层革委会则彻底没有了），但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实权，只负责军事职能了。到了 1974 年，中央又召开多次会议，**表面上基本解决**了支左以来的军队干预地方和辫子军化问题、与林彪集团斗争的遗留问题，但是军队状态仍不正常，且留有隐患（到了 1975 年军队就又出现插手地方整顿的情况，1976 年许世友等人甚至计划军事政变）。

[82] 参见 93 年国史研究参考资料。

[83] 大部分和林彪关系亲密的军头则在之前对林彪余党的清查中就已经倒台而退出了。

随着林彪集团的覆灭，老干部如前文所述相继复出。由于大部分地方的走资派本来在军头掌权时也有不小的实权，因此军队失势后走资派迅速掌握了实权。他们掌权后“落实党的政策”，首先就是积极地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清查扣留人犯，却对造反派的要求充耳不闻，有的地方（如浙江）甚至把革委会的造反派赶回原单位、反对在造反派中发展党员、让造反派干部群众作检讨。到了1973年，地方的大部分老干部平反解放，复出工作。同时，1972年开始，部分地方受压已久的造反派借机造势，纷纷寻找平反的机会。不过，在1972年，尚处于清查五·一六和批“极左”中，很多地方虽然压迫造反派的军头跟着林彪倒了，造反派却仍受压，甚至被打成和林彪有关系。这被称为**“捂盖子”**。到了1973年，随着中央要求落实“批清”政策，造反派逐渐争取到改善被错划的五·一六分子的待遇（释放被关的造反派并不再整人，但是没有正式否定批清、彻底销毁黑材料、彻底为被错划的造反派平反和恢复名誉），并使头头**恢复了革委会中的旧职务**，但仍面临着彻底平反和争取实权的任务。

军队退出后，形势再次回到了老干部走资派和革命造反派的对立状态，不过与支左前的形势不同的是，此时老干部走资派都在之前6年的文革洗礼中学会了应对革命派的冲击，变得更加团结一致，且证明了自己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运行的不可替代性；而造反派却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中面临重新集结组织力量、夺回在革委会几乎丧失殆尽的权力的重大任务，而在少数几个造反派仍在掌权但不稳定的省份，造反派也需要巩固自己的势力。在安定团结的大背景下，双方攻守近乎易势，因此革命派仍然处于对走资派的劣势状况之中，而不同于支左前夺权时期的优势状况。但是另一方面，在前五年革命的洗礼之后，走资派不得不收敛羽翼，不敢明目张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各地的革委会执行的大多是革命路线，路线斗争上革命路线处于上风。

批林批孔

早在 1973 年，毛主席便开始贬儒褒法。之后在 1974 年，以年初毛主席批发江青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为发端，中央文革派又找到孔丘作为历史和理论的突破口（后发展为儒法斗争），发动“批林批孔”运动。运动成功取得一定成果，变得更成熟的各地造反派在此运动中突击提干、突击入党，取得阶段性胜利。



武汉批林批孔时，造反派控制的长江日报的一版

在上半年，中央文革派组织人手，在历史领域发动了**对儒家的大批判和对法家的宣传**，并有意识地要批“现代的大儒”，搞影射史学，**将其和对林彪搞修正主义的批判联系起来**。

此外，中央文革派继续深入批判右倾回潮（尤其是下文的风庆轮事件），但是成果寥寥。

同时在另一头，批林批孔联系的实际问题是首先是林彪集团的种种罪恶行径，其次是领导干部对待文革的错误思潮与造反派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因此，作为新上任的副主席，王洪文积极鼓励造反派投入到批林批孔运动，保卫文革第一阶段的成果，给清查五·一六的错误定性翻案，夺回革委会中的权力。同时，部分地方（如浙江、湖北、云南等省份）被打倒的（新）保守派也在清查五·一六结束后复苏，并在批林批孔期间积极活动串联甚至开大会和上访，试图翻天，但在造反派的抗击下没有什么成果。

造反派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成熟的表现之一，就是能**更正确地对待党，对待总路线，能更耐心地、更顾全大局地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绝不是有些人说的“当官后背叛造反派群众”，而是党性的体现。当然，这并不是说采用初期手段解决更急迫问题是错误的。由于十大后出现了许多再次采用初期手段的、未进入革委会的基层造反派（如武汉的反潮流派、重庆的十大宣传队），**这两种方式之间如何配合、如何消除矛盾成为了造反派新的课题。**

武汉反潮流运动和造反派头头议会斗争的碰撞是最能体现这一时期造反派变化的典型。反潮流运动的名称来源于毛主席提出、王洪文在十大上宣扬的“要敢于反潮流”。武汉的反潮流运动采用了文革初期群众运动的形式，可以为群众运动理论提供一个注脚。

武汉在1972年春出现了基层造反派的自发抗争，开始被称为“街头派”，因为主要手段是在街头贴大字报、游行。在1973年春他们走向社会，在十大时达到顶峰，被称为“反潮流派”，之后持续到1975年春整顿开始（矿口地区持续到1976年10月）。

反潮流派不满于主流的造反派头头和省委走资派徒劳无功地谈判，认为他们“修了”，决心“把颠倒的文革历史再颠倒过来”，才上街运动。**这一方面促进了造反派的平反，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不希望闹大的中央的反感。**走资派十分恐惧，一方面要求造反派头头劝阻，一方面镇压（规模较大的反潮流派没有被镇压下去，规模很小的十大宣传队则不久被走资派用民兵镇压掉了）。然而，主流的造反派头头劝不动反潮流派，反而加深了双方的裂痕。反潮流派觉得主流派是说客，在说违心的话；而主流派则认为反潮流派不顾全大局、和党搞对立。当然，之后双方也不至于反目成仇（十大宣传队则恶劣一些，声称要暗杀造反派头头，还给头头与老干部走资派准备了牢房），而是各干各的。到了批林批孔，连主流派也使用街头运动的手段，成功夺回了革委会中的实权，直到整顿时被下放农村。而反潮流派也在批林批孔中变得更加激进，甚至冲击市委抢材料、冲击法院抓人、组织赴京控告团。这些行为引起了中央反对和批评，中央随后禁止了跨单位串联和组织战斗队。于是之后反潮流派也回到温和手段；另一方面他们也确实部分达到了目的，并让省委不得不部分认可反潮流派。整顿开始后，反潮流派因为制造“中南旅社事件”阻断交通而被成批逮捕判刑，反潮流运动基本结束。之后，主流派和反潮流派一直保持距离。[84]

可以看出，尽管手段类似，**本质上这已经不是文革初期的群众运动了**。群众运动发展到后期，一定是回归到党内进行斗争的。这些运动，只不过是造反派为了平反、释放被抓的造反派头头、退材料等目的（不过，十大宣传队犯了反复旧式的，对革委会“推倒重来”的错误）采用了激烈的手段。而这对于要求安定的中央来说是减分项，这也是为什么成熟的造反派头头都反对街头运动。

[84] 关于反潮流运动的情况，参见《武汉地区文革纪实》646-679 页；关于十大宣传队的情况，参见老田整理的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48-50 页。

不过另一方面，这些运动也反映出群众仍具有革命意愿，并确实利于造反派头头进行的议会斗争。安定团结常常被自由主义者诟病，但这正是“建立一个新世界”，建立出新秩序的必然结果。**如果街头运动失控，只会将来之不易的新秩序破坏，违反了“立”的要求。相反，和平斗争虽然漫长而“软弱”，但是却是在巩固新秩序，使之能和平过渡到革命路线上。**

等到1974年的下半年，批林批孔引起了老干部的很大反弹。干部面对批判普遍怠工，甚至出现个别干部擅离岗位避风头的现象，加上对经济诉求不敢顶上，出现了类似文革初期的经济主义妖风。此外，一些造反派误以为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而耽误生产进行运动，进行变相罢工，在不准组织跨行业串联和战斗队的禁令发布后没有坚决执行（中央进行了劝阻，但是这些现象没有很快消失），甚至有些地方开始武斗。这些都使**经济情况恶化**[85]。一些造反派将矛头指向周恩来（不过，中央文革派和批孔文章的作者都没有影射之意，周恩来也不觉得是在批自己[86]），也使毛主席无法接受。于是，毛主席调转方向，开始强调安定团结，停止批林批孔运动（大部分省份批林批孔在7–8月陆续停止，浙江等少数地方则仍继续到了下一年初整顿时），要求跨部门串联停止、干部回岗、将经济诉求留到后期解决、就地闹革命、严守生产纪律。中央的工作重点转入筹备四届人大，于是革命派和走资派对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进行了角逐。由于王张江姚政治上的不成熟和之前的冒进，走资派轻易地抓住了他们的错误，并大造舆论，甚至使得毛主席专门点名批评江青，获得了政治优势。10月4日，毛主席甚至点名由邓小平任第一副总

[85] 不过，即使没有这些问题，开始这样激烈的运动本身也会影响生产，因此生产数据糟糕其实是正常的。这个时期这样重视生产有对局势的通盘考虑在里面。另外，1974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主要其实是因为紧缩政策。

[86] 参见郑重《张春桥 1949及其后》586–588页。

理。面对风庆轮事件[87]中王张江姚的冒进，毛主席要求他们要谨慎，和邓小平等老干部团结，并批评江青“闹”这些已经决定的“小事”。像这样，面对最后几年王张江姚搞的冒进行动，毛主席经常会对他们进行这样的批评。**这些批评都不是为了打倒他们，而是因为对走资派进行进攻的时机尚不成熟，他不得不先批评阻止这些行动，在形势不利时是为了不给走资派抓住这些错误进行批判从而获得更大突破的机会，在形势有利时则是为了不让这些冒进行动干扰自己的部署，有时还是委婉地警告走资派不要犯同类错误（如下文的宗派活动）**。不过，江青这一次并没有意识到毛主席的苦心，仍然在职务安排上提要求，被毛主席拒绝与批评，体现出王张江姚在政治上的幼稚。不过，毛主席后来虽然没给江青安排职务，但是仍然**整体肯定了江青之前的功绩，把错误放到第二位**。

围绕着四届人大，革命派的王张江姚（四人帮），走资派的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三人帮）都积极进行派别活动（周恩来甚至秘密和走资派们分别谈话并最终提出了一份组阁名单），因此先后被毛主席批评，其中革命派被批评得最多最严厉（上升到宗派活动）。毛主席这仍是在提醒而不是要打倒这些“帮”，他后来对“四人帮”问题还是说**自我批评、“治病救人”**。[88]最终人事安排的结果，主要是邓小平和张春桥得到了新的重要职务，此外王洪文也得到了军委常委一职。

1975 年初，四届人大秘密进行，原因和十大相同。在四届人大上，张春桥主持起草新宪法（即 75 宪法）并作《关于修改宪

[87] 风庆轮事件，指 1974 年，风庆轮远航欧洲时，船上的造反派要求随船的远航运输总公司干部批判“崇洋媚外、卖国主义”，被拒绝。之后，王张江姚将事件升到路线斗争高度，试图以此打倒邓小平等人，引起老干部的反弹。最终毛主席选择息事宁人，将该事件定为小事，将革命派的冒进行为称为“闹”，最终该事件草草结束。

[88] 参见郑重《张春桥 1949 及其后》679-680，873-874 页。

法的报告》。**75 宪法将继续革命理论、罢工自由等重要内容写入宪法，是社会主义宪法的最高峰。**而邓小平主持起草、周恩来宣读了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经济建设（四个现代化）作为全国目标**。同时，随着以国务院为代表的政府机构的重建，四届人大的权力分配上老干部走资派压过了革命派。可以看出，1974 年下半年至 1975 年初的主线就是革命派和走资派在日益激烈的政治斗争进行相互妥协，革命派取理论而走资派取实践，双方的裂痕在安定的表象下仍在扩大。

关于王洪文

虽然小王梗和之后“网红文”的大火带动了对王洪文认识朝向正面发展，但是仍有不少问题有待澄清。首先必须指出，1972 年调到中央之前，**王洪文在上海的工作搞得很好**。他绝不是无能之人，成长速度也不低。在没有管理经验的情况下，他领导工总司迅速学会了管理上海这样的全国最大城市，并能团结整合造反派内部的各方和造反派外部被击败的势力（二兵团、双造司都被他顺利解决，被打倒的老干部他也能恰当处理，且没有让老干部形成反对文革的势力），对敌人的斗争也十分高明，引起的反感和损失都远小于其他地区。这使得上海的新秩序迅速建立并稳定运行，斗批改也能更早更深入地展开。除了上海无产阶级本身的阶级意识更强的根本因素外，他本人的水平也是重要因素（当然，他的水平与丰富的经历，尤其是作为上海无产阶级的经历有着密切关系）。总而言之，他的能力水平在短时间内迅速地成长为优秀省级干部的水平，到 1972 年已经完全可以胜任上海一把手。

但是，毛主席调他到中央后，是试图把他作为接班人培养的。他的一些弱点就变得致命了。他的耳根子比较软且缺乏主见，这在他执行革命路线时并没有太多影响，甚至使他更能团结别人，但是在他要作为领袖直接与走资派战斗时就显得致命了。同时，**坐火箭**

带来的资历浅、根基不足也使得他无以对抗老干部，遑论指挥他们，最终只能选择抱团取暖，在中央的斗争中亦步亦趋地跟着江青、张春桥这些更有分量的中央文革派。而且，或许和上海文革前中期没有造反派生死存亡级的考验[89]有关，王洪文**逆风表现很差**，稍有挫折便颓唐，十月反革命政变后在严刑下甚至投降叛变了。更不用说，他在斗争中没有慧眼识人的能力。叶剑英在政治局会议支持过他，与他一起吃喝玩乐，还送他大别墅，他就觉得叶剑英关心新干部。同时，这还消磨了王洪文的学习劲头，使原本刚到中央而学习十分刻苦的他变得对学习提不起劲。[90]此外，由于经验缺失，面对全新的工作他也不能很好地应对（比如外交工作）。但是，他在他有经验方面的工作仍然可圈可点：他在1972–1974年一直在做各地造反派的工作，促进他们的团结，帮助他们向走资派进攻；在业务上，他也能完成中央的日常工作。总体上来看，王洪文在中央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总理，但是确实难以胜任主席。

小结

从1972年到1974年，走资派损失了林彪集团这一握着枪杆子的复辟急先锋，但是没有伤筋动骨，剩下的老干部走资派反而完成了自身的整合并率先恢复权力；地方革命派也从三次清洗的巨大打击中渐渐恢复过来，同时中央文革派发动了两次新的进攻。斗争双方都发生了这样由守变攻的转化。

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局势悄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革命与反革命阵营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整合，并都渐渐适应了新的斗争方式。并且，继续革命胜利与失败的种子都已经种下——新秩序中，渐渐填充了新的制度和新的干部，也容纳着暗中存在的资本主义经济与再次掌权的老干部走资派们。这为之后白热化的斗争埋下了伏笔。

[89] 但是同样的考验如果没处理好，也是会发展为生死存亡的危机的。夺权后处理想二次夺权的组织的考验就是如此。可见，这既是上海造反派水平高的表现，又使得上海造反派没有足够的历练。

[90] 参见郑重《张春桥 1949 及其后》719 页。

整顿：斥鷃每闻欺大鸟，万花纷谢一时稀

1975 年初，四届人大刚刚闭幕，代替病重的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就在毛主席的支持下开始了整顿。毛主席的打算是促进生产，发展经济。他在四届人大时就已经决定把经济放到政府工作的重点上。这本是正确的路线，但是邓小平则以整顿“资产阶级派性”为名义，以经济数据为合法性来源，把整顿搞成**走资派老干部整造反派的运动**。首先得指出，此时造反派的派性（指为小团体利益牺牲革命利益）已经消除了不少。而**邓小平在整顿中所说的“资产阶级派性”和“党性”偷换了概念**，“派性”其实是指造反派不服从走资派的行为，“党性”就是指服从走资派，和走资派同流合污。

1 月末，邓小平的整顿第一刀砍向军队。军队由于三支两军的结束，军队干部返回军队大量超编。于是邓小平首先拿问题严重的军队开刀，借此对军队进行调防，并将军队的很多干部换为自己人，以夺走革命派的权力，**顺利建立起自己搞整顿乃至搞复辟的班子**。

随后，邓小平开始大力整顿铁路。不久，他控制的国务院又决定对钢铁产业开刀。这两项都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也是出成果较快的产业，同时都有着不小的造反派势力。于是，地方走资派遵从邓小平的旨意整造反派，将双突提拔的新干部下放农村“挂职锻炼”，把“不安定分子”集中到他处开学习班。此外，整顿的形式还包括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加强领导机构的权力等。

到了 3 月，邓小平更加严厉地督促负责部门打击“派性”，加强专政，因为历史原因生产运输有问题的地方自不必说，走资

派甚至还能凭空制造问题来打开切入口。刘建勋曾这样描述铁道部的手段：“铁道部一贯支派，谁不跟他，他就整谁。他们整人有一套办法呢，先把你的屁股眼堵上，然后硬往你嘴里塞东西，最后逼得你运输堵塞、铁路瘫痪，让你犯错误，再反映到中央去解决。”“要你听他的运输就通畅，啥事也没有，否则就堵塞，这是他们的历史传统做法。”[91] 于是在邓小平黑手伸到的地方，造反派掌权的地方被“翻烧饼”，即剥夺掌权的造反派的权力，把坚持革命的造反派头头被逮捕甚至枪毙（甚至郑州铁路局的造反派头头愿意服从整顿都不被接纳）。同时，走资派奉行高压政策，并扶持保守派上位（徐州铁路局甚至对立的两派都被抓，只留下逍遥派）。这种高压统治，使得矛盾再次激化。各地各部门的造反派在被打压后，自然不会坐以待毙，而是激烈地用大字报等手段进行反抗。不过面对严厉的手段，造反派的反抗短时间内收效甚微。事实上，整顿不过是一刀切式地压造反派，只能一时提高生产，之后很快更多本来安定的地方因为压得群众不满而使这些地方本来正常的生产运输受到影响（例如兰州铁路局[92]），实质不过是借经济建设之名打压造反派罢了。

4月，邓小平对铁路的整顿有了成效，于是他将镇压的“经验”推广到冶金、电力等部门。他的干将所到之处，新干部被撤，造反派被大量批斗、逮捕甚至枪毙。

5月，邓小平正式开始对钢铁部门开刀，这是因为它受煤炭运输制约，因此只能放到铁路出成果之后。他这次强调了要健全领导班子、与“派性”坚决斗争、建立规章制度，并把三项指示作为纲，露出了狐狸尾巴。之后，钢铁产业也经历了与之前形式类似的整顿。

[91] 参见冼恒汉《风雨八十载》。

[92] “从1968年1月省革委会成立到75年中央九号文件下发前，表面上铁路局的形势还是稳定的，铁路运输基本上是正常的。”“铁路归铁道部统管后，当时铁道部派黎光同志来整顿兰州铁路局，把省委支持的红三司这一派撤换了近千名干部，把铁道部支持的那一派扶上来了，翻了烧饼。”“省革委会成立后，铁路局同省委一致，他们也不向省委通知，就直接派人下来整顿，结果搞乱了，铁路不通了，就让省委来解决。”——冼恒汉《风雨八十载》

6月，借钢铁产业整顿，邓小平授意国务院成立钢工业领导小组，巩固了自己的复辟班子。此外，他还去上海策反市委书记马天水，旋即被马天水向其他革命派揭发。此外，在6–7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邓小平决定对军队进行整顿，除了整顿、精简外，他们还否定民兵指挥部，要一刀切地取消。最严重的是，走资派们在会议进行时私下串联交底，秘密活动，准备好了发动政变的基本力量。叶剑英甚至离开讲稿，“非常气愤地揭露了江青插手军队、妄图把军队搞乱阴谋诡计”，并分别找各司令员、政委谈话，让他们警惕“上海帮”。

7月，邓小平对中科院开刀，手段与之前雷同。同时，他和他的干将们也提出一系列谬论拉拢知识分子。此外，借毛主席对文艺政策提出调整，他开始了文艺整顿，收集文艺领域不执行“双百”政策的情况，目标对准了革命派的文艺路线，尤其是将矛头对准江青。随后，他开始解禁诸多影片戏剧。同时，他又开始整党。他的方针，仍然是保护、团结与依靠老干部、整造反派的头头，尤其是反对“双突”。他把造反派的头头都抓起来，大搞批判，再次制造白色恐怖。尽管王洪文也参与了整党试点，但由于没有实权而只好跟着老干部走，没有起到多少作用。可笑的是，浙江跟着走资派跑的新保守派红暴派也被邓小平整了。此外，从此时开始，毛主席渐渐对一些事持保留态度。

8月末，毛主席批准调整配备解放军干部。邓小平利用主管干部任免的张春桥远不如自己熟悉军队干部的情况，在叶剑英的支持下，将各总部、各兵种、各大军区的领导班子搭了起来，安排自己信得过的人。结果，指挥军队的主官都成了叶剑英、邓小平一派，只有少数文官属于革命派一方。此外，由于军事压力的下降，在毛主席的批准下，邓小平还开始了裁军，对军队进行整编和精简，这在整顿结束后没有被停止。



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提出“全面整顿”。

从7月到秋天，整党先后在一些省份进行。邓小平甚至对云南、四川的省委第一书记直言“不要怕人说你是‘还乡团’”“人家骂你搞复辟了，你的工作就搞好了”。

9月，邓小平整顿教育进入高峰，并计划整顿农业。在科学和教育（科技类知识分子相关的两个领域）整顿上，他的干将们从4月开始就否定了教育革命的种种成果经验，强调技术业务挂帅，把知识分子特殊化，反对科学技术为无产阶级服务。到了9月，

邓小平更是**篡改马克思主义**，断章取义马克思的文本，声称“生产力就是科学”，将“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谬论强加到毛主席头上，并授意干将炮制了一个教育整顿的提纲。10 月初，邓小平又炮制了一个总纲和工业与科技整顿的提纲，**系统地否定革命路线、提出复辟路线，**甚至否定“四大”和反潮流，回到文革初镇压造反派时走资派的口径上。但这些提纲未及实施，整顿就结束了。

原来，8 月毛主席在看完刘冰第一封信[93]后开始意识到不对劲，随后开始评《水浒》。不过，此时他仍是敲打，还没有下定决心打倒邓小平。9 月革命派就开始向毛主席告状邓小平仍然是否定文革的态度，使毛主席意识到邓小平这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还是不肯回到革命路线上，整顿被他搞成了复辟；同时，也意识到了右倾复辟思潮已经形成了一股能量巨大的势力，有否定文革的危险。但在邓小平对评《水浒》表示支持后，毛主席还没有打算把邓小平打倒。10 月，毛主席在看完刘冰第二封信认为矛头对着自己，意识到有一股否定文革之风在蔓延，于是开始反击。11 月，毛主席让几个革命派和中间派给邓小平开帮助会，在帮助会上毛主席向老干部们（该谈话 1976 年初下发）提出“三七开”的底线，作为妥协，否定“打倒一切”，承认复出的老干部是打倒错了，但是又肯定了批判，“批一下也好”；否定“全面内战”，言下之意即强调安定团结的原则。帮助会不出意外地没有效果，邓小平没有改正的意思。于是，全面整顿停止，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邓小平被批，被迫作检讨。在周恩来去世后，他又进一步被软禁。

[93] 刘冰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不满于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迟群而在 1975 年 8 月和党委其他一些领导给毛主席写信，告迟群的状。10 月，他们又写了一封信状告迟群、谢静宜（女，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毛主席两次都看完了，不过第一次看完时还没有把握，因此当时没有反应。

整顿期间的王张江姚

在整顿期间，王张江姚并没有坐以待毙，在理论宣传方面深入了革命，有了一些成果。不过，他们也没有进行成功地反击，反而由于冒进而被毛主席批评，十分狼狈。

2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开始，由张春桥、姚文元主导。张春桥著名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就是运动的产物。运动到1976年时初步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系统化，并建立在了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可惜的是，这场运动在展现出教育效果前文革就被打断，甚至于很多问题都没有给革命派留出时间搞明白，以至于最后的一批成果只能到揭批查的材料中挖掘。

3月，江青开始**批判经验主义**，将其作为“当前的大敌”，并在4月拿到政治局讨论和在宣传上散播。这引起毛主席的不满与反对。结果，王张江姚反对下发毛主席的指示，叶剑英、邓小平就借机翻江青前两年的旧账，王张江姚被搞得十分被动。接着在5月初毛主席最后一次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分担了一部分责任，并再次强调了安定团结，为邓小平撑腰；之后也反对下发自己的指示，给王张江姚解了围，还批评叶剑英搞“广东帮”。

然而，走资派仍然不松口。第二天开始，邓小平和周恩来等人多次专门见面，商讨如何批判王张江姚。之后周恩来开始将精力放到批反经验主义上，邓小平继续揪着江青之前的旧账不放。到了6月，王洪文、江青甚至先后被迫作检查，王洪文实质上遭到走资派削权。之后，王张江姚沉寂了2个月，直到8月毛主席评《水浒》，才又开始从宣传阵地进攻。他们借此狠批投降派，警示不坚定者，教育无产阶级，并在政治上影射周恩来、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

面对王张江姚的政治攻势，周恩来竭力否认自己是投降派；邓小平先否认评《水浒》的政治意义，后假装紧跟，在9月也跟

着批投降派。毛主席见邓小平表态，此时还没有决定打倒邓小平，便不同意江青在学大寨会议大讲《水浒》。不过，邓小平虽然渡过了这一关，但是如前文所述，由于不肯表态肯定文革，很快他就再次倒台。

小结

在 1975 年，中国经历了从整顿到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转变。邓小平作为当时中央政府的二把手，在“永不翻案”的保证和周恩来的推荐下，在毛主席决定重点抓经济和周恩来病重的局面下，主持了为期九个多月的整顿。从他再次被打倒可以看出，毛主席没有料到他这么快就翻脸不认账，还对他保有幻想。他从军队和铁路开始，把黑手伸向一个个领域，直到最后铺开全面整顿。事实上，后来邓小平在上台后搞的复辟，也是沿着 1975 年整顿的思路进行的。然而，此时王张江姚并没有抓住要害，反被走资派攻下一城，使得整顿足足搞了九个多月才被毛主席亲自终止。毛主席到此时才看清邓小平**死不悔改的真面目**。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右倾复辟势力在整顿期间完成了力量整合，变得空前强大，但是本质上仍然是由走资派及其拥趸构成的。右倾复辟的思潮确实开始在社会上流行，继续革命的思潮确实在走资派对造反派的反复打击下有所退却，但是此时右倾复辟思潮仍然不是能盖过革命思想的主流。主要的变化是旧剥削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技术官僚、大学生从文革初期的更倾向革命变成此时的更倾向复辟，不过工农出身的人们并没有更倾向复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在文革后期，革命派与走资派的势力发生了显著的**分化整合**，部分老干部左转成为或投机支持（这本身也能说明革命派势力不小，能吸引来投机分子）革命派，甚至有些老保守派（如广东风派）也左转，而造反派阵营也明显地进步，大部分省份实现了派性基本消除、原本对立的两派携手战斗；同

时，很多早期支持造反派的干部此时右转投降，成为华派甚至投向元老派。此外，另一个变化是逍遥派变得更多，大部分人并不倾向于任何一边，有的随波逐流，像墙头草一样（例如，有些人在 1976 年 4 月，既参加了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又参加了批邓游行），还没有下定决心站在哪一边（很多人既认为文革巩固了社会主义，又认为邓小平整顿把经济搞上去是正确的，没有看破邓小平的真面目），有的政治冷感，对政治运动并不关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支持邓小平的原因并不是赞同他搞右倾复辟**，而是因为他们一方面被邓小平蒙蔽，以为他真的是单纯发展经济；虽然有不少工人对革命派支持程度下降，但他们中大部分也不是因为反对文革或者对运动厌倦，而是因为文革显著改善了工厂中的干群关系，工人们没有了直接的切身利益诉求，因此革命意愿下降。这些人虽然表面上更倾向邓小平、更不支持文革，但他们难道支持右倾复辟吗？可见，右倾复辟势力根本没有像后来的资产阶级史学家说的那样众望所归。

反击右倾翻案风与批邓：小丑下台应欢送，满街红绿走旌旗

就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国全面展开时，周恩来去世了。趁此机会，右派裹挟着哀悼周恩来的群众，猖狂地向革命派进攻。然而，尽管革命派控制着宣传口，却没有足够好地应对，以至于在 4 月 5 日清明节爆发了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

周恩来去世后，全国上下十分悲痛，官方和群众都组织了悼念活动。此时，宣传口的革命派砍掉了一些悼念相关的内容，并继续强调反击右倾翻案风（不过，“四人帮限制悼念”的说法并没有可靠来源）。这些都是**为了防止反击右倾翻案风被冲淡**。此外，在一次报纸的用语上也有模糊之处。这些小事虽然**根本没有针对周恩来**[94]，但是给了右派可趁之机。于是，右派分子（主要成分是老保守派、旧剥削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红二代、技术官僚）故意延长悼念周恩来的时间，在之后的几个月不断搞悼念活动，并趁机攻击王张江姚和为邓小平翻案。此外，右派分子还利用一些宣传口的失误和模糊语句向革命派进攻，使革命派很被动。当革命派进行反击时，右派分子又掀起更大的悼念游行。于是，双方的矛盾逐渐升级。

另一边，邓小平在 1 月下旬被批判，并交出了权力，华国锋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此外，叶剑英为了韬晦也同时请病假而赋闲，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元老派的权力被移交给了华派。之后，邓小平、叶剑英的讲话被停止贯彻，邓小平对老干部说的话被揭发，反击右倾翻案风升级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94] 参见郑重《张春桥 1949 及其后》714，725-728 页。

批邓于3月初在全国全面展开，并下发了毛主席关于批邓的谈话。2月起，各省的造反派以整顿受压的造反派为首，顺势对走资派发起反攻，发动起革命群众，批判复辟派，要求省委**“转弯子”**，把整顿中被整的新干部官复原职，在革委会中夺回实权，并再次往革委会补充革命力量。那些在整顿中被整下去的造反派，实现了“翻烙饼”，成功再次上台，并对铁道部等邓小平用以整顿的班子进行了控诉和反击。不过**由于整顿激化了派别矛盾，因此这些部门的生产长期受到影响。**因此，1976年这些部门的生产下降，主要是由于整顿带来的恶果。

就这样，双方都在整合自己的力量，局势逐渐升级。4月初，各地右派分子借悼念活动疯狂攻击革命派，革命派也进行了**和平**反击，4月4日、5日清明节前后冲突达到顶峰。其中，郑州出现了唯一一例死亡事件——收花圈、贴大字报反击右派分子的造反派被右派分子打死在广场上；北京出现了反革命暴乱，右派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这一系列事件被合称为四·五事件。

北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进行的斗争从3月就开始了，主要是围绕花圈展开的。右派分子献花圈，革命派则派人收花圈。4月4日清明节这一天，北京有200万群众来纪念逝者。于是，**少数右派分子**再次兴风作浪，裹挟着哀悼气氛中的群众，**露骨地攻击王张江姚乃至毛主席**[95]**，并公开为邓小平翻案。**很多群众被他们感染、蒙蔽，也跟着攻击起了王张江姚。尽管如此，**中央革命派并没有阻止哀悼活动**，4日仅仅在晚上抓了几个演讲的人。深夜北京的领导层开会，决定清明节结束就运走花圈，认为有地下组织在操纵，但是没有给活动定性。5日凌晨，革命派把花圈都运到了八宝山。

早上，右派分子见花圈消失、广场上了警戒线，便拉起十余万人前来广场。他们的行动变得激烈起来，开始掀广播车、冲击

[95] 参见郑重《张春桥 1949及其后》732页。

大会堂前面的警察和民兵（当时谣传花圈在大会堂里）。为此，北京迅速成立联合指挥部处理升级的事件，派出了更多民兵与警察，但是仅仅是阻拦人群进入大会堂。后来，在民兵内鬼的指点下，人群发现并冲击了联合指挥部，强行让四个代表去谈判。谈判没有结果，于是人群开始游行并先后烧毁了一辆门口的小汽车、一辆来运食物的面包车、门口的两辆吉普车和几十辆自行车，还**追打外国记者**，最后**把楼也烧了**。就这样，**事件升级为反革命暴乱**。



右派分子烧了民兵指挥部所在的“小灰楼”

下午，政治局紧急开会。晚上，中央调来了**不到 5 万**民兵清场和拘留骨干分子，仅仅使用了**棍棒和拳脚**，只抓了 388 人（其中 224 人在十月反革命政变前就已经释放），就轻松平息了暴乱。

不过，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历史细节扑朔迷离。例如，高干子弟是重要的推手和参与者，但是 5 日却没有抓到高干子弟，说明他们应该是幕后操盘，但具体怎么回事就无从得知；再比如，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究竟有没有在幕后操纵，邓小平有没有亲自前往广场之类的重要细节尚无定论……

既然谈到了周恩来去世及其引发的事件，那“盖棺定论”，我们也于此澄清一下对周恩来的两种错误观念。

关于周恩来

今天在左翼中关于周恩来有两种错误观念：一种觉得他始终是革命派，另一种则觉得他始终和走资派是一伙的。但是实际上，周恩来虽然一直在某些领域（如对知识分子的方式）是右倾的，但是他**在文革前三年主要执行的是革命派路线，属于中央文革派的一员。**

在前三年，他不仅支持造反派、支持文革，而且**本身就是文革各次运动进行的重要支柱**，这也是毛主席对“五·一六”如此穷追猛打的一个原因。例如，他揭露贺龙在体委搞的黑线，并支持体委造反派的行动。在火烧英国代办处之前，周恩来也支持了外交部造反派的造反。再比如，当元老们普遍反对文革时，他却站在中央文革派的这一边，参与对元老的斗争。尽管也不是没有偏保的行为，但是他都能很快跟上毛主席的指示，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例如，他经常会保护一些老干部或者搞“中肯”，但是如果毛主席表示不想保，他也会迅速转换态度。

在九大之后，他开始右倾，转向老干部一边，但是仍然是对抗林彪集团的重要力量。但是在一打三反中，以他的能力和位置，他是很早就能发现地方杀人过多的，但他并没有像毛主席那样发现后立即叫停，可见他已经为了生产和备战而不惜草菅人命了。同时，作为具体操办清查五·一六的中央领导人，作为中央特科的老领导，他不可能不知道清查扩大化，但他仍然狠抓五·一六，为了彻底清洗反周的极“左”派不惜错抓一千万，使革命力量严重受损，已经犯了很大的错误。

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他彻底和走资派同流合污，搞的批“极左”完全是后来邓小平整顿的预演。他在外交上也出现了右倾错误。在之后，他千方百计反对王张江姚、搞小宗派支持邓小平、支持整顿也证明他已经与老干部走资派彻底合流。不过，这个时期他

仍能在被主席批评后改正错误（但是不再会支持革命路线，只是不直接反对），也没有政变之类的严重反革命行径（在叶剑英、邓小平向他透露政变打算时，他拒绝了，但也没有上报），且是安定团结不可或缺的压舱石，因此革命派的正确路线就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因而江青在1974年上升到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定性是错误的。

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后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4月7日，毛主席根据首都、天安门、烧打的特点把5日天安门的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变为对抗性的，将邓小平开除一切职务、只保留党籍；让华国锋正式成为第一副主席、总理。之后，批邓在全国全面铺开。



四·五事件后，北京的革命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游行

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后，全国各地都举行了庆祝平息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深入批邓的大游行，规模完全不亚于悼念活动。可见，反对元老派、支持革命派的群众大有人在，革命派仍有着群众基础。

革命派与走资派双方，在接下来几个月围绕着实权，再次进行了白热化的阶级斗争（经济上的增长放缓可以间接反映出白热化程度），取得了很大的成果，造反派新干部从省市委一级到基层基本都被安排了工作。相比于之前的斗争，这一次的成果可以说以更小的代价取得更大的成就，反映出革命派议会斗争能力的成熟。不过，由于地方造反派吸取了批林批孔的教训，严格执行了对跨行业串联、组建战斗队的禁令（批林批孔虽然说了但是地方未执行），加之运动并未很好地结合现实，因此显得冷冷清清。大部分省份比较激烈，造反派进行了罢工（如云南）、游行（如湖北）、开大会（几乎都以各种名义开了大会）等，有些省份则比较平静，甚至连开大会都拉不到人（如湖南）。对此，地方走资派也没有像批林批孔时一样激烈对抗，而是**“拖”字诀打哈哈**，尤其是6月毛主席身体再次恶化后。他们见风使舵，打算看中央在毛主席逝世后哪一派掌权，再决定如何对待造反派。

不过，另一方面，在克服了“左”的倾向后，革命派中右的倾向又隐约抬头。地方造反派一心搞革委会内的议会斗争、革委会外的街头斗争，而**忽略了秘密斗争**，完全没有建设第二梯队，有的甚至为了利于提拔造反派干部而把造反派重要领导人的名单都交给了省委。此外，在沉迷于科层制内的斗争、获得了科层制内的位置后，许多头头犯经验主义错误，只顾着拉拢老干部和部队干部，客观上由于群众组织解散、头头进入革委会而与群众隔离，主观上由于忽略了与基层造反派群众的联系而不主动下去，使得造反派出现了**“委员”脱离群众**的现象。这些右倾错误，使得造反派失去了反击能力，为随后的覆灭埋下伏笔。

同时，中央走资派已经有人按捺不住了。华国锋对批邓表现冷淡，与叶剑英暗中交往[96]；叶剑英暗中和汪东兴与一些被打倒

[96] 参见熊蕾《华国锋和叶剑英“结盟”》，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五篇》33-40页。

的军头走资派串联，酝酿着军事政变；汪东兴也秘密劝导华国锋搞掉政治局中的革命派[97]……甚至纪登奎也在让儿子和各地走资派暗中串联的阴谋还漏出了风[98]，许世友儿子写着许世友军事政变的打算的信也被王洪文得知并转告[99]，然而在右倾路线的统治下，中央革命派对地方走资派、元老派的军事政变有所警惕，但对中间派仍然一味拉拢，而没有做和中间派决裂的两手准备。后期革命派的**右倾路线**，正是这样从上层弥漫到下层的。

小结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常被资产阶级史学家污蔑为政治虚化、脱离群众，但是这只是不以街头运动为主要手段的结果。而四·五事件又被他们誉为民众自发反抗（可以是“反抗四人帮”，也可以是“反抗极权”），然而在游行规模上却可以被批邓压过一头。资产阶级史学家利用史料上的优势，肆意裁剪、涂抹史实，但是我们仍能从中发觉历史真实的蛛丝马迹。尽管现实的斗争到底如何仍然缺失严重，但从有限的史料中造反派掌权的程度来看，我们可以相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一定是造反派革命行动在一月风暴的“破”之高峰后，“立”的最高峰、最高光时刻。当然，众所周知的右倾路线泛滥，也成了文革派随后覆灭的内因。

[97] 参见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五篇》1 页。

[98] 见杨止仁《谈我亲身经历的河南文革》。

[99] 参见郑重《张春桥 1949 及其后》748-749 页。

政变：正是神都有事时，还从烈火识真金

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的重要性不亚于总结革命成功的经验。可惜的是，几乎没有文革史会像叙述文革的开始一样详细地叙述文革的结束。此外，由于走资派颠倒黑白的需要，这段历史的谣言和逼供信出来的证言极多，所以也需要将历史真相还原，以正视听。我们将用很大的篇幅分析文革为什么会以如此**突然而平静**的方式被走资派突然结束，走资派何以取得彻底的胜利。



北京群众在天安门周围哀悼毛主席

1976 年 9 月 9 日，毛主席逝世了。他死前对中央的部署是把元老派按下去，在他认为赞同继续革命的国家领导人中让比较能服众的、能力不高的华国锋当一把手，让这些或温和或激进的领导人**共同执政**，仿照遵义会议后的中共领导层先搞集体领导再缓

慢过渡。他的打算是通过这种方式减少革命派的障碍，集中力量对付元老派，迂回作战，并让王洪文、张春桥积累经验与资历。因此，他的设想是华国锋当张闻天[100]，王洪文、张春桥像当年的毛主席那样进行合作。然而，他没看出华国锋是一个不自量力又权力欲极强的两面派，更没有料到，党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如此不可调和。华国锋在毛主席尸骨未寒之际，就辜负毛主席的期待，当上了党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秘密和叶剑英等元老派干将串联，迫不及待地要推翻革命路线，打倒革命派。他狂妄自大地以为，靠着毛主席的背书，自己能在铲除革命派后单独执政。而其他的华派也在秘密串联时毫不迟疑地叛变了革命，或奔走效劳，或表态支持，期待着政变后攫取更多权力。

另一边，中央革命派也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政变危机。王洪文在回上海时对上海民兵部署进行了安排，张春桥曾嘱咐上海加强战备。但是，中央革命派以为的政变是元老派的政变，因此他们没有把注意力放到华派上，而只是防止地方上对上海进行突然袭击（后来走资派称革命派“在军队活动”云云，其实只是他们作为军委常委去谈批邓而已。张春桥弟弟张秋桥则是作为记者去军队采访）。反之，他们很积极地拉拢，并诚心辅佐华国锋，接受了毛主席“集体领导”的部署。不仅如此，他们还**争取到了半数以上的中央委员的支持**（主要是新干部），这体现出他们在被毛主席批评宗派主义后确实改正了。他们也遵守了毛主席“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的指示，几乎没有进行秘密活动，甚至在 1976 年彼此已经拉开了一定距离，连宗派都算不上了。但是这些对于捍卫文革来说还远远不够。他们的一个严重错误就是只关注明面上的走资派，对投降派不够警惕，因而**认为党内资产阶级找不到挂帅人物**，觉得“现在要出邓小平这样一个人是不可能

[100] 参见郑重《张春桥 1949 及其后》717 页。

的，人民一定会起来反对的”[101]，甚至觉得“大事已经过去”[102]，在过渡时期不出问题就可以保持稳定。这就导致在战术上，所有革命派的核心人物都在北京进行党内斗争，没有一个政治局委员留守上海，就如同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中央革命派这样做，是为了在十届三中全会上掀起并赢得对走资派的新斗争，将元老派击溃，寄希望于政变赶不上十届三中全会召开，犯了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可以想象，如果在毛主席的追悼会结束后，哪怕王张江姚有一个人不在北京，那么政变很可能就来不及在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密谋好。

同时，中央革命派的斗争采用的还是**老一套党内公开斗争和控制宣传口的方法**，没有改变策略。尽管如此，政变集团疑神疑鬼，草木皆兵，他们将自己的阴谋诡计脑补到这些光明正大的正常行为（不仅是党内斗争的行为，甚至还包括中央革命派成员的分内之事）上，于是加快了政变密谋。这些行为在一举后也成为了中央革命派“篡党夺权”这一子虚乌有罪状的罪行。此外，“按既定方针办”的阴差阳错使情况加速恶化[103]。

地方革命派也半斤八两。尽管在十年的锻炼下，据说有200多万人都说这场政变的“右派政变”[104]，但是可惜的是，这没有转化为与之相称的革命行动。如前所述，早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地方革命派就已经犯了**合法主义错误**，只搞议会斗争、街头斗争，完全暴露了组织与成员，没有组建二套班子。这种右

[101] 引自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Ⅱ》1558页。

[102] 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936页。

[103] 第一次公布“按既定方针办”的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并未称之为临终嘱咐，而且这句话只是文章的一个作者提议加上的。这句话据多人回忆是华国锋在7月的计划工作座谈会说的，因此政治局讨论这一社论也没有被否定。之后，姚文元认为这句话利于维持稳定才进行宣传。
10月4日光明日报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虽然使得华国锋等人4日决心6日下手，却不是中央革命派要求写的，而是光明日报自己决定的。参见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五篇》109-119页。

[104] 参见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五篇》1552页。虽然这个材料可信度并不高，但是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看出来政变实质的人并不少。

倾路线，使得地方革命派在毛主席逝世后犯了经验主义错误，几乎没做政变准备、几乎没进行革命群众动员、不给民兵彻底发枪。此外，他们在战略上如前所述不重视将真正坚定的革命造反派组织起来，而犯了和中央革命派类似的错误，将重心放在团结不坚定的群众、拉拢犯过错的老干部和军头上。团结、拉拢这些人当然是重要的，是克服派性、摆脱“唯我独革”思想后的进步；但是，这些人面对这种灭顶之灾是靠不住的。没有坚强的、善于结合合法与非法斗争的革命派核心组织，无产阶级就无以发动对修正主义的造反。最严重的是，大部分造反派在十月反革命政变后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对右派政变的传言只是忧心忡忡，好一点的开会讨论，却没有下决定作出任何行动。剩下的上海之外的造反派虽然决定反抗，大多也犯了等待主义错误，在判断出发生右派政变后虽然准备起义，却要等待上海先起事，上海哑炮后反抗便胎死腹中；还有的则仍陷在合法主义的泥潭中。于是在走资派控制了局势后，他们便只能束手就擒，轻易被走资派中央缴械。此外，还有少数革命派干部群众则对局势悲观绝望，进而走向逃跑主义，于是他们当野人、当黑户或逃港，以逃避后续的清算。

另一边，华国锋、叶剑英在毛主席尸骨未寒之际，便秘密串联，酝酿阴谋。华国锋从 9 月 10 日[105]起就开始为了秘密串联，首先串联了叶剑英（10 日或 11 日间接串联，13 日将消息送过去，21 日才正式秘密见面）和汪东兴（11 日），在得到两人支持后之后频繁串联各华派、一些在北京的军头和部分元老派成员，交流看法与阴谋。叶剑英与各元老打招呼，到 19 日为止已经找了中央和地方二十余个元老个别谈话[106]，甚至与邓小平秘密串联。21 日，叶剑英又把杨成武作为了自己和老帅们的联络员。他们在串联中摸清了这些人的态度，确立了秘密单独串联的方式，确定了参加

[105] 一说 11 日，参见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五篇》44，55-56 页。

[106] 参见水陆洲《十月政变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五篇》21 页。

政变阴谋的核心成员[107]。因此，面对中央革命派要文件的正常要求，心里有鬼的他们也不敢交出来了。此外，他们还密切监视着各中央革命派的活动。

到了9月26日，华国锋等三人开会，认为中央委员会开会投票没有把握，决定采取**隔离审查**的手段[108]，在10月10日动手，并在30日开会商议具体事项。10月2日，汪、华、叶密谈时决定将时间提前，并在4日的秘密会议上确认了汪东兴2-3日制定的政变方案，三人决定在10月6日发动宫廷政变。10月5日，三人紧锣密鼓地进行部署，并知会了其他中央走资派。汪东兴挑选了50多个中央警卫团士兵参与政变。同时，政变集团已经通过拉拢获得了卫戍部队的直接指挥权。中央革命派此时已成砧板上的鱼肉。

10月6日，汪、华、叶亲自坐镇怀仁堂，先后抓捕王、张、姚，同时江青等其他重要革命派也被华派骨干迅速抓捕，重要舆论单位也在同时或稍晚一点被控制。随后，政变集团控制的政治局决定由华国锋作为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主席，完成了对成果的确认。走资派的政变成功了，革命派被**“斩首”**，中国的无产阶级完全失去了领袖，成为了没有指挥官的军队。紧接着，随着走资派控制局面、开始揭批查造反派的头头们，中国无产阶级彻底失去了一整代群众领袖。

[107] 包括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李鑫（原康生秘书）、吴德（北京革委会主任、市委第一书记、卫戍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等人。不久，杨成武、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北京革委会副主任、市委书记）、陈锡联、苏振华（海军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军委常委、政治局候补委员）等人先后被拉入政变集团，但未及核心，是政变深入参与者。其中李先念和吴德也深入参与秘密串联、阴谋计划和政变实施。李鑫还负责着写作班子。

[108] 也有16日三人便认为开会无把握、必须用隔离审查手段的说法。参见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五篇》72页。此外，李鑫早在9月14日与华国锋秘密串联时便鼓吹采用隔离审查手段。参见徐庆全《李鑫首倡粉碎“四人帮”动议考—粉碎“四人帮”决策过程 若干史实辨析之一》。

毛主席逝世带来了形势的陡变，革命派过去的战略战术都亟须作出改变。在战略上，毛主席在世时，存在着革命中央，其他革命派都是以此为前提展开行动，但是他逝世后中央尚未完成必要的重新组织过程、受到华国锋的觊觎，在政变后则只存在反革命中央，因此革命派必须拿出非法的、暴力的斗争的勇气，去面对没有毛主席保护的全新局势，应对内外资产阶级的暴力颠覆；在战术上，毛主席之前对政变的各种防范措施都是建立在他本人地位的基础上，于是他死后革命派要想防止政变必须拿出十足的警惕和新的办法。革命派没有意识到这些巨变，也因为力量不足而无法拿出好的防范政变措施，于是仍然按照过去的经验行事，陷入了合法主义的右倾错误中。加之政治经验的不足，革命派没有对走资派进行“剥笋”分化，反而是走资派实行了分化战术。于是，中央和地方革命派相继在政变中和随后的清算中覆没。

只在游泳馆里历练，难以经受住真正的大风大浪。造反派刚一失去领袖的庇护便遇如此突然袭击，加之右倾路线的统治，覆灭顺理成章。

上海的应对

十月反革命政变后最可惜的是，作为革命派大本营的上海，却耻辱地一枪未发，拱手将上海让出。为了分析局势，我们首先介绍上海革命派手里的底牌——名为民兵的第二武装。

上海文革初期，民兵被警备区收回武器，随即组织瘫痪。1967 年，作为“文攻武卫”和改造民兵的实践，第二武装建立，开始名叫“文攻武卫”，在 1970 年改名为上海民兵，这是上海造反派**创造与独有的崭新事物**（其他省份也有进行尝试的，不过都没能坚持多久就被解散废除）。它的根据可以追溯到巴黎公社经验（“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109]），不过主要还

[109] 出自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三。

是1967年8月毛主席所提的“武装左派”[110]。第二武装在文革期间主要起着制止武斗、维持治安、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但也同时接受着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主导的阶级教育，具有一定反修正主义的思想，是与旧民兵截然不同的新民兵。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1、相比于旧民兵，第二武装的治安职能从次要职能变为主要职能，从辅助公安系统变为主导地位（民警几乎只负责户口工作，民兵同时负责审判和关押改造），而作战职能从配合军队变为能够独立作战（这与巴黎公社砸烂旧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的思想相契合）；2、旧民兵在组织上被党政机关和军队牢牢控制，骨干力量是党团员等被党委认为可靠的人，而第二武装在组织上由三结合的民兵指挥部领导，其中的军代表和革命干部代表均支持造反派，在成分上起初都是造反派成员，后期以“老造反”为核心（营以上非领导干部均为老造反）；3、旧民兵从1960年开始以生产为纲，阶级斗争搞得很少，而第二武装以阶级斗争为纲。从1972年开始，出于财政原因，原本不脱产的民兵转为业余活动，并分散到了各街道里弄，同时还承担着消防、工厂保卫科等零杂事务，并陆续合并走了所有旧民兵的任务和部分军队系统的任务。此外，面对警备区数次试图夺回民兵控制权的行径，王洪文一直在竭力让第二武装对军队和干部独立，竭力使它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里，并将它作为“人家一巴掌打过来，我们能站得住脚”的底牌力量。为此，上海努力挤出物资和资金加强民兵武装建设。到批林批孔后，民兵指挥部完全抛开了警备区单独控制了民兵力量，同时新民兵彻底取代了老民兵的职能和残余组织，甚至拥有了一定的立法权和司法权。可见，第二武装除了作为革命派的底牌之外，也是探索如何改造旧国家机器、如何实践巴黎公社经验的工具。

[110] 事实上，“武装左派”在大部分地区的实践是军队以被抢枪的形式发枪；但是上海在张春桥的推动下则是建立了文攻武卫组织。



行进中的上海民兵

不过，尽管领导权上基本保持了独立，但是在武器、训练等方面仍无可避免地无法完全独立，不过警备区和上海民兵在这些方面配合还算融洽。此外，虽然指挥部反对，民兵也没有完全脱离随意打被捕者、逼供信、虐待犯人的陋习，还留存着旧思想的残余。在调入中央工作后，王洪文还想将第二武装推广全国，但是其他地方的造反派并没有足够的力量，于是在军队的阻挠下宣告失败。

在上海的秩序恢复后，第二武装迅速发展壮大，也进行了常态化、正规化的尝试，但是到1976年仍进行得十分有限。虽然纸面上有300万人，但是在实战中只能调度至多10万人，而且训练状况也一般。[111]由此可见，第二武装确实羸弱，但是如果使用得当仍能发挥出一定能量。

另一头，走资派保持着高度警惕，数次确认对军队的绝对掌握，并在1976年9月让南京军区事先进驻上海周边的险要地带。同时，许多地方的走资派也做好了在革命派上台时立即逮捕造反派甚至武装叛乱的准备。乃至于，尽管处在绝对的优势之下，走资派仍然向上海派了“先遣小组”，甚至拉过去了一个内鬼[112]。此外，上海的保守派也将收集的民兵调动信息送给南京军区。

恩格斯曾指出：“在战争中，**尤其是在革命战争中，在没有获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之前，迅速行动是一个基本规则……**。事情当然是有些危险，但有谁打胜仗而不曾冒一点危险呢？”[113]然而，在右倾路线的统治下，上海的革命派尽管手握打磨了快十年的民兵队伍，却苗而不秀，有着严重的**怕和正规军对抗、怕流血、怕失败**的心理，于是有的心存幻想，在对抗上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甚至在得知政变后仍不敢违抗中央命令；有的互相扯皮、犹豫不决，葬送了起义的机会；即使是最革命的革命派，也犯了合法主义错误，行动上仍然停留在合法级别。

上海作为革命派底牌，在十月反革命政变前也一定程度上准备了反击。王洪文早在1975年便让民兵准备巷战，但是他也只考虑到了局部武装冲突，而具体的措施得到1976年。1976年，

[111] 关于第二武装的情况，参见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Ⅱ》第三十九章：上海市民兵指挥部 工人武装的尝试，1501-1548页。

[112] 内鬼是时任上海市委常委、警备区副司令的老干部张敬标。他被上海老干部王一平策反。此外，王一平还与许多人秘密谈话，并充当了接收人员的前哨。参见王时驹《一生正直护公平——父亲王一平与上海》13-14页。

[113] 引自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十二 对维也纳的攻击。对维也纳的背叛。黑体为我们所加。

上海因故没有在年初进行例行的民兵发枪。毛主席病重时，上海领导层也有了危机感。8 月，在中央加强战备的命令和马天水的多次催促下，上海开始给民兵发枪，在 9 月中旬发完计划发放的所有武器。[114]9 月，张春桥、王洪文都直接要求上海进行动员，准备打仗，王洪文甚至进行了一些部署。

上海革命派领导层分为主要由文革派老干部（除王秀珍）组成的市委、干部造反派为主的市委写作组和工人造反派为主的总工会。十月反革命政变后，上海革委会副主任马天水在 10 月 7 日被中央以开会的名义叫到北京，尽管由于电话打不通，上海革命派已经怀疑出事，但是由于情况不明，为了防止被抓把柄还是让他飞往北京，结果马天水到北京就被软禁了。之后，上海的领导层处于紧张状态，开始频繁开会确认形势动向。10 月 8 日上海剩余的两位革委会副主任王秀珍、徐景贤根据从马天水秘书处传达、并由专机去北京的人确认、又从公安部传来的消息，意识到王张江姚极可能已经被抓，在会议上决定要把民兵拉出来打，并做出了反击性质的部署。在后续革命派领导层的会议上，革命派**意识到发生了右派政变**，口头上也都说“要干”，对罢工等激进和主动的反击措施都表态支持，但是最后行动上仍然没有超过应激反应与合法行动（加强战备是之前的通知所要求的）的程度，仅仅是加强了警戒巡逻、进一步动员民兵[115]、拉拢上海警备区部分亲革命派领导成员和布置了预防措施（从规模上只能预防市内的军事政变）。可以看出，大部分革命派的“要干”只是继续革命思想下的**应激反应**，而不是真的有计划有决心的决定；“干”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保卫革命派，不如说只是为了防止邓小平一类明确的右派发动的政变。由于具体情况不明，之后革命派一直犹豫不决，没有提出决定性的措施，而是纠缠于细枝末节的小事上。同时，走资派开始部署军队包围上海。

[114] 参见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Ⅱ》1554-1555 页。

[115] 事实上，1976 年 8 月，中央军委就发文要加强战备、给部分民兵发枪。

10月9日，走资派中央已经通过在上海的北京老干部得知了上海民兵动员的消息，于是利用叛变的马天水，先是让他在电话中向上海领导层谎称王、张、姚没事，使徐景贤、王秀珍等革命派误以为中央发生了斗争但是革命派获胜了，于是撤销了部分民兵的布置。晚上，在走资派中央的操纵下，马天水又让王秀珍、徐景贤两个剩余的上海市委书记到北京开会，斩首战术再次奏效——两人相信了马天水，第二天去后即被软禁，可见他们两人面对反革命政变在战略上陷入悲观主义，觉得与中央对抗或逃避没有成功可能便选择放弃[116]（这些也是很多革命派的错误观念）；在战术上又轻信了老干部马天水，使得造反派之后实际上无人能扛大旗，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并彻底失去与上海老干部抗衡、强行发动起义的能力。不过事情仍有一线生机——上海革命派没有按马天水所说的撤掉民兵点。同时在9日晚上，上海造反派领导班子的一些成员根据蛛丝马迹已经猜到了政变的部分细节。

10日，上海革命派领导层发觉上海警备区的异变后更加警觉，加紧进行武装行动的串联和演习。

11日，政变的信息进一步从多个渠道传到了上海，甚至包括了被抓的中央革命派名单。同时，徐景贤、王秀珍迅速叛变，也向上海报了平安，上海的造反派领导层已经有人猜到了他们三个可能叛变。但是即便如此，其中的绝大部分仍然只在口头上说说“要干”，并没有作出决定。革命派在行动上一直进行的是非公开行动，极力避免惊动外人。这或许有利于麻痹反革命，但是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只会拖慢行动速度，错过短暂的窗口期。尤其是对于民兵这种严重分散、召集缓慢的武装，行动犹豫更加致命。回头看看恩格斯“迅速行动是一个基本规则”的论断，上海革命派焉有不败之理！

[116] 马天水后来透露自己迅速叛变的原因之一就是觉得民兵无法与军队抗衡。

12 日下午，市委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把总工会和市委写作组的领导层叫来一起开会。会议上，革命派领导层再次陷入合法主义。王张江姚被抓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由于群龙无首，领导层打电话要求北京的三人回来指挥，得到了次日回上海的答复，但领导层已经高度怀疑三人叛变的可能性。此时，终于有造反派提出了较为具体的计划——朱永嘉**当场提出了一个起义方案**，要求**当天就干**，并让领导层一一确认，但是由于市委中重要成员（四个老干部市委常委以及工人造反派出身的民兵负责人）要求拖延一天看北京三人情况，方案仍然无法通过，也无法绕过市委执行。市委最终同意先行准备，造反派连夜开会推进准备工作，拟定民兵防御的方案，给工会、妇联负责人开会吹风、要求将有关信息传达基层，但是最激进的标语却仍然涂涂改改、贴不出来。

10 月 13 日下午，北京的三人回到上海，开会劝降（敢放虎归山本身就说明走资派已经胸有成竹，做好了应对起义的准备）。他们代表华国锋中央，仅仅**使用了花言巧语和几份材料**，略施缓兵之计，上海的革命派就投降了，尽管都迷茫想不通，但大多数人皆乖乖地按三人的指示照办，乖乖地撤掉民兵点、取消贴标语等等。之后，三人又使上海的革命派思想上慢慢“转过弯”“泄了气”，彻底失去反抗心理。可见，12 日的拖延不过是缓兵之计，这些人根本就没想按说的那样若三人叛变则绕过三人干。之后的几天，革命派彻底土崩瓦解，被走资派牵着鼻子走，直到最终 10 月末 11 月初陆续被捕。[117]

可以看出，革命派绝大多数人的思想和实际行动，始终是被动地进行局部的、合法的反应，试图作出准备以防万一，而不是主动对走资派出击。

[117] 上海领导层的行动，参见叶昌明《读〈革命造反年代〉有感》、黄金海《十年非梦——黄金海回忆录》、徐景贤《十年一梦——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文革回忆录》、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Ⅱ》。

恩格斯在评论德国1848年革命时的这两段话，放在这里很合适：“在革命中，也像在战争中一样，**在决定性的关头，不计成败地孤注一掷是十分必要的**。历史上没有一次胜利的革命不证明这个原理的正确。1848年11月，普鲁士革命的决定性关头来到了……在弗兰格尔率领四万大军叩打柏林大门的决定性关头，出乎他和他的军官的意料，**他看到的不是布满街垒的街道和变成枪眼的窗口，而是敞开的城门**，街道上唯一的障碍物是和平的柏林市民，他们欣赏着自己同他开的这次玩笑——**他们把自己手脚全都捆绑起来而听任那些惊异不止的士兵的处置**。不错，如果议会和人民抵抗，也许会被击败；柏林也许会遭到炮击，也许会有千百人死亡，而仍然不能阻止王党的最后胜利。**但这并不能作为他们立刻缴械乞降的理由。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1848年6月巴黎的失败和10月维也纳的失败，在使这两个城市人民的头脑革命化方面所起的作用，是2月和3月的胜利所不可比拟的。也许，制宪议会和柏林的人民会遭到和上述两个城市同样的命运，但那时他们虽败犹荣，他们会在活着的人的心里留下一种复仇的渴望，而在革命时期，这种渴望乃是从事坚决激烈的行动的最有力的刺激之一。**当然，在一切斗争中，应战的人都有被击败的危险，但这难道能作为不抽刀应战就承认战败、甘受奴役的理由吗？**

“在革命中，占有决定性阵地而不迫使敌人进攻以试其身手就把这种阵地丢弃的人，永远应该被视为叛徒。”[118]

上海去往北京随即叛变的三人，自然是叛徒；留在上海而犹豫拖延的人，本质上不也是没有肩负起自己的责任、背叛革命了吗？当然，归根结蒂，这是因为上海的革命派没有经历真正大风大浪的考验，仍然是幼稚的，因而深陷右倾路线，在灭顶之灾面前仍不知挣个鱼死网破，好不容易稍有醒悟马上又陷入对中央和

[118] 引自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十三 普鲁士制宪议会。国民议会。

市委书记的迷信，最终遭遇了可耻的失败。另一个原因是，老干部和军队的不配合导致行动起来束手束脚，使大部分革命派**对能怎么行动感到迷茫**。此外，很多领导层虽然嘴上说要干，但是**心里仍然怕流血、怕得不到支持，认为民兵对抗不了军队，起义必定失败**，因此就百般拖延，不愿意自己作出决断。这体现出上海革命派队伍**没有经历大风大浪的淘洗、许多领导成员意志不坚定**的致命问题。

一举后的上海，**没出现一条标语，没一家工厂停工，民兵没一个上街，商店没一家关门，人民生活秩序、生产秩序一切正常，而设点只有三四天，便全部撤销，停止了一切活动**。最令人感慨的是，叛变的三个市委书记开一次会，就能使上海的革命派尽数投降；相比之下，中央传达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后，福建[119]、贵州[120]、四川[121]、浙江[122]、河南[123]等地就有仍在突破了右倾路线、积极进行武装起义准备、甚至开始了武装斗争的造反派，

[119] 据香港《展望》杂志，福建有数量未知的造反派占据老游击区据点，另立党中央，自称工农解放军。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五篇》586-588 页。

[120] 属于温和造反派的贵州革委会副主任康岩中、革委会常委杨德政，在一举后计划撤到农村发动武装起义，为此秘密开会，作出一系列部署和计划，并携枪上山，在各地秘密串联。但是在 12 月末两人先后被捕，起义计划失败。事迹见贵州日报 1978 年 10 月 14 日第二版。

[121] 在 1976 年 11 月，犍为县有数人打出“共产党左派”旗号在敖家公社进行武装起义。见《刑法与案例》126-128 页。在 1979 年，四川有人组织“中国马列共产党”，要推翻邓小平集团、恢复王张江姚的主张，见《刑法知识例解》174 页。

[122] 浙江造反派主流是合法主义，他们在一举后进行大量革命活动，如策划起义、贴标语、散发传单、呼喊革命口号等，见《历史新篇　中国共产党在浙江（1949-1978）》738 页。此外，邱强等造反派走等待主义路线，进行了准备工作，计划等上海起义后进行响应，见杭州揭批查材料。此外，最激进的杭州造反派疑似突破了右倾路线，上山打游击。在 1978 年，杭州还有革命派组织了 13 个秘密组织，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因被发现而被解散，并且领导者被处决。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五篇》790-791 页。

[123] 1979 年，二十余位河南造反派秘密串联开会并建立《中华民族联合阵线》组织，制定纲领，积极进行秘密准备工作，后不慎暴露并被镇压，见《河南省审判志》59 页。

江西[124]等地的造反派也积极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反抗，此外在1978年各地也有零星支持文革的反政府组织，虽然最终他们都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相继失败，但是他们是英雄，而上海革命派是懦夫。

小结

只要透过走资派的障眼法，我们就能发现：恰恰是王张江姚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他们的问题仅仅是政治上不够成熟，战略上滑向右倾路线，进而在战术上没有意识到阴谋，没有作足够的反击准备。政变集团后来对他们“篡党夺权”指控的证据，或为编造或逼供信而得的子虚乌有之事，或为因为他们当时草木皆兵或后来添油加醋而成为“铁证”的分内之事，根本没有一个站得住脚的。反之，华国锋、汪东兴权欲熏心，为了一己私利，就背叛马列走向修正，拒绝团结搞分裂，不光明正大地斗争反而搞阴谋诡计。可见，**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过是有缺点的战士，而政变集团则是叛徒和无产阶级的公敌。**

华国锋、汪东兴为代表的政变集团华派分子，自作聪明地以为靠着这份“功劳”和毛主席的名号就能攫取最高权力，也一度做到了这一点，但是不久便暴露出他们的平庸和愚蠢，进而被元老派夺走了政权。**他们通过背叛打破政治天平而升天的一刻，也是他们为自己掘好坟墓的一刻。**之后，他们的政治生命就已经进入倒计时，元老派进攻的进度，就是倒计时的读秒。

至于元老派，他们作为党内资产阶级的核心与代表，在文革中同样积攒了反革命的经验，在毛主席逝世后敏锐地发现了机会，谨慎地进行阴谋和秘密串联，是十月反革命政变的幕后力量。在政变之后，他们的政治表现也远比华派成熟，使华派毫无还手之力。他们上台之后，资本主义复辟在速度、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加快。可见，他们是中国无产阶级最狡猾、最凶恶的敌人。

[124] 怀仁堂反革命政变后，新建县有造反派组织“共建党”，自称“上海派”，但在不慎暴露后被镇压。见《江西省公安志》202页。

结局：长夜难明赤县天，而今迈步从头越

在通过宫廷政变偷袭革命派成功之后，走资派建立起了**资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变为了**修正主义的党**，党内资产阶级转化为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之后，华派以政变之功上位，元老派则主动居于辅佐的位置。华派屁股还没有坐热，便立刻组织了对革命派的残酷清洗，以争取党内资产阶级的支持。造反派头头、革命干部被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走资派以“四人帮死党”“四人帮骨干分子”“四人帮黑干将”“帮派骨干”“反革命分子”之名，在 1976–1979 年遭到一种或多种清算，方式包括免职、抓捕、关押审查、批斗、判刑乃至枪毙，而一般成员被记为“犯政治错误”“说错话、做错事”“帮派分子”，遭到处分、降低或冻结工资乃至关押审查等等处理，这就是“揭批查”。同时，华派也开启了资本主义复辟的车轮，只是碍于合法性无法展开，因而不久被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换上元老派，复辟也开上快车道。不过，这只是白色恐怖的开始。全国对革命派斩草除根的运动，还有 1982–1987 年邓小平主持的清理“三种人”[125]；而对革命派的镇压，一直持续到今天……

华派与元老派联合执政时期

揭批查在全国绝大部分地方是针对造反派的，只有极少数地区由于支持造反派的干部跳船到华国锋一方而暂时幸免于难（如山西）。同时，有些暂时还未被处理的革命派干部在揭批查中保护造

[125] 指所谓“跟着林彪、‘四人帮’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

反派，在揭批查后期多被撤职或者调离，被保护的造反派随后也没能幸免（如吉林）。此外，在清算中学生有时会受到一些宽大处理，而工人则从没有这么幸运（六·四运动中同样有这种现象）。



揭批查中的批斗大会

揭批查中，走资派再次使用了他们惯用的扩大化手段，奉行“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准则，将很多谈不上革命派的人也打成“四人帮帮派体系骨干”，于是全国在这两年内关押了上千万人[126]，相当于全国人口的约1.1%，被处分、降低或冻结工资的更是不计其数。为了制造揭批材料，走资派在各地吹毛求疵，甚至不惜伪造材料、搞逼供信。于是，我们能看到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材料[127]。此外，由于紧绷着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弦，揭批查期间走资派甚至会十分可笑地将一般刑事犯也挂靠

[126] 胡耀邦曾透露：“全国的审查已经关押了上千万人，超过国共内战的八百万人。”参见程惕洁《四十余年回首，再看内蒙文革》，宋永毅《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94页。

[127] 例如，王洪文的“酒心巧克力”“酱菜罐头”“太阳能打火机”就是这种模式的产物。

到“四人帮”上。到了后期，随着华派的失势，甚至连华派的地方成员都被清查。在揭批查中，绝大部分（新）保守派[128]再次得势，助纣为虐，兴高采烈地批斗造反派。但是他们最终也逃不过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命运：一度加官进爵的新保守派和一些保守派的头头和支持的干部很快在清理三种人中又被撤职甚至开除党籍，而未被处理的（新）保守派成员也不会获得多少好处，顶多不过是在入党、提干上有一些优势。当然，大部分保守派一边的老干部则高枕无忧地官复原职甚至替补空缺。

揭批查以三个“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为标志，分为所谓的“三大战役”，分别对王张江姚从政治、历史、理论进行清算。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结束、并在一个月后宣布收尾，但是地方的揭批查最长的进行到了1979年末。

以河南为例，河南的老干部中支持革命派比例很高，这使得河南成为揭批查规模最大的省份之一。在揭批查中，河南省走资派采取“依靠一派、清查另一派”政策，实行以人划线，以时间划线，人人检查、层层过关，农村搞到生产队，工厂搞到车间班组，机关到公务员、炊事员，街道办事处也要揪出“帮毛羽”，有的地方竟提出“提浆糊桶的也不能放过”。从1977年到1983年，二七公社派和支持过二七公社派的干部5万多人，取消党员资格106000人，逮捕判刑1700人，又“突出判刑”2400人，（以上均为官方公布的数字，实际被处理100万人，关押、逮捕、判刑两万余人[129]），如果加上亲属子女因受株连而被审查处理、不提工资、不评技术职称等更是不计其数。走资派将保守派和新保守派视为正确派，不仅不清查反而重用他们。这样判案自然极为不公，省委副书记公然暗示要给二七公社派制造冤案，造反派头头

[128] 少数保守派没有得势。其中，新疆保守派在1979-1981年被和造反派同等对待，广西保守派在清理三种人中被打击。不过，这些打击的力度都不大。

[129] 参见《河南文革“两案”清查扩大化受害者的合理诉求不应长期搁置——致全国人大政协全体代表的一封公开信》。

都获刑极重，而其他几派哪怕是武斗、打砸抢分子也不处理，一些这几派的武斗指挥者甚至掌握了清查工作的大权。最荒谬的是，1979 年底，河南省委为避免《刑法》、《刑事诉讼法》于 1980 年 1 月 1 日生效后，其行动被束缚，就赶在新《刑法》生效前夕，紧急布置各级政法部门对揭批查中关押起来的人，不管有没有罪行，均以清理积案为名“突击判刑”（不过后文可以看出，这其实是杞人忧天）。为了防止关押人员向最高法院上诉，把终审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把本应由高级法院审理的案子，强行压给地、市法院判决；把地、市法院审理的案子，强行压给县、区法院判决。“突击判刑”秘密进行，不准开庭，有的判三年，实际上已经关押了三年多。当时河南群众目睹这些赤裸裸地迫害，讽刺揭批查是“一派升天，一派坐监”。[130]

现在有些自由主义者，说揭批查还是“文革的手段”，而没有用“法制”，真是十分可笑！这些将人批倒批臭的做法，是阶级斗争白热化的结果。列宁早就指出，**“专政**就是不受限制的、依靠强力而不是依靠法律的政权”[131]。当时的中国没有能这样用于赤裸裸阶级报复的法律，直到 1979 年走资派才炮制出针对造反派的《刑法》。在这之前，走资派为了防止革命派反击，撕下一切面具赤裸裸地使用专政手段，草木皆兵地将一切可能的革命派打倒，以让革命派永世不得翻身，掌权的走资派顺便再借势把看不惯的人打倒。事情不过是这样而已，难道有什么新鲜的吗？

在清洗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时，华派也**为资本主义复辟扫清了障碍、铺好了道路**。这既是他们阶级本性驱使的，也是他们为了和元老派争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支持所做的努力。

华派的复辟主要在理论、政治和经济领域进行。在理论上，华派首先**将生产力发展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上**，虽然还挂着“以阶

[130] 参见一丁（武彩霞）《试析河南省文革的几个特点》。

[131] 引自《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

级斗争为纲”之名装模做样地批判唯生产力论，但是内里已经改成了唯生产力论。值得一提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即**抓纲治国**）本身也篡改了原意，把阶级斗争的对象改为了“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既为揭批查提供理论依据，又可以宣称自己继承了毛主席的路线，增加自己的合法性。其次，华派宣布“第一次无产阶级大革命胜利完成”（十一大报告），并抛出“有走资派无党内资产阶级”论[132]，变相否定了“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论断。在政治上，除了揭批查外，在元老派的压力下，华派还为右派分子们都平反摘帽，也开始平反老干部。不过，老干部的大规模平反复职还得等到元老派掌权之时。在经济上，华派动作更多一些。

首先，华派打着“发展经济”的幌子，**提倡利润挂帅**，加强劳动纪律、搞“管卡压罚”（《工业三十条》），以恢复高度集中、官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了麻痹无产阶级，华派用小恩小惠收买无产阶级，搞“消费品补课”，增加轻工业和消费品的生产，并从 1977 年开始多次涨工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措施都有针对造反派的意味：劳动纪律的增强利于镇压觉悟工人，而工资的增长专门排除了老造反派。于是，工厂重建了一长专制、专家治厂的制度，计件工资和奖金大行其道，管理民主化的成果所剩无几。工人阶级只能对领导惟命是从，而不被允许进行任何监督，实际丧失了当家作主的地位。农业上，华派继续推行“农业学大寨”和“穷过渡”，却采用了命令主义的派工作队强行过渡的办法，而不对农民进行广泛的发动和教育，贫下中农失去了主动性。不仅如此，华派和元老派还一起搞**“洋跃进”**，几个月间调子越吹越高，最终决定在 10 年内动用 800 亿美元外汇引进成套设备和新技术，以这种洋奴哲学的路线继续重工业建设。这条路线在文革中早就被批判过，因为它短时间看不出问题，但如果代替了

[132] “毛主席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指的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本不是说我们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十一大上的政治报告》

独立自主的路线，长此以往只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地发展，且不得不仰人鼻息。此外，1978 年开始，走资派还大肆出口原油、煤炭等原料换取外汇，大量进口粮食、动员粮食库存来填补减少粮食征购、知青回城、职工增加和返销粮增加带来的粮食缺口。华派也没有落下苏东阵营，同时也往修正主义国家派考察团考察经济，但是来不及“学习先进经验”便下了台。华派还搞了鲜为人知的**“补偿贸易，来料加工”**。1977 年外贸部找港资办厂，次年投产，这就是“三来一补”的起点。此时还仅限于合作经营模式：港资负责投资、管理、下订单、提供原材料、产品返销出口；大陆提供厂房和工人，赚取加工利润和工人工资，名义上所有权归国家。[133] 因为作为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国当时可以依靠外资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因此招商引资符合发展经济的许诺，所以走资派必然会引进外资。

华派虽然搞复辟，但他们不得不在复辟和维护自身合法性间搞平衡，自然无法得到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支持。况且这样一群庸人能左右政局本是革命派和右派政治天平平衡的产物，他们并没有什么本事可言，在革命派出局后政治天平倒向右派，便无以与右派抗衡。因此，在和元老派的政治斗争中，华派节节败退，不久就把政权失掉了。

十月反革命政变后，政变集团根基尚不稳固，于是不得不披着毛主席指示的外衣，不仅批王张江姚只通过穿凿附会毛主席的话，而且文革的诸政策也没有更改，最主要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仍然在名义上继续。论功行赏上，也是没有历史包袱的华派获利最多。

这种情况当然持续不了多久。从 1976 年 10 月下旬开始，元老派就督促着华国锋让邓小平复出，华国锋也在会议中宣布要请

[133] 参见杨勋《“改革开放给了我们报效祖国的机会”》，2008. https://www.cnr.cn/2008zt/ggkf/zxdt/200810/t20081009_505118967.html

他出来工作。这和华国锋之前提出叶剑英当主席一样，属于拉拢元老派，巩固自己位置的行为。不过，邓小平看出时机不成熟，并没有急着要求复出。之后，被边缘化的元老派们相继出来主持工作、握起实权；元老派不断为邓小平复出造势。

到了1977年，华派在年初提出“抓纲治国”，举起**“两个凡是”**，继续用毛主席的旗子作为自己的合法性来源。可见，华派也清楚自己本质弱小，只能紧紧依靠已经逝去的毛主席维持合法性。3月，面对元老派的紧逼，华派提出邓小平1975年犯过错误来拖延，反对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元老派利用华派追认华国锋任主席的打算，与他们作交换。最终双方妥协的结果是，在7月十届三中全会上，以邓小平承认1975年犯了错误为代价，邓小平正式复出，此外华国锋正式也就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随着揭批查的深入，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渐渐稳固，于是渐渐开始抛弃华派。到了8月的十一大，元老派的势力渐渐盖过华派，华派已经颓势初现。

之后，1977年5月开始，邓小平多次吹捧知识分子，将知识分子放到工农之上的特殊位置，以收买知识分子的支持，又恢复了高考、否定了文革的教育路线，于是知识分子很快就彻底倒向元老派。1977年底开始，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开始大规模平反干部，1978年4月，又开始大规模平反右派。1978年，元老派还把一些边缘化的和新平反的元老塞进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加强了自己的势力。

1978年5月起，围绕着“两个凡是”为首的理论问题，元老派和华派展开了斗争。邓小平早在1977年4月就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对抗“两个凡是”。同样在1977年，按劳分配问题上华派早早妥协，但华派仍然继续提升农业生产核算单位，且并未信服。1978年5月，在元老派的亲自审查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发表，遭到汪东兴等华派的打压批判。随后，华派和元老派主要围

绕真理标准问题，附带着按劳分配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和斗争，元老派渐渐占据了上风。到了 9 月，局势基本明朗，华派在争论中完全失败，标志着**华派大势已去**。到了 11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华国锋已经控制不住会议主题，一场讨论经济问题的会议被强行变为讨论历史问题、翻案问题，最终他只能满足元老派的所有要求。这标志着**元老派已经踢开了华派**。随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汪东兴检讨，汪东兴被迫提出辞去一切职务，标志着**华派彻底失去了政权**。之后，华派陆续正式下台，这些可笑的庸人们不过 2 年就把篡夺来的政权丢失了，可谓是遭到历史的报应。元老派的完全胜利，标志着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完成了理论、政治、经济上的复辟准备，**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开始走上快车道**。

元老派执政时期及之后

在邓小平上台后，除了在经济上推出全新的、赤裸裸的复辟政策外，他在政治上首先着手于推出《刑法》，用法律对革命派进行审判。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将中国社会从不适于资本主义的“非常状态”转变为适于资本主义的“正常状态”，首先要将国家机器改造为适合于资本主义的，其中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司法上的变化，也就是搞所谓的“法制”。于是，革命派便成为了“法制”的试刀对象。

“法制”在实行的伊始便展露出赤裸裸的阶级斗争工具的本质。1980 年是《刑法》实行的第一年，在这一年王张江姚被和林彪集团一起审判。所谓审判，然而定罪却完全看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头子们的意思，本质上不过是**政治表演**。邓小平等对文革怀有刻骨仇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头子一开始就主张判江青死刑，但是由于党内有人担心开了杀死路线斗争失败者的先例而反对，外国许多领导人和组织由于江青毛主席遗孀、女政治家的身份而反对，最终没有得逞。江青直到 1992 年才在狱中“自杀”。

王张江姚这边，王洪文当了叛徒，积极认罪；姚文元卑躬屈膝，认错不认罪，向敌人摇尾乞降；张春桥一言不发，横眉冷对；江青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时而反驳指控，时而高呼革命口号，时而嬉笑怒骂。张春桥和江青的表现，展现出革命者的气节，为新一代革命者做出了表率，鼓舞了其他尚未投降的革命派的意志。反之，王洪文和姚文元，则没有保住作为革命者的晚节。

随后到1982年，各地的革命派也被审判，同样是赤裸裸的阶级报复，同样没有“公平”可言。判不判刑最关键的不是干过什么，而是站在哪一边。这种站队的优先性又不仅仅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之分（况且造保在一些地方本来就是模糊的）。例如，在情况比较特殊的地方（如山西），为了对华派进行清算，有的人华派处理过，最后却没有被判刑。两年间，全国审查了48万多人，判刑2万多人，被定为犯严重错误的145万多人。[134]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给造反派领袖罗织罪名的同时，还深挖造反派基层，清理“打砸抢分子”。1980–1982年，全国近116万人被定为“打砸抢分子”，近35万人被定为犯严重错误，被“依法惩办”的人数有5000多之说，但实际上远超此数。[135]

出于和华派斗争的需要，元老派也对几个省份进行了纠偏，对老造反派招降纳叛，恢复了基本人权，以扩大群众基础。但是，这种善意在清理三种人后也消失殆尽。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并不满足于对地方造反派的一次性清算，从蛛丝马迹中也看到还有残余的革命派并不甘心。更重要的是，靠着揭批查起来的（新）保守派干部已经不再被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需要，因此元老派自然得**卸磨杀驴**，让这些干部下台，这同时也是给他们的自己人开路。于是在1982年末，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又发动了清理“三种人”，首先是防止革命派能当上干部进入

[134] 参见《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话》。

[135] 参见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五篇》81页。

统治阶级，为此把参加或支持过造反派的人，尤其是青年，都打入另册，防止有革命派诈降，可谓是**斩草除根**。因此，虽然嘴上冠冕堂皇地说“公平”，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却专门批示不抓打砸抢最严重的血统论老红卫兵[136]，也对老干部比较宽松。其次是为了卸磨杀驴。对于已经彻底否定了文革的元老派来说，参与文革之中的几乎所有派别（除了血统论派、逍遥派等）都是“三种人”，都是有潜在威胁的危险分子，那么此时还在台上的那些“保字号”自然留不得。此外，清理“三种人”还继续针对揭批查中挨整的老造反派，并因为此时华派已经失势，首次打击华派保下的地方的造反派。于是地方上，清理三种人以彻底否定文革的思想为基础，带着打击华派的目的，撤换掉所有积极支持过某一派、“派性很深”的干部，将造反派、新保守派和一些保守派的党员都一概清除掉。不过，由于主要是卸磨杀驴，被清洗者一般不会被判刑，也会安排工作。虽然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极力粉饰自己得到人民支持，鼓吹自己是民心所向，却对口中的“三种人”怕得要命，甚至称“最危险的是文革三种人”[137]。可见就算在残酷的揭批查后，他们的统治也不稳固，革命派也仍有一定力量。

清理“三种人”的主要形式是整党，针对的是突击入党的党员。全国 39 万多位党员被审查，3 万多人被取消党籍或清除出党。[138]在整党中全国各地又专门成立了核查“三种人”小组，有 20 万干部参加核查，往往一个市就能配备成百上千个干部专职审查（如石家庄高峰时专职审查干部 1600 人，兼职干部 1100 人[139]），在

[136] 面对北京市民对清查孔丹等血统论老红卫兵的要求，陈云在上诉书上批示：“孔丹等人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是我们将来可靠的接班人，他们不应当是清查对象。”

[137] 引自《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话》。

[138] 参见《再接再厉善始善终完成清理“三种人”任务——曹志在清理“三种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整党通报》第 151 期。

[139] 参见《王纲同志在全市清理“三种人”工作总结会议上的讲话》。

各地各部门考察了少则 25%、多则 40% 的干部，立案审查、考察几百万人，[140] 于是到 1987 年整党结束时，又在全国（除广西）清查出 5449 名“三种人”，4.3 万余“犯有严重错误的人”。[141]

除了上述被记录下来的迫害，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还用编黑材料的方式，对老造反派及其家庭进行了**延续至今的隐蔽迫害**。对待这些老造反派，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连自己新制定的法律程序都抛到脑后，再次用上赤裸裸的阶级斗争手段。这些背着黑材料的人，会在生活中受到各种限制、歧视乃至监控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迫害，例如提薪、提干、评职称、工作调动、考验、表彰、出国等等都会受影响，还会被列入“政治重点监控人口”。更有甚者，有的做生意的老造反派都会被针对 [142]。更不用说他们还有长期背着的荒谬判决，这些判决或被禁止上诉，或明确宣称“不受理、不复查、不纠正”，甚至在得到法院支持的情况下也会因为上级的禁止而无法撤销。

甚至于，哪怕是在表面上已经和文革无关的事上，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也要在老造反派身上再踩上一脚。例如，1983–1987 年的“严打”，对象就包括“现行反革命”和“林彪、‘四人帮’团伙残余分子”；1989 年六・四运动中，邓小平还将参与者与造反派联系在一起。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不仅迫害文革的“人”，还要污蔑和扭曲文革的“史”。仗着对史料的垄断，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文革进行的意识形态上的长期抹黑和模糊化，往文革泼各种各样的污水，选择性不公开档案，所谓**“宜粗不宜细”**，同样延续至今。

[140]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整党办公室《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清理“三种人”文件汇编（第一册）》，曹志在清理“三种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6.06.07。

[141] 参见薄一波《整党与党的建设》第 332 页。

[142] 参见翁森鹤《狱中歌：文革奇案千古奇》257–258 页，《武汉地区文革纪实》880–884 页。

不过，尽管受到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种种残酷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埋葬同伴的尸体，继续着战斗。

在80年代，已经有造反派开始反思文革的失败（详见附录一），亦有零星的武装起义事例[143]。此外，在六·四运动中，也有造反派的参与。[144] 到了90年代，随着国企改制和私有化、农村三提五统的进行，工农的阶级斗争活跃和激烈起来。而老造反派成员便常常在其中发挥**骨干作用**。仍以河南为例。在工厂中的一些前红卫兵、前工人造反派零散地参与在斗争中，他们善于将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话语上，善于组织、动员和宣传。同时，他们也已经**意识到政权性质的改变**，并能根据形势制定合理的策略，并且能十分坚强地进行斗争。这些**运用到的都是他们在文革的经验**（也因此上限是夺权经验，对应接管工厂）。[145] 而这些强项在年轻一代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则尚处于萌芽状态。在农村，老造反派成立各种各样的组织，以反腐败的名义进行武装斗争。[146] 可见，文革在锻炼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的目的上是有成果的，经历过文革洗礼的老一代工农运动领袖强于未受洗礼的新一代。

除了觉醒更早的老造反派外，私有化的进程也迅速唤醒了广大普通的国企内无产阶级（老工人）对文革的记忆。90年代后期开始，在现实阶级斗争的教育下，尽管整体上仍是自在的阶级，但老工人已经普遍地怀念着毛时代，尤其是文革时代。许多人进

[143] 例如，云南洱源县有一些人从1980年开始反对与批判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复辟路线，并在1986年组织“华升党”，制定纲领、组建军队，写《告全国人民之血书》，在县城发动起义。见《云南省志·检察志》180页。

[144] 例如，武汉老造反派、前反潮流派头头之一唐恒山在1989年去北京参加六·四运动，之后失踪。参见《武汉地区文革纪实》678页。

[145] 关于工人领袖中老造反派的作用，可参见陈峰《当代中国的国家与劳工 制度、冲突与变迁》第12章 框塑抗争：工人领袖的角色，319-336页。

[146] 组织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等。见刘思仓主持《当前我省（河南）农村社会治安现状及其治理对策研究》。

一步明白了文革的理论，运用起了文革的经验。在斗争中，老工人的组织性、理论水平、局势判断力都远高于新一代的农民工。他们往往能准确地判断出局势，制定合理的策略，因而成为自为的阶级。此外，有一些老工人开始转而回忆与研究文革，进而或发到网上、或为进厂融工的左翼学生讲解而被记录下来。

小结

走资派在上台后转化为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斩草除根的清洗，使无产阶级失去了自己革命的一翼，从自为的阶级退化为自在的阶级。另一方面，他们又在笼络工人、市民、知识分子的同时一点点进行着复辟，使社会主义中国慢慢转化为资本主义中国。从那时到现在的 40 多年，世界上再没有存在过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世界共产主义事业遭遇了**历史上最近一次重大失败**。

复辟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掩盖自己复辟行径的实质，不得不使用颠倒的话语，例如自己搞宗派活动篡党夺权、搞资本主义复辟却骂王张江姚搞宗派活动篡党夺权、搞资本主义复辟，华国锋背叛毛主席却大搞“两个凡是”，邓小平阉割毛泽东思想却声称是“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此时的话语，颠倒来说竟然更接近真实，可见此时他们的实质虚弱到何种地步！直到 80 年代，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才基本上能不加掩饰地说出自己的大部分意图。

尽管在革命低潮期，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仍然坚持着斗争；到了无产阶级被彻底背叛时，大量老工人能赞同起文革、回忆起文革的理论和手段，发动较高水平的斗争，这些都反映出文革的教育是有成果的。随着他们的老去，新一代左翼理应继承这些老造反派、老工人的遗产，把经验用到之后的阶级斗争中去。

结语：先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

如今，经历了57年多的时光，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的打击下，文革的亲历者已经所剩无几，革命的接力棒已经基本交到了后文革左翼手中。我们不仅要总结前人的经验，更重要的是要将共产主义革命的火种重新点燃，将无产阶级的事业继续下去。

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及参与其中的革命造反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扼杀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御用文人们怎样涂抹粉饰也不能把他们洗白。

文革死了，文革万岁！

文革大事年表

1965

11 月

10 日 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北京市委强行压制，不予转发。

杨尚昆擅自在毛主席身旁安装窃听器，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被审查。

30 日 《人民日报》转载姚文，仅当学术问题讨论。

12 月

11 日 罗瑞卿被打倒。

22 日 毛主席点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

27 日 北京日报发表吴晗的文章《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1966

1 月

6 日 彭真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三十多人参加会议。继续强调学术讨论。

13 日 关锋和戚本禹的两篇批判吴晗《海瑞罢官》被压制，不予发表。

2 月

3–8 日 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起草并通过《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二月提纲)。

12 日 二月提纲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全党。

3 月

11 日 代表彭真的许立群回复上海市委宣传部时责问姚文发表为何不打招呼。

17–20 日 毛主席在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讲话，谈到要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进行批判。

30 日 毛主席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

4 月

2 日 周恩来赞同毛主席指示。

5 日 被扣押的戚本禹、关锋文章受康生批准发表。批判升级。

10 日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的纪要》被下发到县团级，号召“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搞掉文艺黑线”。

16–24 日 毛主席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彭真，讨论撤销“二月提纲”。

28 日 严慰冰事件发生，严慰冰被逮捕。

5 月

8 日 陆定一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批判，随即垮台。

10 日 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文章《评“三家村”》，批判北京市委。

15 日 首都工作组成立，以保卫首都安全。

16 日 “二月提纲”被撤销。

“五一六通知”发布，文革正式开始。

18 日 林彪作防止反革命政变的讲话。

22–23 日 朱德被围攻，小范围作检查。

23 日 彭罗陆杨职务被撤销、停止。

25 日 聂元梓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全军发出《关于执行中央 5 月 16 日通知的通知》。规定要“点名批判”者由各大单位常委批准。

28 日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

29 日 清华附中学生组织“红卫兵”成立。

刘邓集团决定压制文化大革命，向全国大中学校派工作组，压制群众的革命行动。“五十天白色专政”开始。

6 月

2 日 聂元梓的大字报被《人民日报》刊登。

清华、同济、上交、复旦、上科大、南大、华东师大（3 日）等大学都贴出大字报，揭发批判校长或校党委。

3 日 刘邓集团决定压制文化大革命，向全国高校派工作组，压制群众的革命行动。“五十天白色专政”开始。

4 日之后 部分学生质疑工作组，写出大字报揭露问题，反被工作组打成右派。

14 日 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发出《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规定军队一律不准介入地方文革，批判限制在宣传、文化等少数部门。共汇集成六条指示。

21 日 中央军委发出《六条指示》。要求对各院校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决定“整风彻底”的院校不开展“四大”。

刘邓集团和各省/市/自治区委陆续抛出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以文艺界人士为主。工作组也抛出一批“反动学术权威”供学生批判。

7 月

各省 / 市 / 自治区委向工厂派出工作队。

8 日 叶剑英以总政治部名义要求军队文革只限制在 23 所高等技术学校中进行。

19 日 毛主席回到北京，听取汇报，批评刘邓集团镇压学生运动，决定撤销工作组。

28 日 《关于撤消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颁布，“五十天白色专政”结束。工作组撤出后，北京的高校内，工作组反对者和以高干子弟为主的工作组拥护者各自成立红卫兵，形成尖锐对立，进行激烈辩论。

29 日 北航附中贴出了“鬼见愁”对联，宣扬血统论。

8 月

1 日 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批判刘邓集团的方向错误。

5 日 毛主席写《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8 日 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

全会闭幕后，全国学生成立红卫兵组织。以北京为首，血统论老红卫兵走向社会破四旧、抄家、迫害“牛鬼蛇神”，因此这个月被称为“红八月”，但实际上这些行为持续到10月初。造反派红卫兵则继续与前工作组成员和血统论老红卫兵斗争。

13 日 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称“现在军队里师级以下的单位，只搞正面教育”“军级以上机关，则发动群众搞大民主，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搞文化革命，大体上准备搞三个月”。军队文革全面开始。

部分地方的红卫兵开始批判省/市委。

18日 毛主席第一次检阅红卫兵，之后又多次检阅全国红卫兵。大串联开始，北京的红卫兵到各地串联，他们的矛头很快指向地方的省/市/自治区委。

9 月

5 日 中央通知大串联坐火车一律免费，并对参与人员提供补助。大量首都红卫兵南下串联，冲击各地省市委，设立联络站，在此后各地冲击资反路线和夺权时起重要作用。

14 日 中央发表《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指出县以下的文化大革命仍然按照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

10 月

2 日 《红旗》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前进》，号召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按照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态度，红卫兵分化为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

5 日 军委、总政治部颁布《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运动初期的政治结论一律无效、个人检讨材料交还本人、挨整群众予以平反并恢复名誉。原先对军队院校文革的个别限制规定被废除，军队院校被允许开展“四大”、进行串联、成立群众组织，但仍不允许介入地方文革。
全国出现争夺黑材料的暴力冲突，造反派将这些材料公布于众后，激起了群众的愤怒，进一步扩大了造反派的队伍，加剧了造反群众与当权派的对立。由于军方被怀疑包庇前工作组成员，出现群众冲击军队机关的情况。

9 日 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在会上首次点名批评血统论，标志血统论老红卫兵逐渐走向失势。《中共中央关于党政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初稿、供讨论用）》中指出“机关干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可以建立各种群众性的革命组织。……允许革命干部在本机关、本地区以及同一业务系统内进行革命串联。”之后，造反的干部逐渐形成了各机关单位的干部造反派组织。

28 日 群众组织成立禁令开始松动，周恩来认为非学生青年组织已经组织成立的可以保留。

11 月

9 日 最早的工人造反组织（工总司）在上海成立。

10–13 日 安亭事件爆发。工总司打算北上赴京告状，被阻于安亭站。张春桥同意工人的要求，随后被毛主席承认。跨行业地区性工人群众组织随之被允许。

受安亭事件影响，以北京上海为首，各地工人造反组织迅速出现。

11–22 日 中央就工矿企业造反出现《十二条》《十五条》两大对立倾向。《十五条》后续遭到中央文革批判。

22 日 "上海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要求取消临时工、外包工等制度，自即日起不得辞退临时工、外包工等经济诉求。是为“经济主义妖风”在上海的发端。

12 月

工作队陆续撤出工厂。

9，13 日 中央先后通过工矿企业、农村进行造反的相关规定，要求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活动，抓革命、促生产，仿照城市试图在农村推广造反运动，也要发展红卫兵，将四清纳入文革运动中。

16 日 联动一冲公安部。冲击公安部接待室，劫走被押送的联动成员。之后，联动又 5 次冲击公安部，合称为“联动六冲公安部”，引起北京市民的极大愤慨。

由于天气入冬和流行性脑膜炎流行影响，大串联渐渐被停止。

重庆、上海等地出现大规模的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武斗开始仅限于拳脚，后来逐渐升级为棍棒、大刀长矛。

1967

1 月

1 日起 上海市委向各类要求改善经济待遇的工人组织大幅度让步，席卷上海各产业部门，造成大规模经济混乱，为“经济主义妖风”的正式出现。

2 日 中央文革为了解上海情况，决定派张春桥和姚文元作为中央文革调查员赴上海了解运动情况。

4 日 工总司宣布罢免上海市委，要求中央彻底改组市委，标志着一月风暴的爆发。

张春桥、姚文元抵达上海，毛主席要求他们不参与活动，仅进行观察，及时准确地反映情况。

5 日 已被夺权的《文汇报》发表《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批判经济主义，受到毛主席赞扬。

上海工总司发表文章《不能转移斗争大方向》，反对经济主义倾向。

8 日 “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成立，工总司动员全市力量，统一行动，统一指挥，迅速制止经济主义妖风造成的生产面临瘫痪局面。此后各生产部门在工总司动员下接管生产指挥，迅速恢复生产。

16 日 工总司夺权成功并被中央文革派认可。

19–21 日 广西造反派桂林老多连续三天在桂林召开万人大会批斗韦国清，进行侮辱性游斗。

一月风暴中，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大规模夺权运动，工人造反派正式崛起，标志着工人造反派代替学生造反派，成为革命主力。

21 日 毛主席首次表态支持军队介入地方文革，支持造反派。

23 日 毛主席要求军队支持造反派，促进夺权胜利。《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军队开始三支两军，直接介入地方文革。

26 日 出现军队镇压造反派的流血事件（新疆石河子事件）。

27 日 毛主席指示军队文革应与地方运动错开，不要同时进行。随后颁布《中央军委命令》（军委八条），要求军队“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并禁止造反派冲击军区。不过，后续的传达过程被走资派控制，导致军委八条在很多地方未被完整地按原意传达。

2 月

5 日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得到中央支持。

10 日 罗广斌身亡，死因不明。

11–16 日 中央走资派发起二月逆流，疯狂反对文革，与中央文革派发生激烈冲突。

二月镇反（河南等省称为二月黑风）开始。在青海等省，军队实行军管，曲解或无视《军委八条》，攫取造反派夺走的权力，镇压乃至屠杀造反派。

23 日 青海二·二三事件发生。赵永夫下令以 13 个连的兵力攻入造反派占据的《青海日报》报社并开枪射杀群众。

24 日 在毛主席建议下，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上海革命委员会并实施“三结合”。此后全国各地夺权均以成立革委会为主要目标。造反派为反击军队，冲击武器库夺取武器，使武斗迅速升级。各地夺权进程被中断，至八月前仅北京成立革委会。

3 月

三月黑风开始，军队强制解散湖北等省的造反派组织，数千人被捕、被杀或受伤。

10 日后 通过地方造反派的上访和串联的造反派红卫兵了解各省情况后，中央把许多直接反对的军头和扶持起的党委调走或撤换。各地开展反击逆流行动，新一轮造反高潮掀起。

19 日 中央两次发出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知，各地接待站陆续撤销，串联逐渐减少，但学生依然能免费乘车、免费吃住，到年底彻底停止。

4 月

中央文革促进“大联合、三结合”，实行以造反派为主体的大联合、进而建立三结合的革委会。这遭到保守派和一些支左部队的强力抵制，部分省份支左部队支一派压一派或扶持保守派，是为“四月黑风”。

6 日 《中央军委命令》(军委十条)发布，纠偏《军委八条》，全国各地被军队搞垮的造反组织纷纷重整旗鼓。

5 月

13 日 五一三事件发生，军内造反派被打压，此后一蹶不振，林彪集团正式形成。

部分地区开始出现激烈武斗，以使用棍棒、砖头及冷兵器为主。

6 月

全国大部分省份出现军队支持的一派与造反派间的激烈武斗，出现重武器使用。

7 月

王效禹到徐州解决两派群众组织矛盾时，改组徐州革委会，让许世友信任的军人革委会主任下台，扶持造反派上台，得罪了许世友。

14 日 –9 月 23 日 毛主席南下视察各地情况，首先到武汉，随后到上海、江西、浙江、湖南、湖北。

20日 七·二〇事件发生。武汉保守派百万雄师、8201部队（独立师）在武汉军区领导人故意纵容下独走，冲入东湖宾馆揪斗王力，将王力绑架走，并导致毛主席被迫飞往上海。之后，该事件在中央会议上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公开定性是严重政治事件）。受武汉七·二〇事件影响，各地掀起了冲击军事机关的新高潮，造反派到处清算报复保守派，揪斗“陈再道式的人物”，是文革斗争矛头转向军队的标志。

22日 江青接见河南激进造反派二七公社的代表时引用文攻武卫口号，次日刊登在《文汇报》上。

25日 林彪号召“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矛头直指萧华。

8月

1日 陈伯达、王力、关锋等人为八一建军节写的《红旗》社论（八一社论）中，号召“揪军内一小撮”，将斗争矛头指向地方的军头。

4日 主席提出“武装左派”。此后全国武斗迅速升级，从拳头、棍棒升级为真枪实弹，进入全面内战阶段。

7日 王力向外交部造反派发表讲话，鼓动他们打倒外交部长陈毅，从监督外交部工作变成“当外交部长”，被称为“王八七讲话”。

10日 《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发布，明文规定要给造反派发枪，建立群众武装，严禁给保守派发枪。

四二二在北京京西宾馆把韦国清打至重伤昏迷。

8月上旬 毛主席提出：不要并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还是提党内一小撮。叫停揪军内一小撮。

25日 萧华在经过长期点名后，被打倒和批斗。

26日 王关戚事件发生，三人被毛主席点名，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

9 月

5 日 《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九五命令）发布，遏制武斗。

10 月

14 日 《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发布，要求学生返校复课，学校恢复招生，“边上课边闹革命”。
军内造反派彻底解体。

11 月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展试点。

12 月

中共中央决定对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实行“军管”，由公安机关军管会行使国家的检察权、审判权。

1968

1 月

21 日 戚本禹被隔离审查，不久和王力、关锋一起被关进秦城监狱。

2 月

黄永胜将支持四二二的6984部队调走。

3 月

24 日 杨余傅事件发生。余立金秘书单世充的妻子纵素梅向空军党委办公室反映单世充与在《空军报》工作的杨毅（杨成武之女）之间有不正当关系。经过发酵，杨余傅均被打倒撤职。该事件被

打为为二月逆流翻案。受事件影响，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改组，中央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军委办事组实际等于取代了中央军委常委，林彪集团正式形成。该事件也是反三右一风运动的导火索。

4 月

反三右一风运动开始，造反派清洗了许多保守派掌权的县，遏制了地方上老保翻天的现象。某些建立了革委会的省份的造反派发生分裂整合，形成新的两派。另一些省份造反派分裂后陷入武斗。

5 月

21 日 柳州市“4·22”派的“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等组织群众意外发现援越弹药，在不清楚来源用途的情况下将物资拿走，后被认为是故意抢夺援越物资。

25 日 清队运动在全国展开。

7 月

3 日、24 日 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先后颁布，大规模强行停止武斗。

8 月

28 日 中央颁布八二八命令，禁止冲击军队、抢夺军队物资，要求一切跨行业群众组织立即解散，要求一切组织停止武斗、解散专业武斗队、撤除据点、上交武器。

9 月

5 日 全国各省市（除台湾外）均成立革委会，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

10 月

13–31 日 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彻底打倒刘少奇，再次批判二月逆流，为九大召开做准备工作。

14 日 《红旗》第 4 期中《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提出“反对复旧”。

11 月

14 日 《济南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彻底粉碎为“二月逆流”翻案妖风》，为“反复旧”运动的先声。

24 日 山东省革委会举行第五次全体委员会议，决定开展“反对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和复旧倾向”运动，反复旧运动正式开始。以山东为首，反复旧运动随后在全国多省出现。

12 月

3 日 根据毛主席批示，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转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发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对清队过火现象进行纠偏。

22 日 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老三届、小三届被半强制性安排到农村作为知青插队。

本年和1969年 广西屠杀之风极为盛行。

1969

3 月

2–17 日 珍宝岛事件，中苏冲突加剧，中国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中下旬 武汉钢新两派头头决定冰释前嫌，共同发起反复旧。

4 月

1–24 日 九大召开。

中央文革小组停止活动。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成为政治局委员，但在军队和政府中没有实际职务。

11 日 毛主席首次指出清队扩大化倾向，要求纠偏扩大化错误。

28 日 李必达事件，黄永胜秘书李必达向毛主席检举林彪秘密串联、反对江青的言论，被黄永胜扣押并将其擅自关押迫害。

27 日 周恩来接见武汉造反派时传达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批评反复旧运动破坏团结。此后反复旧运动偃旗息鼓。

5 月

22 日 24 号文件（五二二指示）发布，叫停内蒙挖肃。不过，之后内蒙古又陷入了批滕派（反对挖肃）和 522 派（支持挖肃）的派斗之中。

26 日 毛主席谈“反复旧”时说：“个别的复旧是有的，但提“反复旧”的口号是错误的。”

毛主席在中苏冲突高潮想起五・・一六问题，指责北京不抓五・一六。

6 月

10 日 周恩来传达政府各部门精简方案。该方案将国务院原 61 个部、委、局裁并为 19 个工作部门。他还宣布国务院业务组增加纪登奎、李德生二人（业务组中没有林彪集团成员）。之后，国务院大抵按照此方案进行精简。林彪集团被排除在国务院系统外。

11 日或 12 日 毛主席审阅并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之后，滥造毛主席像、忠字舞、“忠字化”等个人崇拜行为被禁止。

7 月

3日 周恩来将中央和国家机关精简方案设想书面报告毛主席。

9 月

11 日 柯西金参加胡志明葬礼后顺路访华，同周恩来会谈，双方均认同避免武装冲突，局势略微得到缓解。

20 日 周恩来借题发挥，要求挖五·一六“搞深搞透”。

10 月

1 日后 大批中央领导人被疏散到外地，中苏冲突进入最高潮。

17 日 林彪擅自发布《林副主席第一号令》，宣布进入临战状态。

19 日 毛主席审阅《林副主席第一号令》后不满，亲手烧掉文件，林彪等人知道后撤回文件。

20 日 中苏两国外交部副部长级的边界谈判正式举行，谈判未取得任何进展。苏联向中苏边界增兵但未再次发生军事冲突，国内转入备战状态，开展“深挖洞、广积粮”全国性战备运动。

12 月

19 日 内蒙古实施全面军管，对苏备战并缓和内蒙形势。

1969年九大后—1970年庐山会议前 林彪在各地暗中发展自己的势力，拉拢了一些军头加入林彪集团，上自己的贼船。

1970

1 月

31 日 经毛主席同意，中共中央发出经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

2 月

5 日 《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发出。三份文件合而为一，一打三反运动开始。

3 月

16 日 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废除主席问题。

27 日 “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批清）运动正式开始。

7 月

31 日 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作了长达 7 小时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报告》。受林彪刻意吹捧。

8 月

13 日 吴法宪和张春桥关于宪法中吹捧毛主席天才的言论存废爆发激烈争论。

23 日 九届二中全会（第三次庐山会议）召开。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问题；战备工作问题。

林彪谈话在“天才论”和国家主席问题上，不点名批评了张春桥的观点，同反对设立国家主席的路线针锋相对。

24 日 陈伯达打印并分发“称天才”语录，引发华北组要求设立主席职位的激烈反响。

25 日 分发华北组第二号简报，痛骂张春桥。

毛主席作出反击，明确不设国家主席并严厉批评陈伯达，停止讨论林彪的开幕讲话，收回简报并让陈伯达作检查。

10 日 陈伯达被批判、审查、软禁，中央成立专案组调查他的历史问题。林彪要求其党羽“照常工作”“有事多向总理报告”，企图蛰伏。

9 月

6 日 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全会通过宪法修改草案，不设国家主席。

28 日 周恩来让吴法宪写检讨，替林彪担责。吴法宪告诉林彪后，林彪反对并表示自己负责。

国庆节前夕 毛主席约林彪谈话，有换掉吴法宪空军司令的意思。林彪尽力保护吴法宪。回去后，林彪赞成吴法宪自我批评，但是吴法宪三次求见毛主席都被拒绝。

29 日 吴法宪的检讨送至毛主席处。

10 月

13 日 叶群给毛主席写检讨。

14 日 毛主席批示吴法宪检讨，批评军委办事组，提出“反潮流”。

15 日 毛主席给叶群检讨写批语，表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20 日 毛主席对清查五·一六“一风吹”不满意。

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上，针对一打三反，毛主席指出 “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的”。

11 月

1 日 周恩来指示清查五·一六“要重在罪行”。

6 日 成立了中央组织宣传组，将林彪集团排除在外，下辖的原军管单位转归革命派控制。

16 日 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全国转入“批陈整风”运动。

12 月

18 日 毛主席接见斯诺，认为“四个伟大”讨嫌，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 Teacher，就是教员”。

22 日 华北会议上，进一步揭批陈伯达，随后各级党政机关逐步展开批陈整风运动。

1971

2 月

8 日 中共中央下发 13 号文件《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建立，吴德任组长。《决定》还指出“必须集中力量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一系列罪行”。

19 日 毛主席在给周恩来的回信上评语，认为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认为华北会议“批陈不痛不痒”，同时召开的军委座谈会也被毛主席批评，认为“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集体在军委座谈会上作了检讨。

20 日 毛主席认为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可以过关，吴法宪需要重写。

26 日 《中央批转〈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的通知》下发各地，一打三反运动迅速结束。

3 月

21 日 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写了书面检讨。

林立果同其党羽研究林彪接班问题。

22–24 日 林立果等人制作了“571 工程”纪要。

23 日 周恩来、康生、江青商量决定开一次批陈整风汇报会，让叶群和四大金刚在会上作检讨。

24 日 毛主席约周恩来同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讨论，商量按毛主席意见修改黄永胜等三人检讨问题。

29–31 日 周恩来带领四大金刚、纪登奎、李德生乘专列到北戴河向林彪传达主席指示。林彪口头认同，但没有表示要参加会议，更没有作检讨的意思。

4 月

1 日 周恩来一行向毛主席汇报北戴河之行。毛主席听了周恩来的汇报很不满意，当面指责四大金刚“到了悬崖边沿”“能不能拉回来全靠自己”。

11 日 毛主席致信周恩来，认为四大金刚检讨应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

15–29 日 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毛主席对军委座谈会提出批评。林彪未参加。

15 日 –7 月 29 日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上，张春桥为首的革命派和周恩来为首的走资派进行角力。

7 月

9–11 日 基辛格秘密访华。

27 日 迟群主持起草、张春桥、姚文元定稿《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系统提出了新教育方针，指出了教育改革的方向。

8 月

12 日 毛主席提出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并打算召开四届人大，由张春桥（主持）、纪登奎、李德生组成筹备小组。

15 日 –9 月 12 日 毛主席南巡，与各地方领导人谈话，察觉到部分隐藏在地方的林彪党羽。

吴法宪向林彪汇报毛主席行踪。

9 月

月初 林彪党羽将毛主席部分谈话的内容透露给林彪。

林立果小舰队得知后，先策划北逃，后来又打算刺杀主席，不成功再逃跑，还计划南下广州另立中央。

8 日 林立果刺杀毛主席的计划被林彪同意，之后遭到失败。

12 日 毛主席安全抵达北京，讲述中共历史的十次路线斗争和庐山会议的历史，并批评林彪、叶群。

13 日 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一家（除林立衡）乘机北逃叛国，坠亡于蒙古国温都尔汗。

北京的小舰队进行垂死挣扎，同样被挫败。

18 日 中央开始下发林彪北逃出事身亡的通知，批陈整风随即转为批林整风。

21 日 林、陈专案工作小组成立。

23 日 周恩来向毛主席报告四大金刚在拼命烧材料。

24 日 四大金刚被隔离审查。限期十天内交出资料，坦白交代。

29 日 四大金刚被离职反省。

王震受邓小平、陈云之托，常在老同志之间“串门子”，沟通消息，多次到叶剑英那里反映“王、张、江、姚”的问题。

10 月

3 日 撤销军委办事组，军委改由叶剑英主持。

24 日 中央决定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向全国工农兵群众传达。

25 日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

11 月

14 日 毛主席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为二月逆流口头平反。

12 月

26 日 周恩来借批判林彪要求整顿。为文革以来第一次出现整顿。

谢静宜向毛主席汇报清查“五·一六”问题时，毛主席为运动降火。

1972

1 月

10 日 毛主席突然出席陈毅追悼会，赞扬陈毅，做肯定评价。周恩来让陈毅家属将毛的话传出去，客观上为政治上解放老干部造了势。许多老干部及其家属给毛主席写信，申诉迫害，要求恢复工作。

2 月

21–28 日 尼克松访华，中美发布上海公报。

4 月

9 日 周恩来在广州讲话，着重批判了“极左思潮对企业管理、产品质量带来的恶劣影响”，在观看部队文艺演出时要求肃清文艺工作中的“极左思潮”。

24 日 《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查同意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之后，一大批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干部陆续官复原职。春季，武汉地区开始出现基层造反派的自发抗争，被称为“街头派”，要求平反在“清队”和“两清一批”遭受打击的造反派。对部分造反派领袖选择合法路线，一心谋求恢复职位，放弃直接抗争的行为感到不满，决心“自己解放自己”，“把颠倒的武汉文革历史再颠倒过来”。

5 月

1 日 毛主席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通知在当时的大学生及有关的干部中引起了震动，反响非常强烈。

21 日 批林整风汇报会召开，周恩来主持。

8 月

1–2 日 周恩来在长篇报告中强调要抓极左思潮。

8 日 张春桥、姚文元与人民日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及有关人员的谈话中强调批极左思潮“不要过头”。

9 月

两报一刊国庆社论起草人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先后两次在社论稿中写入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均被姚文元删去。

10 月

批判“极左思潮”开始在《人民日报》屡次出现。

11 月

28 日 中央文革派反对在外事会议上以批林为名的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提出要批林彪的极右，周恩来经过政治局讨论同意了删除原来的提法。

12 月

17 日 毛主席将林彪路线的实质定为极右，批林从批判极左彻底转为批判极右，矛头从造反派转向了走资派，主导权回到了革命派手中。

下半年 清查五·一六渐渐结束。造反派试图为自己平反，但是没有多少成果。

1973

1 月

1 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发表社论《新年献词》，提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

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在电影戏剧音乐工作者座谈会上，周恩来说文革以来符合标准的作品太少，要抓电影工作。

江青说解放以来文艺太差，要制作一些教育片，推动教育革命。

3 月

11 日 中央转发北京、上海市委召开工会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工会开始恢复运转并进行整顿，代替工代会，部分造反派领袖进入工会常委。

10 日 邓小平正式复出工作。

28 日 邓小平担任外交副总理。

4 月

12 日 邓小平重新在公开场合亮相。

5 月

20 日 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王洪文被指定出席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并正式参加政治局的工作。

25 日 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首次提出批孔。

6 月

25 日 外交部工作人员写了一篇调研文章《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刊登在外交部《新情况》上。文章认为美苏会谈的“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获得周恩来赞扬，周恩来让外交部参考该文修改下关于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议的内部通报。毛主席得知后，严厉批评了通报。

外交部起草周恩来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谈话要点，周恩来修改后送毛主席审定，毛主席认为周恩来的修改口气太软、腰杆不硬，将修改都删去。

30 日 辽宁省下乡知青张铁生参加高等院校招生文化考查，在试卷的背面给领导写了一封信，谈了关于智识考察制度不当的感想。

7 月

4 日 毛主席召见张春桥、王洪文，再次批评《新情况》，认为外交部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批评外交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让他们不要“上那些老爷们（指周恩来）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19 日 《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这位下乡知识青年的信，并为此加了编者按。

28 日 江青看样片时批评影片《园丁之歌》，指出剧名不合适，影片反映的教育路线也有问题，随即展开批判。

8 月

10 日，《人民日报》转发了《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编者按：“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

24–28 日 十大召开，毛主席主持大会，周恩来作政治报告（张春桥起草）；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王洪文号召革命派“反潮流”。

会后，重庆地区造反派领袖基本恢复了在省市革委会的工作。但也出现“十大宣传队”，主要是一些没有进入革委会的造反派，要求按照十大精神重组革委会，很快便被镇压。

受党章精神影响，武汉地区的街头派开始称作“反潮流派”，出现大字报、标语、街头演讲等各种形式的“反潮流”活动。

9 月

15 日 《学习与批判》创刊号发表《论尊儒反法》，首次提出儒法斗争概念。

10 月

29 日 江青听取上海乐团音乐会时批判无标题音乐有无阶级性问题。

清华大学开展反右倾回潮运动。提出教育界出现了一股翻案风，有人搞反攻倒算，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11 月

10 日 基辛格第六次访华，同周恩来谈话，透露苏联准备摧毁中国的核能力。表示美国愿意向中国提供帮助，保证在苏联袭击前提前报警，减少伤亡。

13 日 晚上，周恩来、叶剑英与基辛格再次进行会谈。周恩来未经由主席许可，也未请示报告中央，在次日早晨答复中同意与美合作。

15 日 毛主席听取了王海蓉、唐闻生关于中美会谈的汇报，她们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擅自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没有一针见血地揭穿美国的阴谋，而是半推半就地接受了美国的建议。

21 日 –12 月 5 日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会上，中央各派都积极参与了对周恩来的批判。

武汉地区“反潮流”群众举行“反复旧”以来第一次示威游行。

12 月

11，17 日 中央广播事业局国际联络部工作人员给江青、姚文元写信，说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在 1972 年来中国拍摄的纪录片《中国》是“极端恶毒攻击中国的反动影片”（事实上，《中国》确实有为了猎奇故意拍摄落后情况、挖苦中国等问题）。江青之后大造舆论，批判《中国》，并将它与外交路线的右倾联系起来。全年 老干部全面复出工作。

12 日 毛主席批评中央军委的问题，提议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周恩来传达毛主席关于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邓小平任职等指示。

22 日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此后军队完全退出地方，不再能干预地方局势。虽然革委会里还有军代表的位置，但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实权，只负责军事职能。

邓小平正式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

1974

1 月

18 日 毛主席批准江青、王洪文的要求，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正式开始。

24 日中央军委机关和驻京部队干部会议召开，动员批林批孔运动。

25 日中央机关、国务院机关和所属单位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召开。大会上，迟群、谢静宜在讲话中批评了走后门，说“走后门”“完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逼叶剑英写检查，叶剑英因此事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武汉反潮流派将“为胡厚民翻案”“强烈要求公审胡厚民”的大幅标语在武汉三镇到处张贴，要求释放造反派领袖胡厚民。

2 月

8 日 武汉地区“反潮流派”在中山公园门口举行了万人批林批孔誓师大会，会后举行游行，要求释放造反派群众。

25 日 毛主席认为迟群、谢静宜走后门讲话有转移运动主要目标的风险，不宜下发。

王洪文、江青、张春桥相继在军队系统批林批孔汇报会、军队文艺单位负责人会议上，批评军队领导机关对批林批孔消极应付。江青提出要整军队，该夺权的还是要夺，要在军内搞放火烧荒。

3 月

2 日 胡厚民解除监禁。

3 日 武汉造反派举行大规模游行，庆祝胡厚民、李想玉获得释放，要求进一步释放任爱生、杨道远等仍在狱中的造反派领袖。

11–15 日 周恩来在三零五医院检查确诊癌症复发，但仍高度参与中央事务。

26 日 反潮流派 408 人组成“武汉地区革命群众赴京控告团”赴京。

4 月

4 日 “控告团”向中央接待站递交了《关于刘丰、曾思玉在湖北、武汉地区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的罪行材料》，并要求中央首长接见。

5 日 “反潮流派”冲进市中级法院，抓走副院长等数人，要求释放“两清一批”中入狱的造反派。

6 日 武汉市委书记王克文接见未去北京的反潮流派，承认“对待反潮流问题，开始是有错误的”“补台是要补的，什么时候补，恐怕现在还不适宜”。

10 日 《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问题的通知》下发，要求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不要搞串联、不要“揪”“支左”人员。

15 日左右 反潮流派一千多人游行到省委。要求释放任爱生、杨道远。（在清批和两清一批中被关押）

21 日 “反潮流派”数十人在京西宾馆门前聚集三个多小时，要求王洪文接见，反映问题，未果。

5 月

10 日 反潮流派领袖谢妙福发表文章，坚持 1973 年以来“反潮流派”的基本观点，提出执行中央 12 号文件，改变“反潮流派”的运动方式，按单位开展运动。此后一直到 1975 年反潮流运动退潮，谢妙福、武齐骅等反潮流派改变活动方式，回到本单位、本系统开展运动的打算没有能够实行，努力一番后还是回到街头。

18 日 《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下发，强调清查林彪事件的范围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

国产远洋轮风庆号远航欧洲时，船上的造反派要求随船的远航运输总公司干部批判“崇洋媚外、卖国主义”，被拒绝。

7 月

1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干部“返回工作岗位”将“劳动工资和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一律放到运动的后期”解决，造反派群众“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就地闹革命，严格遵守劳动纪律”。此后批林批孔运动基本偃旗息鼓。

17 日 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批评王张江姚搞帮派活动。这是可追溯的最早一次提出“四人帮”概念。

8 月

中央召开各大军区司令、政委会议，北京[147]李德生、陈先瑞，南京许世友、杜平，广州丁盛、刘兴元，武汉曾思玉，福州韩先楚，济南杨得志等人检讨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尤其是上林彪贼船的错误。这是八大军区对调以来最后一次解决军队问题的会议，在此之后军队的问题表面上基本得到解决，但军队状态仍不正常。

10 月

11 日 四届人大开始筹备。毛主席提出“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13 日 风庆轮事件发生，王张江姚借此发起进攻。

20 日 毛主席选择息事宁人，将该事件定为小事，将革命派的冒进行为称为“闹”，事件草草结束。之后，毛主席又多次要求江青谨慎小心，暗示她要韬光养晦，但是收效甚微。

10–12月 病床上的周恩来暗中进行宗派活动，与很多走资派秘密串联，并提出自己的四届人大组阁名单。

12 月

23 日 周恩来、王洪文向毛主席报告四届人大的事。毛主席第一次明确用“四人帮”批评王张江姚搞宗派活动，让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并要求他们团结中央大部分人。此外，毛主席还给邓小平撑腰，说他人材难得，政治比王洪文强。

因为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长期反对张春桥当总政治部主任，毛主席批评他们说：“你们三个人不要老搞在一起，不要搞‘三人帮’”。

[147] 这里和之后均指军区对调前这些人所负责的军区。

1975

1 月

8–10 日 十届二中全会召开，邓小平、王洪文均担任要职。

13– 17 日 四届人大召开。张春桥主持起草新宪法（七五宪法）并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25 日 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发表《军队要整顿》的讲话，正式开启全面整顿。

2 月

18 日 《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下发，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

22 日 《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33 条马、恩、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

25 日 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召开。

3 月

1 日 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讨论“反经验主义”。

4 日 江青在两次讲话中称：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党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5 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九号文件），整顿铁路运输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

8 日 张爱萍被任命为国防科委主任，负责整顿国防科委系统。

中央专案第一、第三办公室和五·一六专案组撤销，绝大多数审查对象被做出结论并释放。

4 月

1 日 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都提到反“经验主义”。

10 日 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提出反经验主义问题，并要求政治局讨论，遭到邓小平抵制。

27 日 政治局开会传达毛主席关于批经验主义的指示。

铁道部长万里在九号文件授意下，大刀阔斧整顿铁路。

4–5月 周恩来为反经验主义问题，多次与邓小平、叶剑英、王海容、唐闻生长谈，与他们商量怎么批判王张江姚。

5 月

3 日 毛主席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安定团结，为邓小平撑腰，给王张江姚解围，批评叶剑英搞“广东帮”。

8 日 邓小平主持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让万里介绍整顿铁路的经验。

21 日 周恩来写信给政治局，把张春桥不认错的理由否定，逼张春桥进行检查。

23 日 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等人为 4 月 27 日的言论作辩解。王洪文、江青作自我批评。关于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问题的争论基本上结束。

军委扩大会议召开。邓小平、叶剑英通过个别串联、打招呼，布置日后发动政变的基本骨干力量。

29 日 邓小平接见钢铁工业座谈会代表，开始整顿工业，着重强调要整派性。

毛主席与周恩来商定，要王洪文下去工作一段时间，由邓小平取代他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

6 月

3 日 政治局在人大会堂东大厅开会。叶严厉质问江青等人，王洪文在会上不得已作检查。

4 日 国务院成立钢工业领导小组，领导和监督全年钢铁计划任务的完成。

12 日 邓小平接见马天水，试图策反他。邓小平走后，马天水向徐景贤、王秀珍等说了邓小平和他的谈话，并写了《邓小平策反我的过程》，交给王洪文。

24 日 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解决军队调整编制体制等问题，落实“军队要整顿”的任务。

会议上，邓小平、叶剑英否定民兵指挥部。叶剑英甚至离开讲稿，“非常气愤地揭露了江青插手军队、妄图把军队搞乱阴谋诡计”。

会议私底下，走资派秘密串联。叶剑英分别找各司令员、政委谈话，让他们警惕“上海帮”。

28 日 江青向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一份书面检讨，检讨了关于反经验主义、第十一此路线斗争和针对四人帮的批评等一系列问题。

下旬 受接待外宾事件影响，毛主席认为王洪文“政治上不强，威望不高”，把他调回上海和浙江“帮助工作”。

7 月

1 日 叶剑英写信给毛主席，建议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此后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

4 日 邓小平让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发表《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开始党组织整顿。

5日 设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专门负责整顿任务纲领文件起草。

14 日 毛主席对文艺政策做出批示，提出文艺政策应当调整，要扩大文艺节目、扶持作家、文艺问题是思想而非政治问题等。

17 日 胡耀邦、李昌、王光伟三人被派到科学院整顿。

18 日 张天民受胡乔木建议，撰写了一封有关电影《创业》受到压制不得播放的信件，对江青等人确定的罪行进行驳斥，并将其送至中央。

23 日 王子野等人批判江青一众有意阉割百花齐放政策，并将相关材料经由胡乔木交给邓小平。

25 日 信件送至主席处，下件批示准许电影放映。随后邓小平正式开展文艺整顿，解禁诸多影片戏剧。

8 月

13 日 刘冰通过邓小平转交给毛主席揭发迟群问题的信。毛主席开始意识到不对劲。

14 日 毛主席谈《水浒》，指出《水浒》的现实意义。

18 日 姚文元就向毛报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关于评论《水浒》的规划。从此，报刊上一阵掀起了批判《水浒》的高潮。

20 日 周恩来施行大手术治疗。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主席。

30 日 中央军委发出调整配备解放军各总部、各兵种、各大军区的干部的通知。邓小平精简军队，并搭起自己的班子。

9 月

5 日 邓小平接见新西兰新闻代表团，谈到评《水浒》批投降派时指出刘少奇和林彪是投降主义的实例，假装支持对评《水浒》。中旬 根据邓小平意见，中组部召开了云南、福建、四川、湖北等六省委组织部负责人会议，开始起草《关于整党问题的汇报提纲》和《整党问题参阅材料》，着手起草整党工作指示。

15 日 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邓小平提出要“全面整顿”。

26 日 邓小平听取胡耀邦等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说明。胡乔木等人根据邓小平意见对提纲进行多次修改后送交毛主席，毛主席未表同意。

26 日 –11 月 8 日 周荣鑫主持起草教育部向国务院的汇报提纲，作为教育领域整顿的方案。在第五稿送毛主席审阅时，毛主席对一些提法提出异议。最终，提纲未来得及下发。

27 日 毛远新第一次向毛主席汇报辽宁文革情况，认为“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国务院几个副总理讲话有些问题。”

10 月

7 日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完成全面整顿第一个纲领文件《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没来得及下发。

19 日 刘冰第二次给毛主席写信，矛头指向迟群、谢静宜。毛主席在看完刘冰来信后认为矛头对着自己，意识到有一股否定文革之风在蔓延。

11 月

2 日 毛远新第二次汇报辽宁文革情况，晚间谈话直接钦点邓小平整顿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

3 日 毛主席提出文革功绩三七开。

13 日 毛主席同一些老干部打招呼，公开批评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全面整顿停止，但邓小平仍继续主持中央工作。

17 日 姚文元在关于教育革命的讲话中指出前十七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20 日 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会议要求邓小平主持起草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邓小平回复“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24 日 召开第一次打招呼会议，由邓小平宣读由毛主席审定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批评刘冰来信。

12 月

10 日 打招呼文件发到基层。从此，反击右倾翻案风从高层会议向全国范围内展开。

20 日 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检讨。

1976

1 月

3 日 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又作一次检查，请求见毛主席，毛主席未同意。

8 日 周恩来去世。

9 日 新华社请示关于周恩来去世的报道事宜，姚文元答复“悼词尚未发表，现在不组织”。

11 日 周恩来的遗体火化。

20 日 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再作检查。其他政治局委员在会上轮番对邓小平进行指责和批判。

21 日 在中央文革派的推动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

28 日 毛主席让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交出全部权力。

2 月

25 日 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华国锋指出当前的任务是搞好批邓，可以点名批评。运动的名称由“反击右倾翻案风”改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3 月

3 日 华国锋讲话被转发全国，从此全国公开“批邓”。

《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下发，由两个多月来毛主席同毛远新的零星谈话集合成。

25 日 《文汇报》刊登报道，文章中出现“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语句。本指邓小平在整顿中把党羽抬上来，但被解读为影射周恩来，引发南京市民争议。

下旬 南京市许多市民和学生进行游行集会，反对王张江姚，统称南京事件。

4 月

1 日 华国锋主持政治局开会讨论南京事件，采取措施应对。

4 日 清明节，北京等地都出现了群众自发悼念周总理的活动高潮。

5 日 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发生。

7 日 毛主席根据首都、天安门、烧打的特点把 5 日天安门的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

8 日 北京一百多万军民上街举行批邓游行，全国各大城市也组织了大规模的批邓活动。

6 月

月初 毛主席突患心肌梗塞，经过及时抢救，脱离了危险。中共中央宣布毛主席不再会见外国来访人士。

纪登奎通过儿子向一个在北京的河南组织部副部长散布分裂中央的言论，被造反派听到，于是被反映到姚文元处。

7 月

新华社河南分社一位记者把纪民坡讲话送到总社，要求总社通过姚文元转给毛主席。姚文元将信件压下，没往上转。

叶剑英与华国锋见面，认为他很稳重，决定支持他。

叶剑英几次到中南海找汪东兴秘密交谈，两人一致认为不能“让‘四人帮’得势”。

汪东兴多次找华国锋谈心，阴谋把江青搞下台。汪东兴还嘱咐华国锋控制住毛主席的文稿。

邓小平与叶剑英秘密串联，两人一致同意要一网打尽王张江姚，邓小平倾向于用军队政变，而叶剑英倾向于合法手段。

叶剑英还与王震、康克清等人秘密串联。两人都对他表示了自己对王张江姚的反对。

8 月

中共中央将邓小平主持制定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称作“三株大毒草”，在全国发动批判运动。

丁盛拿到许世友的儿子给其女友的信件，随后将信件交至中央，被王洪文得知并转告。信中说毛主席百年之后很可能发生内乱，一旦出事，许世友会立即率兵北上，清算“上海帮”。

9 月

9 日 毛主席逝世。

聂荣臻、王震秘密到叶剑英家中串联，三人对形势进行了分析。

叶剑英走访华国锋，表示自己和“一些老同志”坚决站在他一边。

10 日 王洪文作为政治局常委之一轮值，出于工作需要在紫光阁开设中央办公厅值班室。

10 日或 11 日 华国锋与李先念秘密串联，决定打倒王张江姚，让李先念给叶剑英带口信。

11 日 华国锋与汪东兴秘密串联，双方在打倒王张江姚上一拍即合。之后华国锋又与一些华派、北京军头和部分元老派秘密交流。

12 日 聂荣臻委托杨成武转告叶剑英，建议他先下手为强，采取断然措施。

13日 李先念在西山秘密会见叶剑英，转达了华国锋的口信。

13–19日 叶剑英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20多个重要元老派秘密谈话。邓小平催促叶剑英赶快行动。

14日 华国锋与李鑫串联，李鑫首提使用隔离审查手段。

16日 非革命派的政治局委员们碰头，华国锋试探与会者对王张江姚的态度，纪登奎提出分开对待，因此随后未被拉入政变集团。纪登奎说完后与会者都不好说什么了。可能在这次会上华国锋、李先念、吴德分析形势并最终决定采用隔离审查手段。之后华国锋彻底摒弃大范围讨论的方式，采用个别串联密商的手段。

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发表，首次提出毛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

18日 毛主席追悼大会召开。

张春桥与萧木谈话，认为走资派一时出不了挂帅人物。

19日 江青提出将毛主席文件、书籍交给自己和毛远新处理，遭到汪东兴、华国锋反对。

21日 华国锋与叶剑英在李先念住处秘密见面商议“解决四人帮问题”，之后两人多次密谈。

聂荣臻派杨成武找叶剑英，建议他采用非法手段对付王张江姚。之后，杨成武成为老帅们的联络员。

王洪文前往上海安排毛主席遗体防腐保存事宜，并对民兵部署进行了安排。

张春桥在徐景贤来北京时听取他的汇报，了解了六十军的威胁和民兵状况，让徐景贤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

26日 张春桥嘱咐上海加强战备。

华国锋、李先念、吴德秘密开会，可能在这次会上分析形势并最终决定采用隔离审查手段，并初步决定在10月10日动手。

27日 汪华叶秘密开会讨论如何“解决四人帮”。叶剑英答应事成后帮忙维持局面。之后，叶剑英开始向赋闲的元老吹风。

29 日 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提出让江青进入政治局常委，双方冲突激烈，最终这一动议没有成功。

30 日 国庆座谈会上，吴德在华国锋讲完话后迅速宣布散会，不让王张江姚发言。会后，华国锋、李先念、吴德再次商量“解决四人帮”的时间与可能发生的问题。

10 月

1 日 江青在清华大学讲话，提及批判走后门等多个问题。

2 日 华国锋删去乔冠华联合国大会发言稿的“按既定方针办”。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张春桥指示不下达。

华国锋、叶剑英密谈，决定提前进行政变。叶剑英随后通知了汪东兴。

2–3 日 汪东兴制定政变方案，随后得到华国锋许可。

3 日或 4 日 华国锋与吴德密谈，确认了军队的情况。

4 日 《光明日报》发表梁效的《永远按既定方针办》。

汪东兴、华国锋、叶剑英开会确认了汪东兴的方案，决定 6 日动手。

5 日 汪东兴、华国锋、叶剑英紧锣密鼓地部署政变，知会其他中央走资派。

6 日 –7 日 汪东兴、华国锋、叶剑英发动怀仁堂反革命政变，非法抓捕王张江姚和其他在北京的主要革命派，重要舆论单位被控制。随后，政变集团控制的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华国锋提出叶剑英任主席，又提出清邓小平出来工作，但最终会议决定接下来由华国锋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主席。虽然邓小平没有马上复出，但是境遇马上得到改善：例如为了他日后工作方便，中央决定给他送阅文件。

紧急会议上，叶剑英提出“地方上还有些‘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要清理”“更艰巨的任务是彻底从思想上肃清‘四人帮’的余毒和影响”。揭批查随之实际开始。

7 日 马天水被叫到北京开会。

中央派人找到上海革委会副主任、老干部王一平，告知他政变情况，并让他了解“上海帮”情况向中央汇报。王一平便两次找市委常委张敬标，成功策反了他。

8 日 王秀珍、徐景贤得知王张江姚可能被抓，开会决定把民兵拉出来打，对民兵进行了一些防御性部署。之后上海革命派分别开会，进一步布置民兵，并决定拉拢上海警备区的亲革命派领导成员。朱永嘉、王知常提出立刻开干，但没有被通过。

9 日 马天水叛变，在监视下给王秀珍、徐景贤打电话谎称王、张、姚没事，让两人来北京。两人便撤销了民兵的部分部署。

上海革命派领导层猜到了部分政变细节。

10 日 王秀珍、徐景贤前往北京，随即被软禁。在参加完中央“打招呼”会议后，两人同样叛变。

亲革命派的上海警备区领导班子被南京军区叫去开会，约定回来后打电话说明情况。

11 日 上海警备区领导班子回来后没有打电话。上海革命派领导层发觉不对劲后加紧串联和演习。

政变细节信息传到上海。

王秀珍、徐景贤报平安，上海造反派领导层猜到两人可能已叛变。

12–13 日 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朱永嘉提出起义方案，未通过。市委常委们实行“拖”字诀，终于同意了进行准备工作后，造反派连夜进行起义准备工作，制定了“捍一”“卫二”两个方案，并由工会、共青团、妇联系统向下吹风。工人造反派领导层还拟定了 21 条口号。

13 日 民兵和工人终究都没有行动起来。三个上海市委书记回上海开会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虽然没有说服众人，但成

功稳住了上海革命派领导层。上海革命派领导层随即泄气，于是他们设想的几个起义方案彻底流产。

20 日 李先念向华国锋建议“把邓老搬出来”，华国锋表示“我看这个人靠得住，可以用”。

26 日 华国锋与邓小平在看望刘伯承时相遇，华国锋向邓小平示好，邓小平却说“我是犯了错误的人，今后还要批邓嘛”。

31 日 王震在谈话中给邓小平站台。之后元老派在各种会议上为邓小平说好话。

12 月

10 日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下发，号称“从政治上揭批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和反革命罪行”，开始了“揭批‘四人帮’的第一个战役”。

11 日 康岩中在秘密商议起义计划时被发现，逃跑失败被捕。不久，与他一起策划起义的杨德政也被捕，起义失败。

10–27 日 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举行。会上，华国锋提出“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最后一次提“批邓”。

1977

1 月

21 日 李鑫首次提出“两个凡是”。

2 月

7 日 李鑫等人炮制的《学好文件抓住纲》发表，正式提出“抓纲治国”，并宣扬“两个凡是”。

3 月

3–16 日 全国计划会议召开。

汪东兴捍卫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说邓小平“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声称“1975年，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下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

华国锋使用“两个凡是”的表述。

6日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下发，号称“从组织上揭露他们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开始了“揭批‘四人帮’的第二个战役”。

14日 华国锋同意平反天安门事件，邓小平的复出成为定局。

4月

10日 邓小平在给华国锋、叶剑英的信中承认自己1975年“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但后来很快就翻脸不认账了。也是在这封信中，他首次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5月

12日 邓小平在谈话中扩大科学技术的作用，吹捧知识分子，将他们归为“脑力劳动者”，并表示要给他们提高待遇。之后他又多次在讲话中表达类似的意思。

7月

16–21日 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17日 全会决定邓小平复出工作。

全会通过关于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彻底清算他们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的决议。

21日 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在全会闭幕式公开重申“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

26 日 政治局听取计委汇报总计 65 亿美元的进口计划。邓小平提出增加至 100 亿美元，之后其他政治局委员均同意。后来，引进计划规模不断扩大，最高的方案一度达到 850 亿美元。

8 月

4–8 日 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召开。邓小平听取知识分子意见，迎合知识分子提出的各种要求，抬高知识分子地位，并决定恢复高考，借此获得了知识分子的支持。

10 日 国务院下发通知，为几乎所有厂长和六成工人，共约 3000 万人涨工资。之后工资又多次上调。

12–18 日 十一大召开。

华国锋宣布文革胜利结束。

大会正式将“抓纲治国”定为战略决策，并宣布“要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大会抛出“有走资派无党内资产阶级”论，变相否定了“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论断。

大会选出新领导机构，其中政治局常委有华派两人、元老派三人，反映出元老派势力开始盖过华派。

9 月

23 日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下发，号称“集中揭露‘四人帮’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和罪恶活动。”，开始了“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

10 月

5 日 高考制度恢复。

年底至次年 中国陆续派出考察团前往日本、港澳、东欧、西欧。

1978

3 月

第一家外资工厂在广东投产。

4 月

5 日 《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被批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开始给右派分子摘帽。

20 日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工业三十条）下发，恢复了一长制、利润挂帅、“管卡压罚”，加强了劳动纪律。

5 月

5 日 《人民日报》发表《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7 日 国务院通知恢复计件工资制，形式包括无限计件、有限计件、优质计件和包工工资四种。计件工资制在中国全面恢复。

11 日 《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7 日 汪东兴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压制这两篇文章的讨论。

18 日 张平化在座谈会上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未成定论。之后，他继续压制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22 日 《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发表。

6 月

2 日 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讲话直接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局势发生逆转。之后，他又多次反对“两个凡是”、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15 日 汪东兴批评多家报纸，维护“两个凡是”。之后，他仍坚持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8 月

4 日 –12 月 8 日 所有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和解放军各部队领导人均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9 月

9 日 国务院务虚会结束时，引进规模确定为十年引进 800 亿美元。

11 月

10 日 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开始后，元老派不顾设定的议题，纷纷提出平反问题。华国锋无法控制局势，平反问题被讨论了近半个月。

25 日 华国锋投降，宣布平反决定，接受了所有平反要求。之后，会议议题转向“两个凡是”的讨论，华派仍然是毫无还手之力。全国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全部完成。

12 月

13 日 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华国锋就“两个凡是”作自我批评，“两个凡是”被否定。

汪东兴写《我的初步检讨》，检讨贬低邓小平和压制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错误，并在会议书面发言中恳请中央免除自己的一切职务。

邓小平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标志着元老派取得了对华派斗争的胜利。

15 日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

18–22 日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全会对中央工作会议的结果予以确认，并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全会认为：全国范围内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胜利结束；但又强调：一定要把揭批查的群众运动结束好，做到善始善终。

至12月（1976年10月起） 4600多名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官复原职。

1979

1 月

20 日 新华社报道：鞍钢做好揭批查收尾工作。

1979年底 河南省委对老造反派进行“突击判刑”。

1980

1 月

1 日 新《刑法》、《刑事诉讼法》生效，地方上开始以此审判“打砸抢分子”“反革命分子”。

11 月

21 日 特别法庭开庭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

法庭上，王洪文积极认罪，张春桥一言不发，江青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姚文元摇尾乞降。

1981

1 月

5 日 河南省委书记在省委工作会议上说：“全省共判处打砸抢分子、反革命分子 1700 多人。”

23 日 特别法庭对王张江姚和林彪集团作出判决。

1982

7 月

3 日 陈云在讲话中首次提出要对“三种人”保持警惕。

12 月

30 日《中共中央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下发，清理“三种人”运动开始。
各省的革命派领袖被陆续判刑。

1983

8 月

25 日 “严打”开始，对象包括“现行反革命”和“林彪、‘四人帮’团伙残余分子”。

10 月

11–12 日 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

12 日 邓小平、陈云在全会上称“最危险的”是“三种人”。

全会通过《关于整党的决定》，决定“用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标志着整党的开始。

11 月

16 日 中共中央转发《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话》，将老干部剔除出“三种人”。

1987

1 月

“严打”进入尾声。

5 月

30 日 全国整党工作总结会议闭幕，整党结束。但是在闭幕时薄一波称“清理‘三种人’的工作还没有完”。

1989

4 月 17 日 -6 月 4 日 六・四运动。

前反潮流派成员唐恒山前往北京参加运动，下落不明。

1992

5 月

14 日 江青去世，官方声称是自杀，但是有诸多疑点。

90 年代

河南老造反派在农村成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进行斗争。

河南老造反派开始零星参与和领导工人运动。

后期 老工人普遍开始怀念毛泽东时代。

正文部分人名、团体名索引

C

陈伯达——中央走资派，文革开始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至1967年6月）、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红旗》杂志社总编辑（至1970年9月）、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至1970年6月）、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成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至1967年），文革前期在中央文革小组任组长，以左派的面目出现。1966年8月兼任政治局常委。九大前后与林彪混在一起，成为林彪集团的一员，暴露出极右的实质。1970年庐山会议被打倒，随后被隔离审查。1973年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1981年被判刑18年，1988年刑满释放。——第25、72、73、137、142、148–150页。

陈锡联——辽宁军头走资派，文革开始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三书记（第二书记刚刚去世）、东北局书记处书记，1968年–1973年任辽宁革委会主任、沈阳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69年任政治局委员（至1980年）、中央军委委员（至1982年）。1973年调至中央工作，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次年兼任党委第一书记（均至1980年），1975年兼任副总理（至1980年）、中央军委常委（至1982年），1976年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至1977年初）。是在革命派与走资派之间投机的中间派机会主义分子。一举前夕投靠华派，1980年被批判下台。——第97、108页。

陈再道——湖北军头走资派，文革开始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党委第二书记、湖北省委常委、中南局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残酷

镇压武汉造反派，七·二〇事件中放纵部下独走进行反革命暴乱，因而随后被撤职关押。1972 年复出，任福州军区副司令，1973 年兼任军区党委副书记。1975 年任中央军委顾问。——第 9、142 页。

D

党内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的主要的与核心的力量。前身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和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腐蚀的干部。他们是从商品制度及其内含的资产阶级法权关系的土壤上产生的，由官僚主义作风培育的，并以剥削阶级意识形态作为精神支柱和思想武器。他们的主要危害是利用权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搞资本主义复辟。在政治上，他们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在作风上，他们即官僚主义者阶级，保持着官僚主义的恶习。无产阶级与他们的阶级斗争集中表现为路线斗争。他们的挂帅人物在 1966 年是刘少奇，1969–1971 年是林彪，1975 年是邓小平，毛主席逝世后是华国锋。在党内资产阶级篡夺政权后，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资本主义国家，党内资产阶级也随之转化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第 13、14、16、20、76、105、118、119、123、175 页。

邓小平——党内第二大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刘邓集团的第二号头子。文革开始时任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常委、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67 年被打倒，停止一切职务，但对他的批判轻于刘少奇。1969 年被下放江西监督劳动，1973 年 3 月复出，恢复副总理职务，8 月当选中央委员，在批周后于 12 月成为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1975 年 1 月兼任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并成为右派老干部的头子，同年末被打倒。1976 年天安

门反革命政治事件后被撤销一切职务。1977 年在右派老干部的簇拥下再次复出，恢复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第 8、14、19、76、79、80、85–87、89–101、105、107、113、117、119、124–129、131、155、158、161–169、171、173–177、179 页。

H

贺龙——与刘邓集团关系密切的军头走资派，在文革任副总理、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66 年被打倒，死于 1969 年。1973 年毛主席表示“贺龙同志搞错了”，打算给他翻案。[148]——第 100 页。

华国锋——湖南老干部走资派，文革开始时任湖南副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1967 年亮相支持温和造反派工联而被解放，不久担任湖南革委会副主任，后兼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湖南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政委、党委书记。1971 年 1 月调入中央，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政治局委员，1975 年任副总理、公安部部长，积极参加整顿，并成为中间派的代表。1976 年四五事件后任总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在毛主席逝世前被他选为接班人，之后与右派合流，发动政变，消灭了革命派，随后被剩余的政治局委员推为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主席。随后在 1978 年，自己也由于不能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被架空，1980 年末被迫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降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彻底下台，并于 1982 年将剩下的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也一并辞去。——第 6、97、101–109、115、118、119、124–126、131、167–171、173–175、177 页。

华派——以华国锋为代表的一类在文革中被重用的中间派走

[148] 参见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接见参加中共中央军委会议全体成员时的发言。

资派，也指他们在十月反革命政变后形成的政治集团。他们在前中期以温和的、不坚定的文革派面貌出现，有的是伪装为文革派的走资派，有的是从文革派蜕化为走资派。直到批邓开始前，他们没有形成宗派，也没有很大的政治力量。在整顿中他们第一次露出走资派的真面目，积极参与整顿。批邓开始后他们迅速与邓小平切割，伪装起来。到在毛主席逝世前，他们被毛主席安排获得中央的多数。某些华派在毛主席病重后开始了宗派活动，不过尚未完全形成宗派。在毛主席逝世前夕，他们不自量力地认为自己能靠毛主席的背书独掌政权，便开始密谋与革命派决裂，将革命派全部打倒，彻底露出了走资派的真面目。在毛主席逝世后，他们伙同部分元老派卑劣地发动宫廷政变，之后又发动揭批查，使革命派损失殆尽。在政变后，华派吸纳了一些其他类型的走资派（包括老干部和蜕化的新干部），逐渐形成了一个政治集团，以华国锋为头子。然而，由于他们的路线不能最大程度上代表党内资产阶级（此时已经转化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很快便被党内资产阶级抛弃，于是不久他们便被元老派赶下台而解体，为元老派做了嫁衣。特殊的阶级斗争形势使得这群“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149]。主要成员包括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吴德、吴忠、纪登奎、苏振华、陈永贵、吴桂贤、李鑫、刘建勋、张平化、张耀祠等。——第 8、96、105、107、108、119、121–128、169、175、177 页。

黄金海——上海工人激进造反派，工总司创始人和头头之一，1968 年起负责财贸口。十月反革命政变后，于 1976 年 10 月末被隔离审查，1982 年被判刑 15 年。——第 5、115 页。

[149] 引自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原文说的是拿破仑三世。不过，华派很明显连拿破仑三世都不如：拿破仑三世是在各个阶级之间平衡，而华派则不采用纪登奎提出的分化革命派、扶持温和的革命派以抗衡走资派的方案，一味讨好资产阶级，自己把自己执政的根基掘掉，最终落得二年失国的下场。

黄永胜——广东军头走资派，林彪集团“四大金刚”成员，文革前期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广东革委会主任，1968 年调到中央，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九大后兼任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1971 年被隔离审查，1981 年被判刑 18 年，但同年就通过保外就医出狱。——第 6、52、70、72、73、75、143、146、150 页。

J

纪登奎——河南老干部，文革前中期支持激进造反派，是革命派的同路人。在文革开始时是河南省委常委、商丘地委第一书记。1967 年亮相支持激进造反派二七公社而被解放，后担任河南革委会副主任、河南省委书记。文革中期进入中央，是重要的中央文革派成员。但是在后期逐渐右倾，成为华派，在 1975 年的整顿中站在邓小平一边，协助邓小平整党。1976 年积极串联组织右派政变，但因战术分歧（主张区别对待王张江姚，分化革命派）被华国锋排除在外。1978 年兼任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在邓小平上台后因为是华派而被批判，1980 年辞去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中央政法小组组长职务而下台。——第 73–75、103、146、151、168、170 页。

江青——中央文革派，王张江姚之一，毛主席的妻子。她主要负责文艺方面，被誉为“文化革命的旗手”，在政治上也多次出场。她对继续革命十分坚定，但有着冒进、不善于团结别人和爱一时兴起的缺点。文革前期先后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代组长，并兼任解放军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顾问。九大上成为政治局委员，1970 年兼任组织宣传部副组长。十月反革命政变时在家中被捕，1981 年被判死缓，1983 年改为无期徒刑。——第 24、25、54、58、70、72、79、82、85、86、88、91、94、95、101、108、121、126、127、134、142、146、150、155–159、161–164、168、170、171、173–175、178、180 页。

K

蒯大富——清华“井冈山”（团派）头头，激进造反派，但是个人主义严重，派性不小，因而在清华大学搞不好大联合而和反对派四派走向武斗，甚至在工宣队进校后还在对抗，导致在冲突中团派打死了数名工人。1968 年末分配到工厂。后在清查五·一六中被打为五·一六分子。在文革结束后被判刑 17 年。——第 4 页。

L

李德生——安徽最早支造的军头，在前期为少数的支持革命派的军头。是许世友的老部下。1968 年起任安徽革委会主任、1971 年起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和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党委副书记。1969 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至 1975 年，1971 年前为军委办事组成员，办事组取消后为军委办公会议委员）。1970 年至 1973 年任组织宣传组副组长、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党委书记。在 1969 年至 1971 年对林彪集团暧昧，后来及时跳船并卖力参与对林彪集团的清查。1971 年起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二、第一书记，1973 年改任沈阳军区司令员，1974 年兼任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并卸任在安徽和南京军区的职务，随后被查出和林彪的关系问题。在 1973–1975 年任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1971 年后彻底右倾， 1974 年一直到 8 月因中央军委工作和上林彪贼船等问题被批评。一举前夕投向华派。——第 74、80、146、151 页。

李木森——重庆“反到底”头头，激进工人（技术人员）造反派。不满于自己在摸底排队中被归为依靠对象而造反，在 1968 年重庆革委会成立后成为重庆革委会副主任、重庆民兵指挥部副总指挥（虚衔）。后期逐渐右倾，不愿坚决斗争。1974 年突击入党。1976 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任民兵指挥部副政委。十月反革命政

变后，在1977年5月被迁回原单位作检查，1986年“清理三种人”中被开除党籍。——第5页。

李再含——贵州干部温和造反派，文革开始时任贵州省军区副政委。1967年任贵州革委会主任、昆明军区副政委、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在贵州打压反对自己的激进造反派和老干部，引发多方不满，在1971年被撤职。1975年去世。——第5页。

李作鹏——军头走资派，林彪集团“四大金刚”成员，文革中先后任海军副司令员、第一政委与海军党委副书记、第一书记等职，1968年开始前后成为军委办事组成员，不久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部党委副书记，九大后任中央军委委员。1971年被隔离审查，1973年被开除党籍，1981年被判刑17年，但同年就通过保外就医出狱。——第73、75、150页。

陆定一——刘邓集团的走资派之一，在文革前夕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文化部部长、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宣传口。毛主席在文革前夕就很不满意他的意识形态工作，严慰冰事件只是打倒他的借口而已。——第23、25、134页。

林彪——中央最大的军头，掌控着红一方面军—四野山头。由于在文革前一向支持毛主席，尤其是支持对军队的“革命化”，加上本就是军队一把手，因此被毛主席作为军队中的战术盟友。文革开始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副总理、政治局常委、国防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文革前三年势力膨胀，在杨余傅事件后和山头中部分人物形成林彪集团，进行宗派活动，复辟资本主义。在1971年参与反革命政变，失败后向北叛逃苏联，飞机失事，是为九一三事件。——第14、23–25、40、53–56、58、63–65、67、70–83、88、100、119、129、134–136、141、142、144、146–152、154、158、160、162、165、178、179页。

林彪集团——以林彪为头子的走资派集团，包括林彪、叶群（林彪妻子）、林立果（林彪长子）、陈伯达、军委办事组“四

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以及林立果的党羽和地方的林派军头（遍布全国一半左右的省份）。在文革前军队里就存在林彪的山头（四野），在杨余傅事件后正式形成宗派集团。九大后，又有很多地方军头和一些军队部门的走资派加入林彪集团。此外，在批陈前，林彪集团还一度获得了很多非集团内军头走资派（如许世友、汪东兴、韩先楚、李德生等）的支持。1970 年庐山会议上势力到达顶峰。1971 年九一三事变后解体。——第 14、63、65、67、70–76、78–81、83、88、100、141、144、146、147、149、178 页。

刘邓集团——以刘少奇、邓小平两个最大的走资派为头子的走资派集团，包括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王任重、彭真、杨尚昆、陆定一等许多走资派，其中刘少奇是挂帅人物。1967 年解体。其中，刘少奇有叛徒的历史问题，但是邓小平历史问题较小，给了他复出的可能。——第 4、14、19、21、23–29、135、136 页。

刘建勋——河南老干部，文革前中期支持激进造反派，是革命派的同路人。在文革开始时是河南省委书记、河南省军区第一政委、河南政协主席、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为最先站出来支持文革的省委书记之一。1966 年又先后兼任华北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卸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1968 年河南革委会成立后担任河南革委会主任，1971 年兼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军区政委。1969 年又兼任武汉军区政委、军区党委书记。在中后期逐渐右倾，成为华派，在 1975 年的整顿中站在邓小平一边。不过，在邓小平上台后仍因为揭批查不力而下台。——第 5、90 页。

刘少奇——党内最大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刘邓集团的第一号头子。文革开始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由于有叛徒的历史问题，被严厉地批判，并于 1968 年 10 月解除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在 1969 年被疏散至开封，不久死亡。——第 14、19、68、71、145、165 页。

罗瑞卿——与刘邓集团关系密切的军头走资派，在文革前得罪了几乎所有派别的中央领导人，1965年末被免去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书记、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党委第一书记等职务。文革开始时被免去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仅有国防委员会委员之职因国防委员会停止活动而未被免去）。1971年恢复工作，1973年被毛主席恢复名誉，1975年任中央军委顾问。——第23、24、133页。

M

马天水——上海老干部，文革初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7年亮相支持激进造反派工总司而被解放，文革末期任上海市委书记、上海革委会副主任，主持上海市委日常工作。在十月反革命政变后当了叛徒。1977年先后被停职审查和逮捕，后因神经病免于起诉。——第6、91、113、114、163、172页。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领导者，毛泽东主义（毛主义）的创立者，中央文革派的核心。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事业伟大的舵手，中国革命派伟大的统帅，世界无产阶级的第五大导师。文革期间任中共中央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主席。1976年9月9日逝世。在本书中都以“毛主席”称呼。——出现页数略。

P

潘复生——黑龙江激进造反派干部，文革开始时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黑龙江省军区第一政委、东北局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常委。是最早支持造反派的省委第一书记之一。1967年任黑龙江革委会主任、沈阳军区政委。1968年搞反复旧，打击反对自己的激进造反派和老干部，引起多方不满，在九大仍当选中央军委委员并在随后兼任沈阳军区党委第三书记，不过终于在1971年被免除一切职务接受审查。——第62页。

彭罗陆杨——指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们都在文革开始前后被打倒，在邓小平复出后很快平反。——第 27、29、135 页。

彭真——刘邓集团的走资派之一，在文革前夕担任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第 23、25、133、134 页。

Q

戚本禹——戚本禹，中央文革小组左派，在八一社论中附和林彪大谈政变，引起毛主席不满。8 月被点名，但被暂时保下来写检讨。5 个月后毛主席为了进一步稳定局势、促进大联合，戚本禹也被捕。1981 年被判刑 18 年，1986 年出狱。——第 26、44、133、134、143 页。

邱会作——军头走资派，林彪集团“四大金刚”成员，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党委第一书记等职，1967 年开始成为军委办事组成员，1968 年兼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九大后任中央军委委员。1971 年被隔离审查，1973 年被开除党籍，1981 年被判刑 16 年，但同年就通过保外就医出狱。——第 53、73、150 页。

S

沈如槐——清华“四·一四”（四派）头头，温和造反派－新保守派的代表性人物。——第 5 页。

四大金刚——指林彪集团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他们都是大军头，先后进入军委办事组工作，是林彪的干将。——第 75、150–152 页。

T

滕海清——军队干部，文革开始时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军区党委常委（至 1975 年）。1967 年 1 月调至内蒙古，任内蒙古军区代司令员，妥善处理军队枪击造反派事件，坚定支造反保。在 1967 年内蒙古革委会成立后任主任。后来，造反派分裂为支滕反

滕两派。1969 年，滕海清因为“挖肃内人党”扩大化并伴随严刑拷打与滥杀，严重违反党的民族政策和清队政策，被中央批评并在内蒙古被批斗，不久因病调回北京。1971 年被免去内蒙古革委会主任、内蒙古军区代司令员职务。1975 年改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军区党委常委。——第 58 页。

W

汪东兴——隐藏的走资派，对毛主席个人忠诚，但是在路线上则支持走资派的路线。文革开始时任任公安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1969 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在庐山会议一度暴露，但是被保了下来。1971 年九一三事件后任军委办公会议成员，1973 年升为政治局委员。1975 年升任中央军委常委。在毛主席逝世后投向华派，是十月反革命政变的主谋和关键人物，直接指挥中央警备团进行宫廷政变。1977–1978 年兼任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1977 年兼任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至 1982 年）、中共中央副主席。1978 年卸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升任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旋即在年末被迫检讨并提出辞去一切职务。1980 年辞去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军委常委、委员、中共中央副主席而下台。——第 72、73、75、102、103、107、108、118、125、126、165、168–171、174、176、177 页。

王关戚——指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位中央文革小组的左派。其中，戚本禹在 1966 年附和林彪 518 讲话大谈政变，引起毛主席不满。王力、关锋在 1967 年 8 月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王力还在 1967 年 8 月向外交部造反派讲话，导致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1967 年 8 月三人被点名，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戚本禹被暂时保下来写检讨，这与他虽然也谈军内斗争，但反对提“揪军内一小撮”有关。5 个月后毛主席为了进一步稳定局势、促进

大联合，抛出戚本禹，于是戚本禹也被捕。1968 年 1 月三人被一起关进秦城监狱。这与他们之前负责接见地方群众组织的身份有关。文革后，王力、关锋均没有被判刑，分别在 1982 年初、1981 年末出狱。戚本禹在 1981 年被判刑 18 年，1986 年出狱。——第 44、67、142 页。

王洪文——上海“工总司”头头，王张江姚之一，造反派中革命性最强的头头，在 1967 年上海革委会成立后为副主任，是有实权的领导成员，在 1968 年上海党组织恢复后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1972 年调入中央学习，旋即在次年开始进入中央工作，不久任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1975 年 2 月兼任中央军委常委。十月反革命政变中在怀仁堂被捕，随后在严刑拷打之下叛变，文革后被判无期徒刑。详见 第 页。 —— 第 5、80、83、86–88、91、94、103、105、110–113、120、121、127、155–161、163、164、170、173–175、178 页。

王效禹——山东激进造反派干部，1967 年任山东革委会主任、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山东省军区第一政委。是反复旧的发起者，九大上仍当选中央军委委员，但终于在 1969 年 11 月被停止山东革委会主任、中央军委委员等职务接受审查，1970 年被撤销一切职务职务下放改造。十月反革命政变后，在 1979 年被开除党籍。——第 5、47、62、141 页。

王秀珍——女，上海工人激进造反派，工总司成员，文革末期任上海市委书记、上海总工会常委、副主任、上海革委会副主任。在十月反革命政变后当了叛徒。1977 年先后被停职审查和逮捕，后被判刑 17 年。——第 113、114、163、172 页。

王张江姚——指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是文革后期中央文革派的一个团体，存在于 1974–1976 年，毛主席逝世后成为中央革命派的主要人物和核心。被走资派打成“四人帮

反党集团”，在十月反革命政变中被隔离审查。——第 22、85、86、94、95、97、98、100、106、113、115、117、121、124、126、127、131、160、161、163、168、169、171、172、178 页。

韦国清——广西军头走资派，文革开始时任广西自治区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二书记、广西政协主席、国防委员会委员。1966–1980 年广州军区第一政委。1968–1975 年任广西革委会主任，1971–1975 年任广西自治区委第一书记。1973 年兼任政治局委员。1975 年改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革委会主任，但他的势力在广西屹立不倒直到 1983 年，这和他 1977 年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军委常委等职有关。关于他的事迹见第 51–53 页。——第 33、45、51–53、139、142 页。

吴法宪——军头走资派，林彪集团“四大金刚”成员，任空军司令员等职，1967 年开始前后任军委办事组负责人、副组长，不久兼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九大后任中央军委委员。1971 年被隔离审查，1973 年被开除党籍，1981 年被判刑 17 年，但同年就通过保外就医出狱。——第 71–75、148–151 页。

吴晗——与刘邓集团关系密切的走资派，兼具知识分子身份和北京副市长身份，《海瑞罢官》的作者。——第 23、133 页。

X

萧华——中央军头走资派，本属于林彪山头，文革开始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党委书记、中央军委委员、副秘书长、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是文革初期一年多中央军委的“三驾马车”之一。1967 年兼任中央军委常委，五一三事件前投机支持军内造反派，被五一三事件牵连进去。由于和林彪在文革中产生矛盾并越来越深，8 月被打倒、批斗，后被撤职关押。1975 年复出，任军事科学院第二政委、党委第三书记。——第 53、142 页。

谢富治——中央文革派重要成员，有军队背景。文革中任副总理、公安部部长、中央军委常委、北京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等职务，在九大后兼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等职。1971 年起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1972 年去世。——第 73 页。

徐景贤——上海干部激进造反派，后任上海革委会常委、上海市委书记。在十月反革命政变后当了叛徒。1977 年先后被停职审查和逮捕，后被判刑 18 年。——第 5、113–115、163、170、172 页。

许世友——江苏军头走资派，属于四方面军派系而被重用。文革开始时任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二书记、国防部副部长，始终顽固而嚣张地反对造反派。在 1968 年江苏革委会建立后任江苏革委会主任，1969 年兼任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1970 年兼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他臭名昭著的清查五・一六事迹详见第页。九大后和林彪暧昧[150]，1973 年被对调至广州，改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次年兼任党委第一书记，积极清算黄永胜的罪行。1974 年一直到 8 月，因“辫子军”问题被批评。在 1976 年走资派秘密串联时多次表态反对革命派、支持发动政变。——第 62、68、80、103、141、169 页。

Y

姚文元——中央文革派，王张江姚之一，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是革命派的理论家，出身于上海，也在文革中作为上海革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长期指导着上海的革命。负责宣传口的工作，1968 年起负责《红旗》杂志。九大上成为政治局委员，1970 年兼任组织宣传组副组长。十月反革命政变中在怀仁堂被

[150] 许世友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其他几个军头给林彪写表态信，后在林彪家被搜出，参见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680 页。

捕，文革后被判刑 20 年。——第 26、33、94、106、121、127、133、134、139、151、154、162、165–168、173–175、178 页。

杨成武——中央军头走资派，本属于林彪山头，文革开始时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书记、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是文革初期一年多中央军委的“三驾马车”之一。1967 年兼任中央军委常委，五一三事件前投机支持军内造反派，后撇清关系，并任军委办事组组长。由于脚踏江青、林彪两条船，耍两面派手法，1968 年在“杨余傅事件”中被撤销一切职务并被关押。1974 年复出任解放军第一副总参谋长。在十月反革命政变中负责联络叶剑英和老帅们。——第 53、107、108、143、169、170 页。

杨尚昆——刘邓集团的走资派之一，在文革前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第 23、133 页。

杨余傅——指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他们都是军队中因为反对林彪而在 1968 年被林彪扳倒的军头，以杨成武为首，之后他们的职务被林彪的部下代替。本质上，这是杨成武脚踏江青、林彪两条船，最后被两边都抛弃的结果。1973 年被毛主席恢复名誉，随后恢复工作。——第 54、67、143 页。

叶剑英——中央军头走资派，无所属派系，文革开始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秘书长，文革开始后兼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是文革初期一年多中央军委的“三驾马车”之一。是二月逆流的主要人物之一和二月镇反的幕后主使之一。二月逆流后权力被削弱。1971 年林彪死后复出，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1972 年开始就在为政变做准备。1973 年任政治局常委、军委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向复出的邓小平靠拢，成为元老派的骨干分子。1974 年一直到 8 月，因中央军委工作等问题被批评。1975 年兼任国防部部长，在 1976 年初养病

休息，交出实权。是十月反革命政变的主谋之一。1977 年初再次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第 42、75、76、79、80、86、88、91、94、97、99、101、102、105、107、108、119、125、136、152、157、158、161、163、164、168–171、174 页。

叶群——林彪妻子，林彪集团重要成员之一。1967 年任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1969 年任政治局委员。1971 年随林彪外逃，飞机失事而死。——第 63、73、75、149、150、152 页。

元老派——1975 年开始存在的，以邓小平为头子的走资派集团，在十月反革命政变后转化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集团。邓小平复出后，他重新拉起自己的旧部、许多军头走资派和绝大部分老干部走资派，形成元老派。本质上是刘邓集团的延续。他们及他们在社会上的支持者统称为右派。——第 8、70、96、97、101、103–105、107、118、119、122–128、169、173、175、177 页。

Z

张体学——湖北老干部走资派，文革开始时是湖北省省长、代理第一书记，面对造反派身段柔软，在 1966 年末强力推动经济主义妖风。很快在 1968 年写检讨，揭发批判之前的同僚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武汉代市长、中央文革小组早期成员王任重后复出，并成为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是湖北老干部的代表人物。死于 1973 年。——第 9 页。

张春桥——中央文革派，王张江姚之一，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是革命派的理论家，出身于上海，也在文革中长期作为上海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上海警备区政委、上海市委第一书记（1971 年起）指导着上海的革命。负责理论口，在后期也负责一部分中央工作。他是最坚定、政治水平最高的革命派之一，也是最懂得继续革命理论的革命派之一。九大上成为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委员，1970 年兼任组织宣传组副组

长，1971 年兼任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1975 年兼任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和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与党委第一书记。十月反革命政变中在怀仁堂被捕，1981 年被判死缓，后减为无期徒刑。——第 25、47、71、72、74、77、79、85、86、88、91、94、97、98、103、105、110、113、121、127、138、139、148、151、154、156、159、161–163、170、171、173–175、178 页。

赵永夫——青海军头走资派，青海省军区副司令，曾制造二·二三事件。在事件败露后被隔离审查。——第 42、140 页。

周恩来——最大的老干部，文革中中共的二把手。文革中任总理、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1966 年 8 月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文革前期对于革命、文革中期对于打击林彪集团、文革后期对于国家生产和稳定不可或缺的人物。1969 年之前、1973 年之后兼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他在九大前为革命派，之后渐渐右转。1976 年初去世。详情见页。——第 4、38、64–69、72、74–80、85–87、89、93–95、97、99、100、134、138、146、147、149–159、161、163、165、167 页。

中间派——夹在革命派和元老派－右派分子间的一派。分为逍遥派、投向革命派的投机分子、华派三种。在革命派掌权时，中间派能够执行革命路线。在走资派掌权时，他们也会毫不迟疑地转为走资派服务。——第 39、76、93、103 页。

中央革命派——1、指文革开始前中央坚持深入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人，包括毛主席、周恩来、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在文革开始后转化为中央文革派。2、指文革后期毛主席以外的中央文革派。——第 23、103、105–108、114 页。

中央文革派——指肯定和支持文革、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的中央领导人。以毛主席为核心。1976 年十月反革命政变中被一网打尽。包括毛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至 1967 年被隔离审查）、关锋（至 1967 年被隔离审查）、戚本禹（至

1968 年被关押）、康生（至 1968 年）、陈伯达（至 1969 年九大）、周恩来（至 1969 年积极参与清查五·一六）、谢富治（至 1972 年去世）、纪登奎（1969 调入中央起，至约 1974 年）、迟群（1970 年进入国务院工作起）、于会泳（1970 年进入国务院工作起）、王洪文（1972 年调入中央起）、谢静宜（1972 年进入国务院工作起）、毛远新（1975 年担任毛主席联络员起）等。此外，文革中大部分中央领导人都在某个时期支持过中央文革派。即使到后期阶级阵线日益分明时，中央文革派仍然得到乔冠华等中央的非革命派的支持。——第 10、15、25、26、28、29、31、40、42、44–47、49、52–57、60、62–64、66、68、70、71、75、78、79、82、83、88、100、139、154、167 页。

朱德——中央逍遥派，早已退出中央权力层，文革开始时挂职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央军委常委、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文革初期被刘少奇等人误认为是五·一六通知“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而被批判。1968 年被卷入“中国（马列）共产党”案。九大后在党内仅挂职政治局委员，十大后在党内仅挂职政治局常委，1973 年底毛主席称他为“红司令”。1976 年去世。——第 24、135 页

朱永嘉——干部激进造反派，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在 10 月 8 日他就率先提出了明确的把民兵拉出来打的想法。听完 13 日的劝降会后也放弃了抵抗，之后按照之前的安排访问日本。在上海开始抓人时身在日本，明知回国会被抓仍如期返回，一下飞机即被抓，后被判刑 14 年。——第 115、172 页。

走资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简称。当今的毛主义者关于走资派的定义不尽相同。本书中的“走资派”即党内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表述，强调他们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特点。应注意与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相区别，走资派始终是一小撮。——出现页数略。

附录一 文革研究简介

在十月反革命政变之后，1981 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奠定了中国大陆文革研究的基调。1986 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出版局先后下发通知，严格控制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叙述，但四十多年来，仍有大量涉及文革历史的作品出版。据我们初步统计，海内外出版的研究文革的书籍超过一百七十本，论文则难以计数。这些作品鱼龙混杂，瑕瑜互见，有的产生了较大影响。下面，先简要介绍资产阶级史学界对文革的研究，再详细介绍左翼、泛左翼对文革的研究。

资产阶级学界的研究

在资产阶级史学界，已有陈建坡《“文化大革命”史研究 30 年述评》（2009 年）、金大陆《中国“文革”研究的现状和前景》（2016 年）、王芳《近十年来中文世界的“文革”史研究概述》（2016 年）、王海光《中国大陆文革史研究的当前学术气象与未来展望》（2017 年）、徐友渔《关于文革的回忆、记录和研究——近二十年进展综述》（2020 年）等综述性文章详细介绍了资产阶级学者的研究，因此这里不再赘述，仅介绍资产阶级学界关于文革的三个较有影响的观点：权力斗争论、“两个文革”说和三年文革论。权力斗争论：该论点认为，文革起源于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权力斗争（或称“宫廷斗争”），毛主席之所以发动文革，是因为他在 1950 年代推行的路线宣告失败，造成了严重的灾难（三年困难时期），随后刘少奇等所谓“务实派”全面否定了毛主席的路线，受到了普遍拥戴。刘少奇在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使毛主席认定刘少奇会在

他死后清算他的错误，因此毛主席发动文革，换掉刘少奇，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自己的权力。杨小凯、王若水、高文谦、高华等人提出或发展了该论点。[151] 秦晖提出的文革起源解释，也可视为权力斗争论的一种。秦晖认为，毛主席为了同时解决社会上对左的不满和高层的不满，采取“让不怨毛的民众与不怨左的当权派互斗”的对策，以恢复自身的威望。[152]

“两个文革”说：该论点认为，存在两个文化大革命，即上层的权力斗争和下层的群众斗争，群众“利用文革之机反官僚，反特权，争取自己的利益”。而第二个文革，即群众斗争，又可命名为“人民文革”，即“人民文革”说。杨小凯、王希哲、刘国凯、郑义等人持此论点。徐友渔认为王希哲于1981年最早正式提出“两个文革”概念，[153]而1979年在香港发表的一篇文章显示，广州的予红早在1967年就秘密提出“文革两个不同的重心和两条不同的轨迹”[154]，其实质和“两个文革”说是完全相同的。

三年文革论：该论点认为，文革只进行了三年（或两年多），即1966年至1969年这三年。该论点的部分支持者同时又支持“两个文革”说，认为文革是大规模群众运动的非常状态，1969年中共九大后即告结束。该论点的提出者是陈佩华，1997年刘国凯将“三年文革论”与“两个文革”说联系起来做了详细论证。[155]“三年文革论”也影响了泛左翼的研究者，如童小溪。

[151] 华新民．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研究述评[J/OL]．文革博物馆通讯，2008. http://www.cnd.org/cr/ZK08/cr464.gb.html.

[152] 秦晖．文革之谜：四种叙事和历史真相[S/OL]．(2016-03)．https://independence-of-mind.tumblr.com/post/182631641396.

[153] 徐友渔．“两个文革”说：权力斗争还是社会冲突？[S/OL]．(2011)．http://www.hxzq.net/aspshow/showarticle.asp?id=6172.

[154] 左拾遗．红卫兵运动中一个被遗忘的人和事——予红与广东第一个马列主义小组[S/OL]．(1979)．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arxist.org-chinese-wenge-197904.htm.

[155] 刘国凯．三年文革与两条线索[J/OL]．文革博物馆通讯，2003. http://www.cnd.org/HXWZ/ZK03/zk325.gb.html.

左翼、泛左翼的思考和研究

关于左翼、泛左翼对文革的研究，迄今未见到详细的综述，故在此大致按照时间顺序，花较长篇幅叙述。

十月反革命政变后，坚持继续革命的毛派没有沉默。官方虽讳言，其资料也有所透露，如《刑法知识例解》记载的四川“中国马列共产党”案。[156] 云南“中国共产党（马列）”案中，云南人熊永章、熊永华 1978 年召开十一大筹备会，作《政治报告》，发展党员，最终分别被判刑 13 年、7 年。[157]《运河惊蛰》提到，山东济宁有人写出长文《对文化大革命的粗浅看法》，提出中国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没有失败，逐句批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有人写出文章《关于毛泽东的后期思想》，全面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继续革命理论）。《运河惊蛰》还提到了济宁左派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论断的批判。《运河惊蛰》未写明这些文章的写作时间，但应在八九十年代。[158]

1987 年，中共中央让邓力群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邓力群编纂国史的主要思想，可见于内部印行的《邓力群国史讲谈录》七卷本。邓力群 1993 年提出，从苏联解体来看，毛主席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没有错，反修防修的理论和文革本身的理论不是一回事。1998 年又提出，把彭德怀说成是民主革命同路人错了，但民主革命同路人理论没错。[159] 这些说法体现了老左派当时的认识。

[156] 刘家琛，郑法，青锋．刑法知识例解 [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157] 邱俊德主编；云南省威信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威信县志 [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158] 雷运河．运河惊蛰 [M]．银河出版社，2003.

[159] 邓力群．邓力群国史讲谈录第三册 [M]．内部印行．

1992 年邓小平南巡、中共十四大后，老左派失去体制内的阵地，但仍拥有《中流》《真理的追求》《当代思潮》等杂志。这些杂志在全国各地建立发行站，团结了一批前文革造反派和国企老工人。2001 年《中流》和《真理的追求》停刊后，老左派转而创办“毛泽东旗帜网”，并支持“乌有之乡”网，为左翼、泛左翼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平台。[160]

1993 年，毛主席百年诞辰之际，中国大陆、台湾、美国左派的纪念会，促成了 1995 年“中国与世界”网站（后改名为“主人公论坛”）的诞生，同时发行网刊《中国与世界》。[161]1996 年至 1997 年，《中国与世界》连载了国内人士撰写的十万字长文《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此文认为继续革命理论“从根本上说是科学的和正确的”，又认为批判刘少奇有根据，但批得过分了，并且引用魏巍、邓力群、胡绳等人的话，坚持“毛泽东晚年错误”、“四人帮反动思想”等提法，显示了老左派思想上的突破和局限。[162]

除以上三个网站外，2005 年左右创办的“中国文革研究网”（2019 年前后关闭），还有“六十年代”网站（2018 年关闭），保留有许多文革资料，其中大部分被地方文革研究网（现“文革与当代史研究网”）搬运到自己网站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观点左倾的中国文革研究网收集和制作了许多 chm 格式的电子书，方便了网友的下载和阅读。

下面介绍一些左翼、泛左翼文革研究者。

[160] 本书编写组．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M]．学习交流资料，2019.

[161] 主人公网发刊词 [S/OL]．主人公网，2015. http://www.zhurengong.net/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21&id=1.

[162] 郑言实．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为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一百周年而作 [S/OL]．中国与世界，1997. http://www.mzdbl.cn/maoxuan/wenxian/zhengquepingjia.html.

1996 年 1 月 9 日，激楚的文章《驳斥〈决议〉，纪念文革三十周年》在网络上发表，[163] 此文很可能是第一篇坚持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为文革辩护的网络文章。此后，激楚（网名还有“无套裤汉”“旧文”）又撰写了《从法国大革命看文革》（2000 年）、《邓小平修正主义思想的反动性》（2000 年）等文章。2007 年，“人民春秋网”为激楚制作了两本电子书，并在后记中说：“特制作本电子书，向无套裤汉同志二十年如一日、卓有成效的网络革命宣传工作致以崇高的敬意！”[164]

高默波，江西人，后移民澳大利亚。1994 年，高默波发表文章《毛主义话语和对当前文化大革命评估的一个批判》（英文：Maoist Discourse and a Critique of the Present Assessment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评估文革和毛主席，此文被收入《红色革命与黑色造反——文革三十周年纪念研究文集》（1996 年出版）。1999 年，他出版书籍《高家村》（英文），书写江西高家村村民的经历和感受。2001 年，他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书写历史：〈高家村〉》，引发《南方周末》发表徐友渔等人的三篇文章，反对“平反文革”。[165]2008 年，高默波出版《为中国的过去而战》（英文），该书是为文革成就辩护之作。在这一时期，2000 年，来自山东即墨的韩东屏出版了《不为人知的文化大革命——一个中国村庄的生活与变化》（英文），聚焦并赞赏了山东省即墨县在文革中的变化。

2000 年至今是中国泛左翼文革研究的兴起和混乱时期，这一时期值得介绍的左翼、泛左翼文革研究者有：

李宪源，江苏无锡人，后旅居加拿大。其长文《从造反派与

[163] 主流文革论述评论 [M]. 中国文革研究网制作，2007.

[164] 无套裤汉．无套裤汉论文革 [M]、无套裤汉政论文选 [M]. 人民春秋网制作，2007.

[165] 高默波．高家村：共和国农村生活素描 [M].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

五七年右派的共通点审视文革——兼论谁该忏悔？忏悔什么？》在2000年发表,引用资料(包括许多右派资料)为文革造反派辩护。李宪源后来更加左倾，坚持文革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反对改革开放，出版文革题材小说《血火痴情》，和李民骐等一起运营红色中国网，但在2013年后淡出了中文网络。

童小溪（1962—），笔名“萧喜东”“喜东”，最具学术色彩的泛左翼文革研究者之一，现为中国农业大学教授。[166]他研究文革的系列文章于2011年结集为《极端年代的公民政治——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史》，以群众观点为线索串联文革初期历史，涉及桃园经验、血统论辩论、抢黑材料、“联动”兴亡等问题。该书认为党内对群众运动存在毛主席和刘少奇两种主张的分歧，该书支持“两年文革说”（即1968年8月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就是文革的结束），但反对“两个文革”说。

老田，本名田力为，湖北人，当前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泛左翼文革研究者之一。老田自称“看到中国主流知识精英堕落成这个样子还拼命反对文革，我才开始研究文革的”。他以“重估一切价值”的口气，依靠对各地文革史尤其是武汉文革史的深入考察，发表了上百篇文革相关文章，以反驳社会上的各种反文革论调。他对建国以来历史的独特观点和全面解读，可见于他2004年7月在乌有之乡的讲座《在新一轮“否定文革”运动的高潮中回顾文革的认识论价值》。[167]他后来的文章《对主流文革史写法的知识社会学分析》（2014年）、《造反派的文化大革命》（2017年）等，依靠更多新发掘的资料，更加深入地阐述了自己的思想。

[166] 童小溪是著名文学理论家、北师大教授童庆炳之子，而根据《极端年代的公民政治》后记，童小溪的“父母亲也属于最早阅读本书篇章的读者群”。

[167] 老田．老田沙龙：在新一轮“否定文革”运动的高潮中回顾文革的认识论价值[S/OL]．乌有之乡,2004.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xiang/2010/12/445.html.；在新一轮“否定文革”运动的高潮中回顾文革的认识论价值（之二）[S/OL]．乌有之乡,2004.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xiang/2010/12/446.html.

水陆洲（1933—2016），本名王忠林，湖南人，曾任主人公论坛版主。[168] 他编著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及配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邓小平晚年之路》等。卜伟华曾说，“水陆洲很有幽默感，他把他那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超级长篇大论定名为《文化大革命简论》”。[169]《简论》长达五百万字的原因，在于其写作方法为罗列相关资料后加以总结和评论，这种写作方法虽然可读性很差，但对有心人很有用处。贴吧用户“呕心沥血方从哲”评论水陆洲说：“此人资料很全，但分析就不那么高明了。论及过往时总结经验太多，检讨教训太少，就事论事的地方太多。至于对现状的分析，不敢苟同的地方就更多了。”《简论》《汇编》在左翼中流传范围不小，但能通读的人不多，可以作为检索资料的工具书。

郭建波，著有《伟大的理论 光辉的实践——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该书计划写四卷，第一卷《文革溯源》讲文革起源，第二卷《理论曙光》讲继续革命理论，第三卷《残阳血照》讲文革历程，第四卷《世纪新生》讲国际毛派运动，目前（2023 年）写至第三卷的一月革命部分。郭建波以巨细无遗的笔触，全景叙述建国以后历史和继续革命理论，无疑是水陆洲之后最值得重视的大部头左翼文革研究，但可读性仅强于水陆洲。所不足者，第一卷称“文化大革命就其性质来说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于义有缺。顺带一提，郭建波撰写的关于《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详细文章是《文革溯源》的组成部分，堪称是左翼相关考证的巅峰之作。

阳和平（1952—），国际友人阳早寒春夫妇的长子，成长于

[168] 主人公网讯．主人公论坛原版主水陆洲同志逝世[S/OL]．主人公网，2016.http://www.wyzxwk.com/Article/cpers/2016/03/359819.html.

[169] 卜伟华．值得注意的水陆洲现象[J/OL]．文革博物馆通讯，2008.http://www.cnd.org/cr/ZK08/cr497.gb.html.

西安。韩丁1971年来访中国时受周恩来接见，阳和平是被接见者和谈话的记录者。著有文章《我在中美两国当工人的不同感受》《也谈人性、恶和文革》《试论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关于民主、民心和专政之间关系的几点看法》《社会主义时期工人阶级和其政党之间关系的探析》《论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等，研究文革的理论问题。阳和平的舅舅韩丁是最早的文革研究者之一，在文革领域著有《文化大革命下再验“翻身”》《百日武斗——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中国转捩点——论文化大革命》《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等作品。

此外，还有袁庚华文章《我们不要一个警察世界》（2006年），叙述了毛主席的“群众专政”观和文革中打开监狱、把犯人放到群众中改造（砍监放犯）的实践。[170]“心在左边跳”（又名“红卒要过河”）文章《怎样读史——风庆轮事件》观点独特，认为王张江姚对风庆轮事件的批判落在“洋奴哲学”上，流于道德批判。项观奇文章《“毛主席关于两件事谈话”真伪考》多方考证，认为毛主席有“两件事”提法，但谈话是伪造的，[171]称得上是盖棺定论之作。除上述人士外，发表过文革相关长文的网络左翼人士还有“右而左”、“范复拜”、恽仁祥、曹为平等，介绍从略。

2016年以来，更多新鲜血液加入了左翼文革研究。

2016年戚本禹的《戚本禹回忆录》的出版震动了官方和民间。此书扉页是戚本禹手书“谨以此书纪念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他在此书中列举大量事实，以论证文革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官方的反应是发表戚本禹前同事座谈会的长篇纪要《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的谎言》，老田和武汉文革亲

[170]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09/09/25534.html

[171] 项观奇.“毛主席关于两件事谈话”真伪考[S/OL]. (2016). https://difangwenge.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405.

历者则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172] 张光渝、余汝信和孙言诚分别反驳了戚本禹关于煤炭部长张霖之之死的回忆和关于“破四旧”“红八月”的回忆。此书在左翼中传播范围广泛。

随着中国大学左翼学生社团的兴起，其成员也有学习文革史的需要，但左翼相关教材的缺乏，导致清华求是和北大马会自行编纂国史教材。这些教材在目前的左翼流传甚广，尤其是北大马会的《共和国的历程》，疫情期间许多人左转的关键一步就是读这本书。

清华大学学生求是学会（清华求是）创立于 1992 年，是老左派寄望于下一代的产物，其主创者是老左派邢家鲤。[173] 清华求是成员编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78）》，其中土改部分文笔流畅，内容深入，但后面越写越差，乃至于大篇幅攻击王张江姚，攻击造反派。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北大马会）创立于 2001 年，是清华求是一些原成员在北大读研究生时注册成立的。[174] 北大马会的一个成员在 2017 年左右编写了《文革史》，在网络上流传较广。此书首先以世界体系论的“边缘国家”“半边缘国家”概念引入，然后在党内划分所谓“政工干部”“地下党干部”“工农干部”（军队干部），用这种政治斗争观来观察国史。此书的独创观点是所谓“反抗—镇压”循环模式（党政官僚的镇压导致造反派的反抗，再反抗再镇压，如此反复，导致造反派持续激进化）。此书搬运了许多左右派观点乃至文字，已知的有对胡风“左翼知识分子”身份的肯定，对童小溪“五十天”叙述的复述，对地方文革史的

[172] 老田．武汉文革亲历者座谈《戚本禹回忆录》——戚本禹动了逄先知的奶酪？[S/OL]．红色中国网，2016. http://www.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31619.

[173] 记者 徐静．邢家鲤育人基金捐赠仪式举行 [S/OL]．清华新闻网，2016. https://www.tsinghua.edu.cn/info/1764/71830.htm.

[174] 曹向东．我在北大的“准地下党”经历 [S/OL]．红色中国网，2017.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33935.

简介。《文革史》的内容，可以说是泛左翼观点和右翼观点的大杂烩。北大马会集体撰写的《共和国的历程》，2020 年流出，泄露该书者有言：《文革史》“只是马会某前成员的个人作品，有较强的自由主义倾向，北马内部对此书也持批判态度，它并不能代表北马的立场”。但《历程》仍继承了《文革史》的一些观点，乃至继承了“党政官僚”等用语，其内容质量参差不齐。

2007 年左右建立的马列毛论坛（后来又称为“布站”），近年其主办者也关注文革研究，其成果有三篇文章，即：赤眉《为人类解放指明方向的伟大阶级斗争！——马列毛主义的文革史观及研究》（2017 年发表，2021 年修订）、张角《“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起源》（2021 年）、赤眉《简论安亭宪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2021 年）。其中赤眉文章提出“毛主席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工人阶级的“力量倍增器”，以此解释文革的失败，并将文革经验总结为八条。对于《文革史》，布站上有文章《炮打北马〈文革史〉》。对于《共和国的历程》，布站发表了文章《小论北大马会的〈共和国的历程〉》，主要攻击点集中于“官僚”概念的使用。

贴吧用户“水来火去”[175] 自称在网络上找到了“三个半的老师”，水来火去从他的老师那里继承了“党内资产阶级两大集团划分”的观点，该观点认为党内资产阶级可划分为“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两部分。水来火去认为，文革末期，阶级斗争加剧甚至趋于白热化，敌我阵营发生了重新分化组合。水来火去论述过遇罗克、杨小凯、华国锋集团、文革外交等问题。2018 年，激流网上发表了署名为“老邪”的文章《文化大革命的逻辑进程》，以晦涩的笔调兜售文革必败论，受到水

[175] 水来火去，2007 年进入网络左翼圈子。他称布站的“老爷们，我曾经很信任他们，也曾以师视之，但最终因一系列事件而醒悟过来，这是一伙反革命两面派的政治骗子。”

来火去的批判。贴吧用户“呕心沥血方从哲”也受水来火去的影响。

2020 年，武汉造反派对武汉文革史的深入研究导致了《武汉地区文革纪实》的出版，该书写作组成员除老田外都是文革造反派，搜集了大量造反派资料，但也尽力搜集了保守派、当权派的资料，“力求真实地反映武汉文革的历史过程”。

2021 年 2 月，左翼网刊《paper》请人撰写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史》，这篇长文未连载完结。此文的可见部分利用泛左翼发掘的文革资料，有条理地复述了对前二十七年各历史事件的前二十七年中国官方观点。[176]

2021 年 7 月，共产主义小组（毛主义）发表长文《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此文在重复前二十七年中国官方观点的同时，又引入了“主要是毛主义”派对文革的观点。此文称：“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最后会失败？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没有充分运用《用人民战争直到共产主义来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中指出的‘武装群众的海洋’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这本来可以通过赋予人民民兵更多权力来实现。”[177]“主要是毛主义”派的中国支持者撰写的文章《驳国内某些人对各国马列毛主义者的攻击》，也支持“主要是毛主义”派这一观点，认为文革的主要缺点是“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武装群众的海洋’运用不足，换而言之，没有充分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巩固群众武装。”[178]

这里可以顺带提一下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关于“集体领导”

[176]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史 [EB/OL]// 马列毛群众论坛 . (2021). https://mlmmlm-icu.github.io/t/topic/315.html.

[177] COMMUNIST GROUP (MAOIST). Commemorate the Centen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OL]. (2021-07-26). https://ci-ic.org/blog/2021/07/26/communist-group-maoist-commemorate-the-centenary-of-the-founding-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

[178] LID. 驳国内某些人对各国马列毛主义者的攻击 [EB/OL]// 马列毛群众论坛 . (2021-09). https://mlmmlm-icu.github.io/t/topic/1042.html.

的观点。印共（毛）中央委员会发言人阿扎德2006年在采访中说："对某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的依赖而不是发展集体领导并使全体党员和群众都参与制定决策，是苏联和中国在著名的无产阶级领袖如斯大林和毛主席去世后，国家产生逆转、共产党迅速变质的原因之一。"[179]《驳国内某些人对各国马列毛主义者的攻击》则反驳称，中国资本主义复辟不能归结于"个人权威过大"，"相反，毛主席个人的权威是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能够取得较大成果的重要因素。"

除了"主要是毛主义"派的观点外，国外毛派对文革的主要研究，已知有"美国马列毛主义革命研究小组"2007年撰写的文章《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及其对未来的遗产》。[180]此文充分利用了当时正面的英文文革材料，立场是毛主义的，但史实多有不确。除此文列举的英文资料外，医疗方面的资料还可以提及洪若诗（Joshua S. Horn）著《扫除一切害人虫——一个英国外科医生在人民中国：1954-1969》（1971年出版）。

到这里，我们大致罗列了国内外左翼关于文革的思考和研究。最后，我们介绍一下左翼文革研究中的两个理论话题。

文革是否失败："文革已经失败"常被作为讨论文革的不言自明的前提。上文已经提到，济宁的一名左派认为文革没有失败。还可以注意到，1984年由十九个毛派组织签署的《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宣言》就未言文革失败。1988年秘鲁共产党一大通过的基本

[179] 阿扎德．"需要慎重对待当前的策略。"尼共（毛）可能过于强调了通过制宪会议推动运动进展的可能性[S/OL]. 人民行进，2006. https://maozhuyi.home.blog/2020/11/03/%E9%9C%80%E8%A6%81%E6%85%8E%E9%87%8D%E5%AF%B9%E5%BE%85%E5%BD%93%E5%89%8D%E7%9A%84%E7%AD%96%E7%95%A5%E3%80%82%E5%B0%BC%E5%85%B1%EF%BC%88%E6%AF%9B%EF%BC%89%E5%8F%AF%E8%83%BD%E8%BF%87/.

[180] 美国马列毛主义革命学习小组．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及其对未来的遗产[S/OL]. (2007). https://maozhuyi.home.blog/2020/08/06/%E8%AE%BA%E4%B8%AD%E5%9B%BD%E7%9A%84%E6%96%87%E5%8C%96%E5%A4%A7%E9%9D%A9%E5%91%BD%E5%8F%8A%E5%85%B6%E5%AF%B9%E6%9C%AA%E6%9D%A5%E7%9A%84%E9%81%97%E4%BA%A7/.

文件则旗帜鲜明地声明，十月反革命政变并非文革的失败。[181] 其后印共（毛）的《马列毛基本教程》、《高举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鲜红旗帜》，《二〇一六年国际五一劳动节联合声明》、2016年“主要是毛主义”派国际声明《用人民战争直到共产主义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等文件，也未承认文革失败。早在2006年，已有左派敏锐地意识到了《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宣言》蕴含的“文革未败”之义，[182] 但其文章似未引起较多注意。

社会主义多党制：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放弃人民战争前，其文件就称，苏联和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是缺乏共产党的政治竞争的结果，其他政党可以作为群众的替代方案以拯救社会主义。2006年，印共（毛）公开发文批判了尼共（毛）的“多党竞争”观点。用多党制拯救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也是中国左翼中流行的观点，阳和平文章《社会主义时期工人阶级和其政党之间关系的探析》对此有深入的批判。

以上，我们简要回顾了过去三十年的文革研究尤其是左翼的研究，以追忆左翼理论工作者对文革研究的贡献，并希望继承他们的一切优秀成果，以他们的不足为鉴，同时为有志于深入了解文革史的同志提供一点指引。

[181] 秘鲁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秘鲁共产党总路线 [S/OL]．(1988)．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peru--struggle/1-01.htm.

[182] 兆民．文化大革命成功阻止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十年——纪念文革40周年 [S]．原载于毛泽东旗帜网，又载于网络人士制作的《评邓朴方倒爷“文革灾难论”》，2006.

附录二 文革史书籍推荐

如果读者对文革史有进一步了解的兴趣，可以参考书单 https://fork-soprano-e9c.notion.site/2023-9-22-65e138e6a8dd417fa62c33618d7090af?pvs=4。不过，这些著作大部分作者都是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或者站在非马列毛主义视角的，需要读者注意分辨其观点；另外，史料上也需要互相印证和考据，不能偏听偏信。

在这里列出其中比较优秀和适合初学者阅读的政治运动方面的书目：

通史方面：

港中大国史第六卷：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 和第八卷：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1972-1976)

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

杨继绳《天地翻覆 中国文化大革命史》

地方史和回忆录方面：

上海 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黄金海《十年非梦——黄金海回忆录》

武汉 本书编写组《武汉地区文革纪实》

广西 张雄飞《桂林老多四十四周年祭》

重庆 何蜀《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

长沙 陈益南《青春无痕：一个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

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

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

研究类：

乔晞华《文革群众运动的动员、分裂与灭亡 ——以社会运动学视角》

郑重《张春桥：1949 及其后》

余汝信《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

发动原因探究：

马社香《前奏：毛泽东 1965 年重上井冈山》

郭建波《伟大的理论光辉的实践》

后记

从标题也能看出来，本书的定位看齐著名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包括为入门的左派普及文革史重要知识、扫清文革史的谬论、梳理文革史的脉络、为主要事件人物定性等。此外，本书在写作时也致敬和参考了马克思的“法兰西三部曲”。不过，“全部历史，特别是历次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形式多样，更范围广阔，更生动活泼，‘更难以捉摸’。”[183] 因此，作为一场进行十年之久的革命，文革的复杂和宏大是不可能用这样一本小书完全把握的，在这样伟大而复杂的实践面前一切纯粹的理论都显得无力，更何况这样一本简单浅显的教材。如果读者看完觉得本书能比肩《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胜过已有的文革通史，我就很满意了。

在如今这个文革的模因、乃至于文革的一些细节逐渐在左翼群体中普及开来的时代，左派了解文革的意愿增强，然而现有的文革通史或立场非马列毛，或史料堆积有余、细致分析不足、可读性差，已经难以满足左派学习和从马列毛主义理解文革的需要；而如果找各种研究和史料来读，不仅费时费力，还容易在一知半解时被作者的谬论带偏。于是，这导致各种奇谈怪论流毒甚广，左翼群体呼唤一本马列毛主义的文革史入门教材。同时，随着亲历者的陆续去世，史料的挖掘已经走向尾声。可见，编写一部马列毛主义的文革史有了急迫的需求和较为成熟的条件，因而我们决定编写一本教材。除了写作组成员，还有许多同志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指导或建议。在此对这些同志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183] 引自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十、几点结论。

由于本书的写作时间紧、任务重，加之写作者水平参差不齐，因而在方法论上有些地方不得不“瓜菜代”，导致写作者有些段落会“消化不良”，有囫囵吞枣式的转述。此外，在史实上也难免会有纰漏。希望读者同志发现错误或感觉有什么不足后能在 Github 上指出，我们将会不定时地更新迭代版本，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另外，限于简中互联网日益严密的网络封锁，本书无法在墙内发布，希望读者同志们能帮忙私下传播本书。

再次提醒读者，对历史的了解与现实的斗争是相辅相成的。希望读者在读完本书后，能更坚定地投身于革命实践中去。

最后，再次对写作组成员和指出错误、提出意见或帮助扩散的同志们表示感谢！也感谢阅读到此的你！

写作组负责人

2023.12